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

JOURNAL OF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编委会主任 孟凡有

编委会副主任 郭榛树

主 编 郭榛树

主办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2022 **06**
(总第122期)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

(双月刊)

目 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 1 科学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三重意蕴 王 兵
- 5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探析 向青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9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生成逻辑、内蕴与基本遵循 毛 磊 张今誉

马克思主义研究

- 19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 刘福军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 26 民族复兴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何 良
- 33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历史成因、鲜明特征及传承路径 赵杨娟 莫佳思

党史党建研究

- 39 组织调适：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郭文杰 黄博一

目 录

46 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研究

吴 琳 吴国燕 谭少怀

政治学与法学研究

51 公开个人信息的定位及处理活动的规范化 张建文 丁冰洁

59 中国特色文化扶贫：先进理念、成熟经验与未来方略

冶 刚 徐秋枫

经济学研究

65 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生产率了吗？

金 通 朱保香 吴 旻

80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张淑萍

公共管理研究

87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城市社区应急路径创新探究

杨 浩 张瑞敏 李欣宜

总 目 录

94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总目录

主管单位：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编辑、出版：本刊编辑部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莲 王辉龙 刘玉东

李桂华 李菁怡 吴永胜

孟凡有 张华民 张家芳

陈 华 高信奇 郭榛树

编辑部主任：王辉龙

编辑部副主任：甘文华

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谊 王庆五 布成良

张凤阳 陆剑杰 林闽钢

周毅之 童 星

2022 年第 6 期

总第 122 期

20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

地 址：南京市栖霞区

灵山北路 190 号

邮 政 编 码：210046

电 话：025-86752230

电子信箱：njdxzb@vip.sina.com

承印单位：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

**JOURNAL OF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NO.6 2022(General No.122)

Contents

-
- (1)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Triple Meaning of “Six Insistences” **WANG Bing**
- (5) Analysi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 **XIANG Qingshan**
- (9)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Genera-
tive Logic , Internal Implication and Basic Compliance ... **MAO Lei, ZHANG Jinyu**
- (19)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theism
..... **LIU Fujun**
- (26) The Centennial History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s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n **HE Liang**
- (33) The Historical Cause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hua Heroic Revolutionary
Spirit **ZHAO Yangjuan, MO Jiasi**
- (39) Organizational Adjust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s Unified Leadership in the
Yan’an Period **GUO Wenjie, HUANG Boyi**
- (46)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Regular Mechanism of Training and Selecting Outstanding
Young Cadres **WU Lin, WU Guoyan, TAN Shaohuai**
- (51) Explore the Legal Status and Processing Rules of Disclo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 **ZHANG Jianwen, DING Bingjie**
- (59)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vanced Ideas, Mature Expe-
rience and Future Strategies **YE Gang, XU Qiufeng**
- (65)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 **JIN Tong, ZHU Baoxiang, WU Min**
- (80) The Path Choice of Expand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ZHANG Shuping**
- (87)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Emergency Pa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YANG Hao, ZHANG Ruimin, LI Xinyi**
- (94) General Contents of 2022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了推动学术界更好地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开辟专栏推出系列文章,本期刊载王兵教授的《科学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三重意蕴》和向青山副教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探析》。

科学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 三重意蕴^{*}

王 兵

[摘要]世界观方法论的自觉是党的理论坚守与创新的重要前提。党的二十大用六个“必须坚持”从哲学层面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概括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既为更好地理解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精髓要义指明了方向,也为理解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更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01-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报告从六个方面作出了概括和阐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从哲学层面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概括提炼,既为更好地理解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品格、鲜明特质、精髓要义指明了方向,也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研究”(21BZX003);南京市社会科学基础专项“基于三份历史决议的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方法论研究”(22ZX03)。

[收稿日期] 2022-11-15

[作者简介] 王兵,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南京新时代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210046。

了思想武器。我们要全面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发展。

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人民至上”放在首位,因为它是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关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报告也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可以说,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这一理念鲜明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就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进一步彰显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价值立场。

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围绕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推进各项工作,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需要我们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深植人民情怀,主动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要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功应对现实和未来将面临的复杂的风险和挑战。

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素有的精神气度,自立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及“自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这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自信自立的鲜明特质,彰显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充满着豪迈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自信自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条件。我们从国情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出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这些伟大实践的推进和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与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依靠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分不开,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分不开。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定力、有主见。特别是面对外部的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我们还要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中国发展方位,深刻洞察新的时代特征,赋予守正创新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改革发展中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守正创新又作了清晰的概括,强调“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新时代的十年里,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推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方面面的创新。我们党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新性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新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说了很多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涵盖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比如,我们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各方面共推出2000多项改革方案,推动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塑,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要坚持守正创新,继续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另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实践、现实和问题导向,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何切实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治理实践,如何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问题,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征。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在党的二十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15}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进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不断丰富发展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发展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善于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比如针对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再如,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舆论环境的问题,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这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

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内部各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领航掌舵,运用系统思维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局谋划和战略部署,提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在具体领域中,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坚持全国一盘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注重综合施策,整体布局系统谋划各项事业。我们将面对更加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面对更多两难、多难问题。前进道路上,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必须始终加强前瞻性思考,以科学预见形势发展和未来走势的智慧,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发展大势,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注重战略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必须始终加强全局性

谋划,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大局中进行思考和定位,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

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大党之大、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底色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之中。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坚持胸怀天下”集中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与实际行动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中国方案,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们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扎实推进国际减贫交流与全球抗疫合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以协商化解分歧,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这就更加需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并立足“两个大局”对我国和世界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综合来看,“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与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责任编辑:青山)

(校对:江南)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探析^{*}

向青山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用“全过程人民民主”统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话语方式的重大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有着丰富的内涵:原则和理念体现了“全过程”民主集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维;领域和范围体现了“全过程”民主涵盖,蕴含了丰富的系统思维;结果和效能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实效,蕴含了丰富的实践思维。三者的有机统一可以丰富我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全过程”的理解。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民主涵盖;民主实效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05-0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随后在同年10月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一理念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前后九次论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容涉及对过去成就的总结、对未来目标的设定、对当前工作的要求,形成了用“全过程人民民主”统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格局和话语方式。

自“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以来,学界对这一理念的研究已有数百篇文献,内容既包括其思想渊源、理论逻辑、制度路径、价值功能等,又涉及这一理念与人大、政协、法治、基层治理、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不过少有研究成果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已有的“人民民主”前面为什么加上“全过程”?这里的“全过程”到底蕴含怎样的深刻内容?其背后体现的是何种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思维?从理论上说,这些是需要首先梳理清楚的问题。

一、原则和理念体现了“全过程”民主集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维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这“四统一”的背后体现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和理念。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原则,也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而当我们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统一”时,会发现它与民主集中的原则和理念非常契合。

(一)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统一

民主一方面体现为选举、表决等活动中权利人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过程,过程民主是民主理念的基本内容,过程的“缺失”便意味着民主的“缺实”。我国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的过程要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都在时间、空间、顺序、条件等安排上保证了充分的发言、研讨、提问、表决等过程。在研讨或争论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更改原定议程,延长民主讨论的时间,保证过程民主的充分开展。

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主不是为了过程而过程,民主过程只是方便各方意见和利益的表达,目的是

* [收稿日期] 2022-11-15

[作者简介] 向青山,哲学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

制定被更多人认同或接受的法律或决策,产生对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的民主结果。所以在民主制度设计上,我们既保证民主讨论的过程,又确保“议而后决”。以人大组织和工作模式为例,人大代表的选举、代表的讨论和表决、各专门委员会的产生与工作方式,都充分体现过程民主;而常委会会议、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各工作委员会的产生与工作方式,则在发挥民主的基础上强调权力的相对集中行使以及决策的高效。

与中国不同,美西方议会过于强调民主争论的过程和各方意志及利益的表达,容易导致“议而不决”。一项法案在议会中反复辩论却难以表决,各方争论激烈甚至大打出手,党派之间类似“驴象之争”为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议而难决”“议而不决”的民主使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出现分离,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去除的“毒瘤”。著名学者福山指出,“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使政府难有大的作为,这种‘否决政治’严重损害了美国政治的效能,引发政治总体衰朽的趋势”。

(二)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

过程民主的规范性要求体现为固定化的程序规定,程序民主通过制度和法律保证民主过程得以顺利开展,是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体现。我国的民主制度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这在各种民主形式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定程序和规则。

在强调程序民主的同时,我们也强调实质民主。我们强调民主不仅仅体现为参与的程序,更体现为参与的实质效果。尤其是在认识论上,我们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一系列程序性要求,更体现为一种实质性定位: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和手段,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从而更好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全局,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发展人民民主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与中国不同,美西方民主制度更强调“程序正义”。在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中,民主主要体现为程序性要求,强调投票程序和竞争环节,而不

是实质性效果,对于“程序之后”的问题甚少关心。例如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选举中,青年政客也好,当红明星也罢,只要符合法定的竞选条件要求,都可以成为候选人,而只要获得法定数量的选票,就能成功当选。至于当选后工作能力是否胜任,对选民的前期承诺能否兑现以及多大程度兑现,却很难在制度层面得到保障。

(三)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

我国的民主制度既有直接民主形式,也有间接民主形式,一般而言,在基层直接民主体现得更充分,在中上层则间接民主体现得更多。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市级以上人大代表则由间接选举产生。在民主决策中,越是在基层,民众直接表决的情况越多;越是到高层,由政治精英、专家学者、民选代表等代为决策的程度越高。但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民主活动,事实上都融合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成分,乃至在党代会的报告和国家法律的起草制定过程中,也往往要认真听取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实事求是地说,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虽然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方面。以美、法、英、德四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议会议员选举为例:美国的总统是选举人团选举,属于间接选举,但参众两院议员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法国的总统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国民议会议员也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参议院的议员则是选举人团间接选举;英国下院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内阁首相由下院多数党党魁直接出任,上院的议员则基本上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联邦政府总理由联邦议院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确定,联邦参议院则由各州政府直接派遣代表组成。

(四)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民主的本质是要表达参与者的意志和利益,但不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对“参与者”有不同的规定和理解。人民民主所要表达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理解“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要理解“人民”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人民”与“公民”这一对概念做个对比:从概念属性来说,人民和公民都有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但相对来说,人民偏重政治属性,公民偏重法律属性;从主体属性来说,人民强调整体

性,公民强调个体性;从关联属性来说,人民更多地与国家相关联,公民更多地与权利相关联;从道德属性来说,人民强调集体性,公民强调利己性。

因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体的而非个体的利益,是全局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是长远的而非短期的利益。这样理解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两者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保障和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在保障和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捍卫和发展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脱离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理解个人权利,也不能脱离国家的根本利益来实践公民民主。

与中国不同,美西方大众民主与国家意志之间容易产生制度性和结构性冲突。他们把民主理解为相互冲突的个体意志和利益的表达,因而强调竞争性选举和多数决定规则。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多数人的决定并不总是好的:其一,这意味着少数人的意志受到压制,哪怕少数人的比例高达49%;其二,哪怕是绝对多数人的选择,也可能是非理性而短视的。例如高福利下的希腊债务危机,希腊政府原本想通过适当降低福利水平来缓解财政危机,但多数公众不愿压缩福利,在民主表决中未通过这一方案,致使债务危机日益严重。这是典型的多数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冲突的例子。

上述“四统一”民主所概括的四个方面各有侧重,但在关系处理中又体现了共同的原则和理念:民主与集中的结合,而且是从更加具体的方面,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和理念。从哲学上说,这一原则和理念的背后,又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即凡事从正反两方面去考虑去分析。

二、领域和范围体现了“全过程”民主涵盖,蕴含了丰富的系统思维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的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这“三全”民主的背后体现了民主涵盖的过程、制度与保障要求,体现了分析问题的系统思维。

(一)“全链条”的民主

“全链条”是就我国民主所包含的全部环节而言的,囊括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首尾衔接、环环相扣,确保民主流程各环节纵向贯通。二十大报告

对上述五个环节都有相关论述:在论述民主选举时强调“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论述民主协商时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论述民主决策时强调“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论述民主管理时强调“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论述民主监督时要求“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二)“全方位”的民主

“全方位”是就我国民主的制度完备性而言的,给人民民主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这些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还包括选举制度、政府制度、监察制度、问责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要政治制度,此外还包括爱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正是这些制度和机制的全方位保障,确保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横向延伸。这些制度和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都有相关论述: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强调“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时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论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时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论述爱国统一战线时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三)“全覆盖”的民主

“全覆盖”是就我国民主的实践保障而言的,是可以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的民主。之所以如此,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密切相关。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能否充分体现,需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以及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重要前提和保障,从根

本上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发展中的“全覆盖”。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在上述“三全”民主中,“全链条”是就民主的纵向贯通而言的,“全方位”是就民主的横向延伸而言的,“全覆盖”是就民主的立体布局而言的。“三全”民主就像数学几何中的三维坐标框架,体现了哲学上的系统思维,即从整体和局部、从系统和要素的关系角度去设计民主制度,推动民主实践。

三、结果和效能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实效,蕴含了丰富的实践思维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三最”体现了民主实效的够得着、摸得着、靠得着要求,体现了分析问题的实践思维。

(一)“最广泛”的民主:够得着

“最广泛”是指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广泛的渠道和多样的形式,因而是“够得着”的民主。这些渠道包括:(1)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的选举民主,尤其是县乡两级直接选举,这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2)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的立法民主和决策民主,包括立项建议、民意调查、听证论证、体验评估等多种渠道和形式;(3)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协商民主,这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也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4)基层民主,这是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包括基层选举、基层组织、基层自治、基层协商在内有多种表现。正是因为有广泛而多样的民主渠道,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距离的、够得着的民主。

(二)“最真实”的民主:摸得着

“最真实”是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是真实而通畅的,因而是“摸得着”的民主。早在苏维埃政府时期,我们的民主就是真实而通畅的。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

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在政府代表中妇女占比达20%以上。在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15.7%,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20.6%,妇女代表占24.9%,少数民族代表占14.7%。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介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党中央进行了两轮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达到4700多人,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集意见达850多万条”。这些数据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具体的、可触摸感知的。

(三)“最管用”的民主:靠得着

“最管用”是指民主的渠道可以起到作用和效果,因而是“靠得着”的民主。从小的层面来说,人民群众通过诸多民主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捍卫权益、提出建议、进行监督等目的;从大的层面来说,党和国家可以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到“六个切实防止”:(1)党的领导,切实防止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2)人民五个民主,切实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3)政党制度,切实防止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防止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5)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6)民主集中制,切实防止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在上述“三最”民主中,“最广泛”是就民主的渠道多元而言的,“最真实”是就民主的渠道畅通而言的,“最管用”是就民主的实践效果而言的。“三最”民主在实践中够得着、摸得着、靠得着,体现了哲学上的实践思维,即从实践运行、体验和效果方面去评价民主制度,完善民主程序。

结论

“四统一”民主从原则和理念上体现了“全过程”民主集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维;“三全”民主从领域和范围上体现了“全过程”民主涵盖,蕴含了丰富的系统思维;“三最”民主从结果和效能上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实效,蕴含了丰富的实践思维。三者的有机统一可以丰富我们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全过程”的理解。

(责任编辑:木杉)

(校对:江南)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 生成逻辑、内在意蕴与基本遵循^{*}

毛磊 张今誉

[摘要]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势递进转化为话语优势的关键。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维”审视来看,沿循“理论—历史—现实”的生成进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为话语根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百年嬗变为话语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为话语要求;按照“立场原则—内在特征—实践路径”的基本思路,系统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意蕴;基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载体”的四维向度,搭建真理指引、理论指导、人民创造、规律推动、体制保障、传播增信的实践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基本遵循。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09-10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话语体系是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针对国家特定发展战略建构与完善起来的一整套完整的话语概念、话语范畴以及话语表达等系统体系。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与发展现代化理念、现代化目标、现代化布局、现代化步骤、现代化特征、现代化内容、现代化旨归等领域的全方位系统表达。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党和国家宏观政治话语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直接关乎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力、文化交流的主动权、道德发

展的引领权,影响着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现代化建设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继承与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彰显党的执政智慧和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原发性思考、创新性理论、时代性概念。本质上讲,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话语格局正在加速重构,如果“有理没处说,说了传不开”^{[2]199},将导致“失语就要挨骂”^{[3]117}的被动局面,如何创新与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最新成果,已成为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推进现代化实践的重大现实与理论课题。因此,本文围绕“实现什

*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22KBS155);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基础研究”(21sx008)。

[收稿日期] 2022-06-09

[作者简介] 毛磊,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助理,621010;张今誉,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621010。

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主题,探源与寻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厘清与阐明其内蕴,揭示与探索其构建的基本遵循,旨在促进我国现代化话语自信,增强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理解与认同,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话语主动权。

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现代化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要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出发,夯实现代化话语根基;从百年来党的现代化实践出发,寻绎现代化话语基础;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要求出发,增强现代化话语自信。

(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的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质,并将“现代化”话语内嵌于构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设想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化”方法逻辑上,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了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相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领导人民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引现代化实践,推进形成整体与局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与安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等的现代化辩证体系,增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超越资本主义“富非人民之富”的现代化逻辑,把人民利益福祉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导向。

在“现代化”目标任务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基于达到“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对现代化目标作出精辟概括和形象表达,即“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4]652}。新时代党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视域下“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话语表达,是立足党情、国情、世情对马克思

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创新和发展,进而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赋予科学性、真理性 and 实践性,使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更具科学引领力。

在“现代化”内容特征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囊括党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如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保持党的纪律”“生产资料的集中”“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人民当家作主”“个人的全面发展”“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等理论和观念,展望了未来社会党与群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好愿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阐释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话语资源为指导,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丰富与创新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二)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百年嬗变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探索和认知具有清晰的百年演进历程,历经了现代化话语萌芽、确立、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厘清与阐明特定发展时期党现代化话语概念、内涵、范畴的变迁,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现代化话语的萌芽期。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境遇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党意识到“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5]511}，“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是打败敌人的关键”^{[6]146}。这一阶段,为推动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7]1433},党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促进“军事现代化”向“工业现代化”的转变,并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现代工农业”总体构想和“两步走”时间战略、“两次转向”空间战略,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1437}。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现代化话语的确立期。在这一阶段初期,由于苏联现代化经验影响使得党仍将“工业化”“工业国”作为“现代化”话语内

核。但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加深,党意识到“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8]614},因而先后提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三个现代化以及“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并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9]584},标志着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初步确立。

改革开放时期是现代化话语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处在发展走向何处的重大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必须“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0]141}。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概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使用,开创了话语体系构建的崭新局面。党的现代化话语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统领,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新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推动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步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上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总布局逐渐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完善为“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规划从最初“两步走”更新为“三步走”、新“三步走”战略,并衍生出“两个大局”“四个板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现代化话语内容,实现中华民族由“站”到“富”的伟大飞跃,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现代化话语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以习近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两个大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现代化话语目标;以“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为战略规划;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统筹谋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时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远景目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表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赋予新

任务、确立新方向,从而推动党现代化话语不断趋于成熟定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1]2}。

(三)现实逻辑: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
时代要求

新时代呼唤新话语,新时代孕育新话语。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11}。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战略全局”的时代交汇,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迫切要求用最新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来指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摆脱现代化“失语”困境,掌握现代化话语主动权,增强现代化战略自信的现实要求。“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13]14}。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现代化实践,成功使中华民族摆脱“挨打”“挨饿”的局面。当前不断创新现代化话语体系,根本上就是要摆脱“挨骂”处境。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思想文化交锋日益激烈,我国“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211},加之西方国家长期的文化霸权,在国际社会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国外某些政治势力出于政治考量,将“中国现代化模式”简单化,并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对立起来,导致我国在国际上的现代化话语被歪曲,现代化话语权被剥夺。因此,我国要在现代化话语领域主动发声,夺回话语权,就亟需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绩,递进转化为现代化话语优势,掌握现代化话语主动权,扭转我国在世界范围的话语被动局面,进而坚定现代化道路自信。

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
内在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性地提出诸多现代化原创性思考、创新性理论、

时代性概念。本文遵循“立场原则—内在特征—实践路径”的基本思路,系统呈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容体系。

(一) 立场原则

第一,秉持“人民、国家、民族、人类”立场。党的百年现代化实践始终坚持“人民、国家、民族、人类”立场,走出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人类谋大同的现代化道路,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追求。从人民立场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的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着眼时代、根植实践、放眼未来进行选择 and 创造的结果。没有人民就没有现代化,“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1],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现代化实践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坚守人民立场,打破西方资产阶级只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狭隘模式,以人民福祉为导向构建以“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话语表达,勾勒出“人的全面发展”美好图景。从国家立场来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国家话语的递进转变,深刻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怎样实现现代化国家”这一核心命题深入推进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走向,为在不同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引了方向。从民族立场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4],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对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行不断探索与完善,实现我国现代化话语模式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探索的跨越,构建形成以“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为建设目标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凝聚起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力量,推动阶段性现代化建设目标不断实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1]。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与伟大复兴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来阐述

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统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新时代的中国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从人类立场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现代化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经验相结合,形成能够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5]。这既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垄断,破除“西方中心论”壁垒,掌握现代化话语权和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又是造福世界人民,为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奉献出中国智慧和方案的正义之举。

第二,坚持“求是求实”的科学原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始终秉持“求是求实”的科学原则,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本土、把握时代潮流,不断实现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创新。“求是”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递进性、实践性和可检验性特质。在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中,党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中国化、本土化、时代化,才能够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党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创新,善于利用新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指导新的实践,使党现代化话语呈现出递进性、实践性和可检验性特质,展现出后现代国家以更有说服力的话语力量独立解决现代性难题的科学原则。“求实”是党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过程中的务实原则。一是学习型现代化话语品质。作为后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现代化话语始终以开放的体系,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在自觉审视自身国情基础上进行不断修正创新,有效规避简单套用、照搬经验的现代化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现代化道路。二是探索型现代化话语品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基于党在宏观上着眼长远、微

观上立足当下的统一把握中,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阶段性特点为依据,分时期、分阶段、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务实性。

(二) 内在特征

第一,“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辩证统一的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根本保证。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方向性来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定海神针”核心作用,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遵循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为我国现代化推进提供正确指引;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坚持立场原则、涵盖诸多领域、内蕴辩证逻辑、呈现任务目标的创新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应对话语体系建构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系统协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内容的科学完整和话语优势的有效彰显,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人民至上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根本立场。本质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以“人民话语”为根本立场构建而成的话语范式,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导向。将“人民至上”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全过程、各方面,是新发展阶段凝聚人民力量推进现代化实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理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所共同决定的。

第二,“问题导向”与“目标指向”互动协同的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指向”的互动协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发展。问题导向是目标指向的基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0}。问题逻辑是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视域,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以“问题”为现实导向和重要遵循,努力为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现实支撑,确保现代化话语体系有着导向明确的完整内容体系、科学有效的现实指导效力。因此,从

问题逻辑出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成为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和重要发力点,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点。新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矛盾问题呈现出交织叠加、复杂多变等新特点,解决矛盾的艰巨程度前所未有,给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全新要求。必须增强问题意识,聚焦现代化实践的深层问题、重大问题、突出难题,在有效应对与解决问题中丰富与发展现代化话语体系。目标指向是问题导向的动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内蕴着科学的目标指向,统摄着现代化话语体系内在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规定着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原则特征。正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指向下,我国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才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明确了新时代新阶段“为什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怎样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等重要问题。

第三,“物”与“人”相互耦合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关照“物”和“人”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现代化社会的理想场景表现为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现按需分配、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本质规定为物与人的统一。首先,“物”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目标不是空洞的,是在以“物”为支撑的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以“人”为目标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深刻提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7]164},现代化是建立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其最终归宿是推动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本质。其次,“人”的现代化推动“物”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激活和释放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为物实现现代化提供体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人的现代化为物的现代化提供保障,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物的现代化。新时代人民话语主体的建构,就是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18]28}。最后,

“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在本质。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既是要实现“物”的现代化,也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9][170]},这个“富裕”不是简单的物质富裕,尤其将实现“自由联合体”作为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积极追求,必须是物质与人的共同富裕。新时代党的“共同富裕”观使国家建设与人民发展一致起来,兼顾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幸福标准的统一。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交相辉映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13-14},这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全新阐释,将现代化道路延展至人类文明形态,成为新时代现代化体系的内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在百年现代化实践中创造的全新之路。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历程,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走向现代化的先发性,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纷纷效仿的范本。但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暴露出弊端和问题。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模式,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正视中国现代化历史事实,把握现代化历史机遇,将现代化发展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相统一,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充分证明“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20]17}。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对“人类性”问题的时代破解与文明探索。面对原发性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独具中国智慧和中华文明的方案,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三) 实践路径

第一,走一条“全面—内生—并联”式的复合型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有别于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串联”范式。我国走出一

条“全面—内生—并联”式现代化道路,是对我国现代化话语范式的全新表达和认知。“全面”是现代化布局从单一向多元拓展的总体性范式。一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性,表现为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和内容的完整性。党的现代化话语从最初只聚焦于军事领域到“四个现代化”物质层面,再到“两手抓”,历经“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在新时代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二是中国现代化文明的全面性,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一体的总体性文明进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动力范式。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西方国家的裹挟中被迫起步,呈现出自发、被动、移植和模仿的基本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自己的路”,在现代化理论求索过程中基于现实变革要求,从多维探寻现代化话语资源转向多元整合创新性理论体系,并通过对各种现代化因素的有效运用,形成具有内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社会结构矛盾的把握和突破,为新时代党的话语体系赋予主体性、原创性的生机活力,成为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前行的思想武器。内生性范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现代化发展固有逻辑,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道路,二是克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对现实的观照转化为哲学问题,并以哲学方式进行研究解答,促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三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展示出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并联”是“四化”齐头并进的路径范式。一是指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时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多重性和叠加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共时性的,从而催生出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的“并联”范式,推动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二是指“四化”效果的呈现依赖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驱并进。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的“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农业文明”等,成为“四化”实践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自主型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兼容性理论框架,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和突破,形成具有稳定性、人民性、和谐性、全面性、系统性、开放性、世界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一方面,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资本逻辑。首先,中国在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三维一体的现代化实践中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引发的种种矛盾和对立,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的发展条件;其次,西方模式的资本逻辑暴露了其在经济、政治、生态等各方面的逐利本性,从而造成人本位缺失、贫富差距、生态危机、国际关系紧张等各种问题和冲突。对比之下,中国切实构建“共同富裕”“和谐共生”等具有稳定性、人民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自利性和狭隘性;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范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排他性,以“强而不霸”逻辑超越西方“国强必霸”的狭隘眼界,成为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全球发展的积极贡献者。另一方面,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封闭僵化的现代化模式。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秉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现代化概念,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抓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倡议布局建设,构建平衡、全面、可持续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从而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片面性、失衡性;三是突破传统社会封闭保守的国际交往格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形成新时代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第三,走一条以“中华文明”为底蕴的创新型现代化道路。本质上,中华文明承载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文化底色。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归根到底是党在现代化实践中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的互动结果。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不同的文明环境造就不同的现代化风格,在中华文明哺育下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现代化话语体系,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鲜明个性。

从传统文化“尚统一”“和为贵”“求大同”“重民本”的社会理想到新时代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实践,党的现代化话语表达实现了中华文明资源的转化运用。“古为今用”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稳定的民族心理、共鸣的价值理念,提升了话语阐释力和引领力,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气与信心。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体现为,以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为核心,通过对其内涵和形式加以改造,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如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创造性阐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君舟民水”传统民本思想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观点;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表达;由“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传统法治思想转化为“依法治国”新概念。创新性发展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华文明体系的双重创新,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增强其时代感召力和影响力。以“民主”概念为例,提出其既是党对传统儒家“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思想的吸收借鉴,又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的启示和表达,创新性丰富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并赋予新的话语价值。

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遵循

基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载体”的四维向度,搭建真理指引、理论指导、人民创造、规律推动、体制保障、传播增信的实践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基本遵循。

(一) 话语本体: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及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及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作为开辟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1][13]}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始终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

说为指引,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作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价值起点,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全过程各方面,使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提升现代化话语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为新时代党的现代化实践提供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自信。同时,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发展性理论品质要求新时代党现代化话语必须以全新的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新境界,形成当代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增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第二,坚持以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为指导。一方面,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话语风格、话语逻辑、话语内容、话语特色、话语方向、话语要求等,成为创新发展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本遵循。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顺利进行和成功的关键所在,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和话语保障,从而强化现代化话语权和发展主动权,为现代化建设赋予合法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通过系统阐述新时代现代化实践的发展目标、战略步骤、实现路径等,形成一整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艺术性、哲学性、学理性、实践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展现了中国现代化模式高度的自觉自信、崇高的价值追求、真挚的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二) 话语主体:以增强人民主体地位为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1]¹¹⁸。人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史上伟大奇迹的缔造者,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话语主体,只有将人民作为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才能彰显现代化话语的生命力、提升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自信。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建构的合法性依赖于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中国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正是这一区别,在当今世界因“社会撕裂”“种族歧视”而难以稳定的时候,中国以稳定发展呈现“风景这边独好”。在我国现代化实践中,人民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满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夯实了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得以站得住、走得好、行得远的根基,也成为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所在。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依赖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民在现代化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不懈探索做出的正确选择,而党现代化话语来源于人民的现代化实践,这是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起点;其次,人民群众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决定力量,是现代化事业的贡献者,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地位,能调动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的积极性,从而广泛凝聚全社会的蓬勃力量;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人民是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共享者,人民理应是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三) 话语客体:以统一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立足点

话语客体作为话语之对象,以现代性问题为出发点,以统一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立足点,内嵌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一个国家遵循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规律,关键要看这个规律是否能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现代性问题。首先,在现代化话语百年建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创造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争摆脱“失语就要挨骂”的被动处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学说所呈现的一般规律作为党现代化话语立足点,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次,中国现代化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起步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必须把握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学习和借鉴先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经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

建设道路,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最后,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把握,不仅要遵循一般规律,还要立足自身的特殊规律。因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22]8}。将统一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作为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立足点,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与中华文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既写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新的版本,又改写西方现代化旧模式,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创新融合,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四) 话语载体:以建立与完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为保障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亟须依靠作为体制机制的话语载体来保障。本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是否有序、有效,体制机制保障是关键。为将现代化体系建构做实、做好,应建立反映中国国情、符合新时代现代化实践要求、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因此,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与完善以党为领导的现代化话语体制机制体系。党是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积极构建者和坚定执行者。党的现代化话语体制机制体系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层级的复杂综合体系,涵盖的领域十分丰富,是党对内增强现代化话语自信、对外掌握现代化话语主动权的重要保障。二是立足现代化话语结构逻辑,系统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现代化话语体制机制,使各类现代化话语要素互联互通,促进彼此间的交融协同,从而共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图景。三是创新现代化话语体系传播和交流机制。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产生引领力、主动权、话语权的关键,更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目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理解、接受与认同,依赖于党对现代化话语的双向传播与交流。一方面,加强现代化话语的国内传播与交流。政府作为话语体系传播的主要倡导者、引导者,要积极制定激励政策,完善奖惩机制,协同多元传播主体,开拓话语传播平台,丰富现代化话语传播途径和方式,创新话语传播内容和机制,使人民群众在开放互动的话语语境中潜移默化增强对党现代化话语的

认同感和自信心。人民群众作为现代化话语主体,只有真学、真懂、真信,才能切实推进现代化话语传播与交流。要注重对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大学生的理论教育与传播工作,因为“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23]175}。另一方面,加强现代化话语的国外传播与交流。话语的国外传播与交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工作。要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发展机遇,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完善国际传播格局,创新国际传播手段,以更加贴近国外受众的方式、更有生动性和共鸣感的语言,站在全球视角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去,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扩大国际朋友圈,增强中国现代化话语自信和对外发声能力,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智慧和方案被世界上更多国家接受、认可和借鉴。

四、结论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以丰富独特的内在意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世界现代化建设潮流中一个具有地域特殊性和文明规定性的新样板,不仅使中国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步伐,更呈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面貌,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为了持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亟须以“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载体”这四维向度为抓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促进新时代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学说最新成果为指导,使中国走出一条更加自主、创新、开放、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汇聚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4]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7]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0]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22]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青山)
(校对:木子)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及其经验*

刘福军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事业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积累了两条重要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中,积累了两条重要历史经验,即“两个必须”: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相结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分别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质和主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有神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19-07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认识和对待有神论问题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其基本观点主要包括:有神论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各种复杂的根源,并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要善于同宗教有神论作思想斗争;不能简单地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团结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逐渐摆脱有神论的束缚,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要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无神论宣传要服从党的基本任务,无神论宣传要讲究策略,等等。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应有之义。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

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534}的论断,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宗教的世俗社会,中国人民注重在现实世界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这种特殊的国情、社情、民情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是指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建党百余年来,党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形成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研究”(17BZJ013)。

[收稿日期] 2022-07-28

[作者简介] 刘福军,历史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00101。

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划清了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思想界限,阐明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观点,形成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正确的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坚持和运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索我国宗教问题,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世俗迷信,抨击封建礼教,弘扬科学真理。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的文化侵略。1923年11月,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须特别注意宣传“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等,要尽力“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2]353-354}。这表明,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而且还向人民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传播科学常识,自觉地把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发展视为自己的初心和价值追求。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特别是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回答了什么是神权、如何破除神权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

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神道地主包括社、神、坛、庙、寺、观,其中寺和观是剥削厉害的地方;破除神权和迷信观念要服从党的中心任务,神权的破坏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泽东还提出了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观点,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3]33},实际上阐明了有神论存在的长期性和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原则性、策略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推动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走向成熟。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强迫别人遵从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意识和世界观的问题”^[4];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与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707};中国共产党人“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5]378},决不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阐释了迷信的基本内涵、产生原因、社会危害以及破除迷信的途径,指出“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神仙鬼怪命运灵魂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6]29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武装,“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7]120};要做广泛的耐心的灵活的反迷信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引导群众同自己的迷信作斗争;迷信的真正消灭,最根本的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针对群众的迷信观念,毛泽东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指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8]1011},实际上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消除迷信思想观念这一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丰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跃。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唯心历史观的破

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献中的有关阐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论者,“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9]1516};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新中国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努力发展自然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10]766-767}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情和发展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阐明了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当相互尊重、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科学主张,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巩固了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继续发展了毛泽东无神论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领导我国宗教界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破除封建迷信、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实践中,党把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不能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不能强迫人们信教或不信教;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绝对不是对共产党本身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言,而是对国家而言”^{[11]670};反对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要围绕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12]410};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应避免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不搞反宗教运动,“我们所遵守的约束是不到教堂里去作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

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13]181-182};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团结一致,要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曲折发展。在艰辛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领域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要坚持用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和批判神学,“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14]353};无神论与有神论是世界观问题,意识形态上“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15]331},同时要注意策略;要团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自然压迫的解放斗争,不能“用抽象的有神论和无神论,用信教不信教或者信什么教的问题,来分裂人民群众的革命团结,妨碍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16]676};要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和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及教育,逐渐破除迷信”^{[16]677};统一战线是按政治划分的,不是按宗教信仰划分的;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该互相尊重、团结合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调整政策,党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做了重要准备。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

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无神论基本观点的凝练和总结,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关于无神论基本观点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实践中,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无神论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17]267},这不但不应妨碍而且应当加强普及科学教育的努力,加强反迷信的宣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得信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和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宣传;不能片面强调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要团结他们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任何人都不得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是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18]64};坚决打击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19]1182};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20]225}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无神论基本观点的形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揭批伪科学、取缔“法轮功”的斗争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无神论的基本观点,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不仅不能信教,不准参与、鼓励各种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活动,而且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和科学世界观,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的正确观点;在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的矛盾上,要自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立场;

要坚持不懈地普及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医疗卫生、科学健身和生老病死等方面的知识,加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帮助和引导人们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21]1041};要把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习俗与封建迷信区别开来,把正常练功健身与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区别开来;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不能简单地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思想信仰虽然不同,但在爱国、维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一致的”^{[22]384};对信教群众也要大力开展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工作。

科学发展观关于无神论基本观点的形成。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高度重视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积极构建和谐宗教关系,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关于无神论的基本观点,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坚持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坚持“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23]430}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宗教”^{[23]477-478},全面认识宗教的根源,全面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全面认识宗教的复杂性,全面认识宗教的群众性;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阐明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基本路径、工作要求、根本保证等,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和创新工作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要锲而不舍地进行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其标志性观点主要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在全社会要大力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宗教理论和无神论的宣传,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4]172};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促进“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24]169-170}的和谐;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坚持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共产党员“应当团结信教群众,但不得信仰宗教”^[25],不能“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26];要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防范极端宗教思想和非法宗教势力渗透”^{[27]18};不能把宣传无神论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立起来,“不能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能因为有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就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打入另册”^{[28]559-56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无神论、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新境界。进入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着力点,坚持以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重点对象,坚持问题意识和正确方向,既要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又要最大限度团结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

五、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积累了两条重要历史经验,即“两个必须”: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相结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分别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质和主题。这两条经验,对创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方面,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相结合。这条历史经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二要立足中国国情、观照现实问题,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在深化认识和解决有神论问题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新境界;三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基因,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宝库,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提供源头活水,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

义无神论中国化,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关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研究及其宣传教育工作。进入新时代,要认清我国发展新方位,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神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论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这条历史经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主题。这一主题,既关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也关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前者是对事不对人,后者是对人不对事,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进程,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的过程,通过揭示“神”的本质、根源和消亡规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进程,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的过程,通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坚持不懈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抵御宗教渗透和破除世俗迷信,同时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进程,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过程,通过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进程经历了四个时期,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无神论

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这些无神论思想成果,都属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成果,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思想沃土,都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作为主题主线,都把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最大限度团结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促进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关系和谐作为根本任务,都把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在破除封建迷信、抵御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确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团结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致力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团结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N].新华日报.1942-02-15(01).
-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3]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6] 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17]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G].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 [19]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20]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1]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3] 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 2021-01-06(01).
- [26]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03(01).
- [27]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木 杉)

(校 对:木 子)

民族复兴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何良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中,始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对外交往工作的使命所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外来干涉,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保持对外开放并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本民族复兴事业与各国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坚持天下情怀,彰显世界担当,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对外工作,做到了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聚焦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践行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胸怀天下并致力于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外交;大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26-07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对外工作以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以及总体外交战略为宗旨。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党就在把握民族命运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兴衰的基础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的行动指南,并不断依据时代特点对外交思想与实践做出调整和更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做出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的庄重宣告。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前所未有的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目标。与此同时,我们既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国际格局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严峻挑战,也肩负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目标。因而仍然要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这一主线,在此基

础上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时”与“势”。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相关研究论文较为丰富,但把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相结合的系统性分析论证成果并不充足。鉴于民族复兴的重大目标性意义,本文尝试以民族复兴为逻辑关键,对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演进过程、内蕴进行梳理,旨在为理解百年大党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线索,并结合“胸怀天下”这一宝贵奋斗经验,从外交视角思考如何奋发有为把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一、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

民族复兴是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驱动,亦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政治观、国家观与世界观有着巨大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

* [收稿日期] 2022-09-05

[作者简介] 何良,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

族伟大复兴。”^[1]民族复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外交理念的基本遵循,也是其对外交往实践的路径导向,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 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民族复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积贫积弱、饱经屈辱环境下催生出的思想共识。近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就如何实现民族复兴拿出自己的答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做过尝试。但都由于各自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对内不能实现经济繁荣与人民生活富裕,对外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扛起了民族复兴的大旗,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动员广大无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主要口号与动力来源,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之路成为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自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民族复兴这一思想,将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关键目标。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也多次重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民族复兴进一步成为指引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的根本行动指南。

(二) 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的使命所在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任何国家的外交都要服从本国的整体战略和根本利益。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世界的中心地位,进入近代后中国才因外部入侵而遭受“百年屈辱”。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2]。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外交事业,对外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服务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发展。在历史征程中,我们既迎来了由大到强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改革转型和大国竞争的风险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时代背景,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开放包容的世界体系。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3]。因此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积极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为国内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联通的视角看,我们对外工作的重要使命还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关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身发展与世界福祉统一起來,反映了其在复兴大业进程中的国际胸怀和责任担当。

(三) 民族复兴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续奋斗

在“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双重塑造之下,中华民族伟大民族复兴具有复杂内涵,从而决定了复兴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4]。从历史对比中可见,中华民族古代的辉煌不在于庞大体量和军事霸权,而更多体现在它为当时东亚各国贡献了包括语言文字、价值理念、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等一整套有借鉴性的灿烂文明成果。基于此,实现民族复兴至少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具体目标,一是安全保障,包括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拒止外来干涉、确保国家平等和民族尊严等;二是发展富强,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实现国力强盛、百姓富裕和可持续增长,特别在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方面实现对西方水平的赶超;三是文明感召,重构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与现代化模式,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文明新形态。民族复兴并非易事,例如,从发展层面来看,我国仍然表现出某种不平衡不充分,在部分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从安全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外部环境仍有动荡,面临大国竞争的风险与考验,存在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安全等隐患。综合来看,尽管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时间维度来观察,一个古

老文明的全面复兴仍是一项宏大且漫长的事业,需要数代人在坚强领导核心的带领下付出锲而不舍的努力。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实践的百年演进

(一) 争取独立自主:为革命事业奠定基础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奋斗目标。党的一大决议中指出:“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5]6}党的二大宣言写明,要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确立奋斗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5]133}。而在党的四大上,号召被压迫的民众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坚持独立自主。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相对弱小时期,仍追求民族独立的奋斗目标,坚持探索对外交往之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担负起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重任,坚决主张抗日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宣言》,“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6]245}。1935年12月,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加剧,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时刻,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国际国内联合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7]347}。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8]198}。同时明确阐述了对于外交问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9]1085}这就为新中国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内外政策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从党的一大到七大,中国

共产党在战争与革命中不断成长直至走向成熟,在坚持依靠自身力量英勇奋斗的同时,积极培育世界眼光,在救亡图存中发展对外交往,争取革命援助,为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 反对外来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环境依然非常复杂,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对抗的政策,极大威胁着中国的和平与发展。1949年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0]768}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保卫新生政权生存、维护主权独立完整、争取更多国际承认为目标开展对外交往。在积极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援助的同时,清理旧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重新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中国共产党很快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积极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周边邻国发展友好关系,迅速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特别是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也被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面对西方势力对华的敌对态度,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时刻准备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1950年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在战争中人民志愿军迎难而上、敢于亮剑、愈战愈勇,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空前提升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为国家经济建设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58年毛泽东拒绝了苏联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非分提议,之后两党两国关系从破裂走向恶化,中苏在外交、经贸合作、意识形态宣传、边界领土等多领域矛

盾不断升级,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程度急剧上升。直至1969年3月,中国对入侵珍宝岛的苏军进行自卫反击,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大国控制的决心从没有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不受侵犯的政策更没有变。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上坚持“两个拳头打人”的同时,大力支援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动反帝反殖反霸反修的国际联合阵线向纵深发展,积极巩固同他们的团结友好关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考量国际局势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构想,并依据这一思想框架调整外交战略。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由敌对走向正常化。这一改变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事件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国际舞台。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日本、欧美各国家的关系得以迅速提升,迎来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为之后打开外交格局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三) 扩大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之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拓展与各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与之相适应,中国外交政策也做出重大调整,对外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到借力推动作用。邓小平抓住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此时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为彻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论亲疏,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同一切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在1982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11]135}在这一方针指引下,1979年1月中美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人员交流都得以迅速发展,但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僵化了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也从对立走向缓和,最终实现正常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普遍诉求,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更宽广的国际空间。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维护安定平稳的国际环境,紧紧抓住战略机遇顺势而上,充分利用外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中谋求发展优势。总的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核心利益上坚守了原则,同时在具体政策上体现了高度灵活性。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1]13}同时保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基调,既不“扛旗”不当头,也不屈从于外来压力,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追求,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领域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形成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包括深化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活动,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紧密相连。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实现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12]528}总之,我们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出发点,正确把握全球化、多极化大势,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由“谋富”到“求强”,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迅猛迈进。

(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外交彰显民族复兴

中国已深度嵌入世界,世界与中国不可分割。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正确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这一理念就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高频词,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从基本内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球相互交融、荣损与共的实然状态,不搞排他和对抗,在种族、国别、宗教、制度这些类属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同时,将对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作为最高价值诉求,力求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现实基础之上进一步培育团结信任、互利合作的理念。这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之问的创造性回答,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已然具有了更崇高的世界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我们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更以天下为己任,把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作为历史使命。具体来看,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新时代的对外工作重点布局在以下几个方面: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包含三个内涵:相互尊重是前提,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公平正义是准则,强调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合作共赢是核心,呼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13]。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体现,规定了国家间相处的应然方式,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4]。“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最初基于周边而提出。它秉持开放合作理念,以交通、能源、通信、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以资金流通、文化交往为内核,推动亚欧大陆的复合型互联互通。随着铁路、港口、管网等一个个重大工程不断铺开,周边沿线国家陆续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目前已成为中国所贡献的最引人瞩目的公共产品,把中国

人民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为我国发展赢得良好周边环境。

践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义利兼顾、重义轻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新中国大国姿态的优良作风。中华民族从来不见利忘义,一定会坚守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正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无私仁义、建设全球家园的责任道义^[15]。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能一以贯之地做到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不搞以大欺小、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此,中国积极推动南南合作,特别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建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解决好极端贫困、粮食安全、经济复苏等问题,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随着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和非西方力量的增强,全球治理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动作为、勇于担当,逐步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建设者转变成引领者。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到呼吁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到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我们在气候变化、全球减贫、非传统安全、多边贸易、海洋、太空等诸多领域都拿出了应对之道。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正在形成,为破解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新原则新途径,践行了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承诺。

三、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的百年宝贵经验

百年党史亦是一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在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外工作服务于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总结这一历程可以得出许多宝贵经验,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重要借鉴。

一是坚持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蓬勃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和最大政治优势^[16]。回顾百年历程,外

交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离不开党中央的科学研判、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作为党对外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涉外方针、政策,在战略层面确立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和基调。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正确判断世界大势,抓住时代机遇,创造性开辟了对外工作新局面。其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分别在苏东剧变和世纪之初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要求,对外交工作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发展,分别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而不同”“和谐世界”等理念,为21世纪我国的全方位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显著提升了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二是聚焦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内政和外交始终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对外工作应结合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谋篇布局,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的实践中体现作用和价值。党的对外工作的历次调整与开拓,都与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密不可分^{[17]275}。譬如,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核心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对外工作的重点就体现在积极促成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争取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帮助。革命胜利后,对外工作要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服务,因此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积极互动,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确立起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成为工作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党的对外工作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融入全球化国际体系,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实践表明,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在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上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不断拓展工作广度和深度,才能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18]。

三是准确把握时代变化和 world 大势。深入分析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局,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

遇和风险挑战,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策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党的对外工作顺应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世界潮流,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作为重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形成两极格局,我们保持独立自主并站在和平民主阵营一方,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坚决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且于我有利,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成为时代潮流,我们在外交上也充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近十年世界加速变革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各种挑战也层出不穷,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习近平同志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趋势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应对世界变局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取得新进展。

四是践行处理党际关系基本原则。外交工作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只有遵循正确的原则方能确保对外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革命时期和美苏冷战阶段,中国共产党更多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出发,外交活动带有较为激进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后,在深刻总结党的对外工作和国际共运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其核心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制度差异,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经过四十年的实践检验,这一原则被证明是构建全面、健康、持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关键,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起,成为开展党对外工作的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党关于对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创造性提出构建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支持。目前,中国共产党同全球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联系,搭建了一系列高层次对话平台,携手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政党的贡献。

五是坚持胸怀天下,致力于携手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大党之大、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

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世界眼光将中国的前途和人类命运相连。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民族平等自决,坚持合作共赢发展。新时代“胸怀天下”集中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与实际行动中。围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中国方案,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鲜明旗帜。我们坚持互惠互利、不搞零和博弈,与沿线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了开放联通的国际合作新平台;我们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扎实推进国际减贫交流与全球抗疫合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开展世界文明对话,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以协商化解分歧,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只有坚持立己达人,秉持天下胸怀,才能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为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推动人类发展的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行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7-01)[2022-08-25]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1/content_5621846.htm.
- [2] 吴志成,吴宇. 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2):4-23.
- [3] 人民日报评论员.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代华章——四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N]. 人民日报,2018-06-27(03).
- [4] 李开盛.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演进与当代发展[J]. 国际展望,2021(3):26-41.
-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1921—1949):第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3] 凌胜利. 新型国际关系擘画人类未来[N]. 光明日报,2018-02-01(12).
- [14] 新华网.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EB/OL]. (2013-10-25)[2022-08-2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 [15] 秦亚青. 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J]. 求是,2014(6):55-57.
- [16] 宋涛. 波澜壮阔 百年辉煌——写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之际[J]. 当代世界,2021(1):1.
- [17] 王家瑞.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
- [18] 吴志成,刘培东.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百年探索与思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145-154.

(责任编辑:木 杉)
(校 对:江 南)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历史成因、 鲜明特征及传承路径^{*}

赵杨娟 莫佳思

[摘要]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特殊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为民牺牲的大无畏性、思想影响的深刻性、精神地位的特殊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特征。当前应当明确多元传承主体,探索有效传承机制,创新多样传承方式,促进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关键词]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历史成因;鲜明特征;传承路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33-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批革命英烈为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牺牲于雨花台及南京周边的狱中斗争或地下斗争中,被称为“雨花英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视察江苏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雨花英烈在生死抉择重要关头表现出来的独特精神品质,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而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

一、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历史成因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马克思主义哺育下和特殊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生

成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的深厚沃土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真理、坚守信仰的理想追求,人格高尚、德性完美的道德情操以及大义凛然、不畏牺牲的大丈夫气节一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命脉,并成为雨花英烈获得精神文化滋养的重要来源。“士不可以不弘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崇高理想,深深熔铸到雨花英烈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血脉中,激发他们自觉为国家和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仁者爱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高尚道德,助力雨花英烈塑造完美人格,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牺牲精神,激活雨花英烈“为理想献身”的内在生命力,展现共产党人革命到底、视死如归的勇气与豪情。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和浸润下,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才得

* [收稿日期] 2021-11-23

[作者简介] 赵杨娟,教育学硕士,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干部学院)讲师,210012;莫佳思,法学硕士,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干部学院)讲师,210012。

以形成。

(二) 马克思主义是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这既根本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和精神谱系。雨花英烈中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如邓中夏、恽代英、黄励、高文华等众多雨花英烈,在受到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的熏陶后,获得了真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思想上,他们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出路。在实践上,一部分人创办进步刊物,唤醒更多同志投身正义事业;还有一部分人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带领广大人民开展革命斗争。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就不会有雨花英烈革命精神。

(三) 特殊的革命斗争是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雨花英烈与敌人的斗争是极为特殊的。从时间维度看,雨花英烈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牺牲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在白区的斗争,二是革命胜利前夕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从斗争形式看,雨花英烈的斗争主要为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其中,地下斗争是雨花英烈斗争的主要形式。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179位烈士的史料中,从事地下斗争的占到92.18%。地下斗争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开展的,随时都有暴露和牺牲的危险,但雨花英烈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冲锋在前。狱中斗争则是雨花英烈斗争的独特形式。检验一名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定信仰、是否对党绝对忠诚,狱中斗争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雨花英烈在铁窗炼狱中与敌人坚持斗争,在严刑拷打下始终坚贞不屈、坚守信仰,在生死抉择以及忠诚与背叛的考验前毅然用生命捍卫忠诚、永不叛党。他们在特殊斗争中的历练,是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淬火升华的重要实践基础。

二、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鲜明特征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位置区域、特定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 理想信念的坚定性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共同表现,在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最独特、最突出、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就是“真信仰”。

一方面,雨花英烈在高官厚禄的物质利诱前仍怀抱坚定理想信念,对信仰无比忠诚。义和利犹如鱼和熊掌,自古就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因集团利益聚集而成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别相信权和钱的作用,因而对于被捕的革命者首先许以高官厚禄。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经不住物质利诱,投敌变节了。但是,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拒绝一切物质财富,抵制各种外部诱惑,展现出一股浩然正气。比如恽代英被捕后,蒋介石特意派亲信前去百般劝说,抛出各种诱惑,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无数雨花英烈都像恽代英一样,对理想信念高度自觉,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面对利诱甚至是威逼,他们都毫不动摇,绝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忠诚和纯洁。

另一方面,雨花英烈在生死抉择的终极考验前坚守理想信念,敢于为信仰献身。与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不同的是,雨花英烈面临的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或敌我对峙的战场,而是阴森恐怖的监狱、审讯室或刑场。他们中很多人在被捕后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受尽皮肉之苦,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毁共产党人革命意志、瓦解革命力量惯用的残忍手段^[2]。但是雨花英烈毫不畏惧,即使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数次昏死过去,仍始终理想坚定、对党忠诚。雨花台是雨花英烈的“断头台”,更是理想信念的检验台。在生死抉择的终极考验面前,雨花英烈经受住了考验,他们高喊着“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万岁”,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他们将理想信念刻入骨髓、融入血肉,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矢志不渝的忠诚。

(二) 道德情操的高尚性

道德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雨花英烈的道德情操,既有普通人的共通性,更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独特价值标志,充分展

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境界^[3]。

一方面,雨花英烈的道德情操是从“小德”到“大德”的升华。雨花英烈中有不少人出生在富裕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还有部分人留洋海外,是德才兼备的精英。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原本可以把读书作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阶梯,但是在高尚道德情操的驱动下,他们主动放弃优渥的生活,走上了荆棘密布的革命道路,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如施滉烈士放弃留在国外深造的生活,在1930年国内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之时毅然回国参加革命,战斗在凶险的一线。雨花英烈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最高道德追求,将个人“小德”升华为对党和人民的“大德”,鲜明诠释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另一方面,雨花英烈的道德情操是从“小爱”到“大爱”的升华。雨花英烈大多都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以“孝”为核心的亲情观深入他们内心。“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4]58}。正如冷少农烈士在面对母亲“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指责时说道:“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雨花英烈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超越了普通人的亲情,深刻认识到只有解放广大穷苦民众,才能使自己的小家得到幸福。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完成了从孝顺父母的“小爱”到孝顺大多数穷苦民众的“大爱”的道德升华。

(三)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处处体现出牺牲精神。雨花英烈基本上处于远离组织、没有共产党大集体依托的严酷环境中,其牺牲更显示出无畏与壮烈。

一方面,雨花英烈在高压险境中无所畏惧,彰显了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及周边地区,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革命者都是抱定必死决心接力革命。如1927年至1934年,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八次大破坏,谢文锦、李耘生、孙津川等六位南京市(地)委负责人先后牺牲,牺牲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更是成千上万。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马上站起来,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南京党组织很快就会恢复活动。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单枪匹马挺进敌人心脏,冒

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甚至忍受着同志怀疑、家人误解以及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甘愿忍辱负重、流血牺牲,有些英烈牺牲后甚至都没有能够留下姓名。这不是一般的牺牲精神,这是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最为彻底的牺牲精神。

另一方面,雨花英烈在炼狱刑场上从容就义,展现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抗战精神、井冈山精神中表现出的牺牲大多是发生在正面对敌战场、两军对垒时,牺牲是瞬间发生的,基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时间。雨花英烈则与之不同,很多人只要签下“悔过书”或者答应为敌人效力就可以活命,有的还能享受高官厚禄。但他们为了真理、为了革命宁愿选择死而非生。如郭纲琳烈士曾数次拒绝签下“悔过书”出狱的机会,坚定地表示“我不能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在生死抉择面前,雨花英烈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换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这鲜明诠释了牺牲精神的高度。

(四) 思想影响的深刻性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因其理想信念的坚定性、道德情操的高尚性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性,而具有彪炳史册、震撼人心的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首先,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具有激励革命、打击敌人的作用。雨花英烈狱前、狱中的斗争,一方面影响了无数正在求索的革命志士和处于困苦中的革命难友。如刘亚生烈士曾在狱中牵头办了革命理想学习班,他制定学习计划,宣传革命理想,坚定了狱中同志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甚至起到了策反敌人的作用。面对雨花英烈的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国民党反动派有的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有的是心生敬意、暗自佩服;有的则弃暗投明,支持革命,甚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如国民党看守张良诚,在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烈士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暗中为中国共产党传递消息,后行动暴露被捕,他在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时,也像雨花英烈一样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其次,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具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雨花英烈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传承弘

扬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可以为党员干部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提供思想资源;可以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可以为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1]。

(五) 精神地位的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不同精神形态,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既与其他革命精神之间存在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

首先,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形成时间较早、历时时间最久、横跨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特殊形态^[2]。在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又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可以说,雨花英烈革命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的全过程,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共生共存。

其次,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环境凶险、内涵实质特殊。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形成于革命低潮时期、挫折时刻。它不是一种胜利精神,而是一种抗击挫折、经受考验,为革命胜利不惜支付生命成本的精神。列宁曾用“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来比喻历史活动的特点和规律。革命过程中有成功也必然有失败,有顺利也有挫折,因此我们既需要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通向胜利的精神,也需要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红岩精神等不怕挫折和失败的精神。

再次,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既类似于、又有别于红岩精神。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和红岩精神是在同一历史使命、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展现^[5]。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而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则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产生的。同样是在险恶的外部环境及复杂的政治斗争下,雨花英烈和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革命先烈为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在逆境和挫折中历尽千帆,不断开拓前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在苦难中创造了辉煌。其所体现的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本质与核心,因此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和红岩精神同等重要,不分伯仲。

三、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承路径

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应当通过多主体、多渠道、多方式传承与弘扬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发挥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 明确传承主体

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学习雨花英烈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明确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承主体,主要是要弄清哪些群体是学习和传承的主力军。

首先,党员干部是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排头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6]一方面,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影响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党员干部是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传承的引导者、组织者和示范者,党员干部对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认同程度及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践行程度深刻影响着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播与传承。

其次,公众人物是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风向标”。公众人物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一方面,公众人物往往集合了媒体传播资源,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通过社会知名度较高的公众人物在自身所从事的行业,如影视、音乐、文学等领域进行雨花英烈相关的创作,借助“明星效应”,能够增强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在全社会的知晓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公众人物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大众也有较大的影响。公众人物自觉、主动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言行通过媒体、社会的传播,扩大了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影响的广泛性,能够有效推动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宣传与弘扬。

再次,青少年学生是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6]青少年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青少年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剧烈变化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树立成型的关键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青少年学生学习、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能够促进其对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增强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从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塑造健全的人格。重视青少年学生这一传承主体,是促进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在今天焕发新活力的关键。

(二) 探索传承机制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要对人们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积极探索有效传承机制。

一是项目推进机制。形成项目推进机制,能够有效集中力量、调节控制过程,达到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目标。通过制定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行动规划,具体拟订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理论研究、课程开发、社会宣传等项目,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打造宣传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品牌项目。如通过推进“雨花英烈史料”丛书编写、“雨花英烈大辞典”编撰等项目,深化对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的研究阐释;通过社会招标,推进雨花英烈相关党性教育精品课程的开发;通过雨花台烈士陵园与其他单位的项目合作,拍摄宣传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百集系列片《初心永恒》等。

二是课程必修机制。课程载体是传承与弘扬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制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必修机制。通过学校课程结构调整、课程方案制定、教学大纲修订等,将雨花英烈相关教学内容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程中,促进大中小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了解雨花英烈事迹,感悟雨花英烈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建立党员干部培训课程必修机制。在制定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时,将雨花英烈相关课程作为必修内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体中开展以“传承英烈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党性教育课程教学,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深入广大党员干部的内心。

三是定期祭奠机制。仪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举行祭奠仪式能够使参与者在程式性活动中强化对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认同。通过倡导和规定的方式,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革命纪念日、建党节等重大纪念日和重要时间节点,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缅怀革命英烈的祭奠仪式。各主体单位通过组织定期祭奠,如举行凭吊仪式、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瞻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等,实现纪念活动中传承与弘扬英烈精神。

四是媒体传播机制。媒体传播能够有效扩大并延伸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传承的范围。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与规定,打造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宣传教育的专门平台和账号,形成宣传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媒体传播机制。既充分利用主流媒体传播,如在《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雨花英烈宣传专栏、雨花英烈人物事迹展等,广泛弘扬英烈精神;又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搭建传播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专门平台,如建立“中国南京红色在线”平台、“中国雨花台”微信公众号等,发布创新内容,促进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宣传。

五是基层融入机制。“传承和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重在融入社会生活。”^[7]乡镇、社区及基层单位作为基层组织,是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场域。基层文明创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应当将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承纳入基层文明创建体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网络,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各种平台,把雨花英烈革命精神融入基层理论宣讲、学习教育、文化服务和其他服务实践之中,让人们时时处处感受到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存在和影响。

(三) 创新传承方式

传承与弘扬雨花英烈革命精神,需要我们开辟新思路、新路径,创新传承方式,通过多载体、多维度、多样化的方法,使其“入脑、入心、见行动”。

第一,人传与物传相结合。一方面,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是“人”对“精神”的传承,又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因此,既要加强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宣传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讲解员,雨花台干部学院教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相关文艺工作者“言传”的作用;又要加强雨花英烈革命精

神传承典型的选拔与培养,充分发挥优秀党员干部、先进模范、优秀志愿者“身教”的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创新传播、传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创意研发生产集内涵、艺术、功能于一体的系列红色文化产品,将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价值蕴含在文创产品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善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纪念设施建设,做好雨花英烈相关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与管理,形成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空间,打造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传承基地;布局和设计南京的城市文化环境,通过将雨花英烈元素融入城市新建道路等方式,让英烈精神潜移默化走进市民的心中。

第二,线下与线上相结合。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传播的优势日益凸显,充分融合线上线下平台是促进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传承与弘扬的有效途径。一是整合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线上线下研究资源。可以通过大数据、互联网存储技术等建设雨花英烈的“网络数据库”,将全国雨花英烈研究的相关史料、文献、成果等整合成“云档案”。通过线上资源共享,实现不同区域研究人员的线下协同研究,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在研究中传承。二是完善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线上线下展览设计。依托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基本陈展,打造线上纪念馆展厅,通过网络展厅的互动,收集参观者的反馈信息,根据反馈进一步改进纪念馆展览设计,提升陈展质量。三是研发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课程开发中,利用中国大学MOOC、学习强国、人民慕课等平台,开发高质量的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系列“慕课”,打造精品网络课程,同时定期举办线下教学宣讲,使雨花英烈革命精神以课程教学的形式入脑入心。

第三,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各种各样的学习教育活动不少,人们对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认知认同大大增强,但是,毋庸讳言,知行脱节的现象仍

然存在。因此,在继续抓好雨花英烈革命精神学习教育的同时,一定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体验和实践活动。对于大中小学生,可以组织成立以烈士姓名命名的“英雄中队”开展社会服务,组织志愿讲解员到雨花台烈士陵园进行烈士事迹讲解,组织学生成立“雨花英烈学习实践团”深入烈士故乡、寻访英烈足迹等。对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的党员干部,可以开展以“学习英烈精神 勇于担当作为”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从而立足本职工作建功立业,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交上精彩答卷。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2] 张静.雨花英烈精神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
- [3] 向媛华,刘志亮.雨花英烈精神:书写信仰与忠诚的优秀答卷[J].党史文汇,2021(1):18-22.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一九三九—一九四〇)[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5] 朱军,王春山.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N].光明日报,2018-09-28(05).
- [6]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1-2.
- [7] 吴光祥.新时代如何更好传承和弘扬雨花英烈精神[J].唯实,2018(6):43-46.

(责任编辑:铭心)

(校对:木子)

组织调适: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郭文杰 黄博一

[摘要]一元化领导是延安时期中共组织调适的重大举措。这一举措源于中共面临的诸多组织困境,包括外部资源吸取困难、内部组织协调问题频发、党内思想统一亟需实现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中共通过优化组织机构设置、调整党政军民关系、统一党内外思想,逐步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这一体制一经确立,便帮助中共克服了当时的党内危机,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对后来的组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组织调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39-07

任何一个组织都生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并且既受特定环境制约又能动地影响着环境。组织调适就反映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组织管理理论角度看,它意味着“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在资源、能力、流程和战略等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其内容包括资源柔性、学习与创新、流程再造、战略控制等”^[1]。同样地,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复杂环境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在组织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使其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变化,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其体制机制,深刻阐释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从组织调适的角度,回顾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确立的历史过程,以期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一点有益思考。

一、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确立的背景分析

环境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权变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观点来看,“组织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以

适应环境,改变结构以更好地符合环境的要求”^{[2]134}。换言之,组织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有效地维持组织运转,相应的环境变化会对组织的内部变革产生持续压力,由此推动着组织内部变革的产生,直至其适应环境变化。1942年前后,中共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由此引发了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些因素推动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一) 外部资源吸取困难

在抗战初期,中共财政收入多依赖于外部援助,其中以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为重要来源。据统计,其外援金额占边区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分别为77.20%、51.69%、85.79%、70.50%^{[3]427}。而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事实上失去了这一重要财政来源。然而,更糟糕的是国民党在此时又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加之中共又超额发放边区货币,引发了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粮食小米的价格一度攀升至原来的14倍之多^{[4]176}。财政状况如此,但是脱产人员却并没有减少,据统计脱产人员数量从1937年的

* [收稿日期] 2022-04-01

[作者简介] 郭文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100871;黄博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100871。

14000余人增加到1941年时的73117人,这无疑给边区的财政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中共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边区政府于1941年11月,确定将征收总额提高至细粮20万担^[5]。而在1937年,粮食征购数额仅为1万担而已。随即这一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包括群众生活普遍困难、干部与群众间的不平等感加剧、群众积极性受挫、党群关系紧张等现象突显^[6]。值得注意的是,除征粮外,中共为了解决自身其他需要,还开展了其他资源动员,仅1941年就有征兵扩军、征用牲口、征收救国公草、提高盐税等十多项动员^[7]。由此可见,当时中共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和治理问题。

除了财政来源受限外,中共在资源吸取的技术层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征粮困境方面。第一,动员困境,乡村政权背景下中共局部执政的主要特征在于中共需要依靠大量半文盲或者文盲的乡村积极分子来实现不断强化的征税政策,中共常常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以选取“报粮人”开群众大会等方式进行征粮,但在不断扩张的资源需要与有限的资源吸取的困境中显然是不能实现组织目标的。第二,1941年12月之前的边区政权存在着“重上轻下”的现象,人员与组织资源多集中在上层和中层,而真正涉及政策执行的下层却明显不足。据资料显示:“此时估计有7900名全薪水政府官员,其中1000多人是在边区级,4021人在分区、县和镇级,其余是在乡政府。”^{[4]151}第三,职能机构逐渐形成了以纵向控制为主,低一级机构向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这种纵向集权体制往往造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或职能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党或民选政府官员诸如县长等人控制的现象,这无疑会大大降低基层政府运转的效率,使得基层政府在面临具体问题和危机时往往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能力。

(二) 组织内部协调问题

1941年前后,中共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外在环境压力,还面临着诸多内部组织协调问题。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在组织和人员发展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扩张,不仅牢牢地巩固了陕甘宁中央革命根据地,还发展了晋东南、晋西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一方面,从横向看形成了党委、政府、军队、群众组织等不同主体的错综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从纵向看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各大战略区之间直接隶属的

“央地关系”。正是这些复杂关系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成为中共不得不进行组织调整的主要内部动因。

第一,军队与党政、军队与民众等关系出现问题。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留守兵团成了拱卫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长期驻军,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后,军队补充给养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展军队生产自救,出现了军队经商与民争利,“有些部队占好的荒地较多,引发一些群众反感”等问题^{[8]392-393}。甚至还曾发生西北局下属人员与留守兵团战士之间的矛盾,一度在西北局与留守兵团领导人中间发生冲突,差点出现枪毙战士的严重后果^{[8]398-400}。除此之外,在军政关系方面,一度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不支持军队、军政双方未能明确司法管辖权限、生产领域关于土地耕种纠纷、部分军队不肯使用边币、军阀作风倾向等问题^{[9]21-23}。对此,贺龙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以下简称西北局高干会)上批评道:“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以及军队某些干部对地方工作人员的蛮横态度。所有这些错误言行,正是军队与党政脱离,甚至是与党政对立的具体表现。”^{[10]142}

此外,毛泽东也坦言:“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11]934}总之,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是中共局部执政情况下面临的挑战,不解决以上问题终会阻碍中共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中共组织内部同级和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在抗战初期,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共在华北、华中等敌后的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各组织也常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比如,“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同时也存在“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

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等问题^{[12]285}。其实,从组织制度的视角看,上述问题反映了此时中共领导制度的局限性,即在中央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间形成了“分权型垂直领导结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或者同级党的领导机构与其他军政机构之间协调统一上的障碍。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曾严词批评项英等人屡次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党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制度必须得到尽快的调整。

当然,抗战初期党的领导体制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敌后各根据地的相对分隔状态,促进了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长期相对隔离的状态所引发的“独立”或“山头主义”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使得中共不得不注意既要发挥地方组织机构的积极性,也要强调不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正是后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党内思想亟需统一

在党内思想建设方面,中共也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党内的思想统一,而且还影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可以说,不解决党内的思想统一问题,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可能确立。

第一,党内思想建设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抗战以来党一直处于分散隔离状态,各根据地党组织之间来往受到很大限制,难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13]443-444}。这种倾向反映到思想认识层面体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轻视党内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统一,进而在行为上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产生矛盾。上文所述皖南事变即是明证,中央明确指出:“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13]68}

第二,抗战以来党的组织和人员规模扩大,使得党来不及对新加入的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而抗战的紧张激烈环境又迫切需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仅党员人数就从抗战初期的四五万人扩张到八十万,对此,任弼时曾指出:“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

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今天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14]366-367}1942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此也有同样的体会,在一次调派延安新的党员干部到敌占区工作时,竟然遭到117人当中的大部分推诿或拒绝,而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对此,他感叹道:“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15]359}

第三,党内还存在着其他比较严重的思想问题,这集中反映为党风学风文风的问题,即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中就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党内闹独立性的各种倾向以及党八股的具体危害,阐明了党内进行思想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胡乔木也回忆道:“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16]205}总之,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进一步妨碍党的思想建设,无法发挥党作为整体的集中统一的效能。

二、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确立的主要措施

正是在上述问题大背景下,1942年9月1日中共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了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组织目标。1942年前后,正是在多种组织变革措施的合力下,中共不断加强优化其组织结构、调整其组织间关系,统一了党内思想,最终实现了政治思想组织的统一,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从而逐渐克服了组织发展的困境,为后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 组织变革与内部结构优化

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看,中共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调整,不管是中央层面的人事变动和组织变动,还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机构调整都同属于这一时期组织内部结构优化的一部分。

中央层面的组织调整是这一时期组织调整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从调整内容上来看,中央层面的组织调整主要是伴随着一系列重要人事调整展开的。一方面,1938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

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17]524}。另一方面,从具体机构调整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中央书记处取代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其组织方式仍不完善,后又经过了1941年和1943年两次较大调整。1943年中央颁布《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进一步调整了中央层面的领导机构,对政治局、书记处、中央部门和各地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18]。

在中央层面机构调整的同时,地方层面的组织结构优化也在进行,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组织机构精简,改变组织上层的臃肿状态;二是推动干部“下沉”,充实组织基层工作部门;三是确立双重领导体制,增强党的领导与政府之间的协调能力。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4年简政运动结束时边区政府津贴的机关单位从35个减少到22个,税局和税所从95个减少到65个,专署及县府内部机构从8-9个减少为4-5个^[19]。伴随机构精简的是人员精简,这些人员大部分充实到了基层政权,据统计前两次精简就有500余人从边区派往下级单位,还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干部被调往区、乡工作,这些被调派的干部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成为县区工作的生力军^[20]。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县乡工作,陕甘宁边区进一步优化政府内部层级关系,加强县政府内部的统一工作,明确规定“必须使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有统一领导本县民、财、建、教、保、法的权力”“县政府各科须在县政府委员会及县长领导之下,县长对上级负责,上级的指示不可超过县长”^{[21]97,104-105},并使其在干部任免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从而大大加强了县乡政权的权限,推动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而随着这一体制的形成,“党的权力也增强了,特别是县和县级以下的党组织”,“在削弱政府部门的独立性的同时,党对政府的领导也增强了”^{[4]213}。

(二) 组织巩固与党政军民关系

从组织巩固的角度看,中共始终重视党政军民之间的稳定关系,认识到稳定的党政军民关系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共察觉了党政军民关系存在问题后,就采取多种措施去巩固

它们的关系,从而推动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召开了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一方面,与会代表针对党内错误倾向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贺龙、任弼时等人就对军队存在的军阀主义、闹独立性等问题进行抨击,分析其产生表现、危害和思想根源等问题,肖劲光等留守部队领导人在会上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公开方式,全体党员干部对军队内部问题的认识取得一致。参加会议的谭政就指出:“军阀主义倾向如果不克服,军民关系,军队与党政关系势必继续恶化,一元化无从实现,而高干会议就白开了的。”^{[22]78}另一方面,西北局高干会明确了西北局对留守兵团的领导权,代表中央主持此次会议的任弼时就在会上强调:“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也要建立健全的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23]273-274}高干会的成功召开,最终使得“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党的一元化,使干部懂得了‘党是无产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的理论与实际”^[24]。

为了进一步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内容,陕甘宁边区又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爱民的运动,即著名的“双拥运动”。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后又出台《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规。同时,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颁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公约》对前者进行回应,形成互拥互助的良性动态格局。对此,莫文骅后来回忆道:“延安兴起的‘双拥’运动,使军政、军民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战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边区军民终于战胜严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共高潮,胜利地保卫了延安这个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8]398}林伯渠也称赞道:“过去的一年,是边区面目一新的年,在军民、军政关系上,也呈现了新的气象。……干部的思想改造了,埋怨和责备军队的情形没有了,从思想上确立了爱护军队、尊重军队、帮助军队的观点。……这是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的收获,只有革命的军队才能获得人民

这样的拥护。”^{[25]365-366}

(三) 组织创新与党内思想统一

党内思想统一是确立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步骤。为了应对和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中共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实现了党内思想革命,为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党的组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就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26]658-659}。1940年,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文件,强化了党内学习活动的组织领导。1941年,毛泽东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1]812}的号召,整风运动就此开始。随后,1941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中央层面整风的开始,中央及地方学习组与研究组也相继成立,深入学习马列著作和党内相关文件,促进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等问题的认识达成一致。此后,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全党大规模的整风从此展开。从形式来看,整风运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学习运动,是党内思想建设过程的延续,即经历了“先是一般在职干部学习活动,然后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再后是延安地区干部整风,最后发展为全党整风”^[27]的整个过程。

正是在这个组织思想建设的动态过程中,整风运动着力达到“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在他领导下造成一个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28]的目的。具体来看,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党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主题,实现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为党内思想统一准备了条件。同时,从思想革命的意义上来讲,延安整风运动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9]。第二,讨论并确定了党的历史上若干问题的正确结论,总结了党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清理,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

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11]970}。第三,通过大规模和长时间的理论学习,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扭转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学习面貌,实现了对党内小资产阶级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为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总之,“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30]207-208}。

三、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确立的历史影响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经确立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共组织发展的“助推剂”,不仅有效地使党摆脱了特殊时期的历史困境,还积累了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局部执政经验,为党的领导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第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解决了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优化了内部组织结构关系,从而大大增强了组织凝聚力。从经济方面来看,通过党统一领导下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措施,“到1944年,陕甘宁的领导 and 地方干部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31]684}。对于党政军民关系而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号召下,通过开展“双拥运动”等方式,“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32]196}。另外,再加上全党在整风运动洗礼下,清除了党内存在已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终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大强化了组织内部的思想统一。正是如此,党的整个面貌才焕发了勃勃生机,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统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能够发挥组织的全部力量,从而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为以后处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此后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为党的领导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体而

言,一方面,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形成密切相关,党在困境中,通过组织内部结构优化、实行精兵简政与干部下沉等措施,强化了党在征粮、征兵方面的动员力量,与此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党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代表群众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又形成了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不是由党来包办一切,而是党通过在各级政权中的党团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党与政府之间必须要有职能上的分工,从而认识到:“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现……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30]12}正是在上述做法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通过在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设立党组、统一管理干部、完善归口管理和双重领导体制等措施,同时也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等制度,逐渐形成了“党领导一切”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第三,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发展了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列宁曾强调,“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33]68}。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面对复杂历史环境,为了赢得生存和发展,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对其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建设方面指明了发展方向,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宝库,成为指导各个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并将其旗帜鲜明地写入宪法,同时也将“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因此,“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4]272}。总之,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尤其是对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我们必须警惕历史上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过程中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5]328-32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恰恰相反是要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完善党的领导。所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就强调要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制。

结语

正如沈大伟所言:“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就像植物一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阳光,就会枯萎死亡,但倘若受到‘调适’刺激,就会生机勃勃。事实上正是这种枯萎死亡的危险,才能促使它们进行调适和发展。”^{[36]6}延安时期,中共曾一度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的诸多困境,但这成为实现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正是通过多种调适举措,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组织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仍焕发着强大生命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只有发挥好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作用,不断优化党的组织结构、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才能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 [1] 张毅. 企业战略风险形成机理研究——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耦合[J]. 理论月刊, 2010(12): 158-160.
- [2] [美]W. 理查德·斯格特. 组织理论: 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3]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陕西省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 第6编·财政[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4] [美]马克·塞尔登. 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5] 看谁个先完成任务[N]. 解放日报, 1941-11-20(04).
- [6] 吴永.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缴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论析[J]. 中共党史研

- 究,2010(9):55-65.
- [7] 李蕉. 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治理方式的变革[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5):34-42.
- [8] 莫文骅. 莫文骅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9] 谢课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政关系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2014.
- [10] 贺龙. 贺龙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5] 陈云. 陈云文集: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6]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李林. 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沿革与功能变迁[J]. 中共党史研究,2007(3):13-21.
- [19] 边区政府简政总结[N]. 解放日报,1944-02-08(03).
- [20] 张国茹.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
- [21]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3] 任弼时. 任弼时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4] 高干会与整风运动[N]. 解放日报,1943-03-04(01).
- [25] 林伯渠. 林伯渠文集[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 [2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27] 齐卫平. 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进程中的一个创举——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J]. 中共党史研究,2012(4):11-17.
- [28] 杨奎松.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J]. 近代史研究,1998(4):3-26.
- [29] 齐卫平. 论思想革命意义上的延安整风运动——纪念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2):110-114+80.
- [3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3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33] 列宁.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6] [美]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责任编辑:铭心)
(校对:木子)

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研究^{*}

吴琳 吴国燕 谭少怀

[摘要]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推动党的事业接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的接续力量。近年来,一批满怀理想、思维活跃、乐观热情、不甘落后、有较强改革创新力的年轻干部得到重点培养和选拔任用,但在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系统性认知不足、整体性把握不足、全过程管理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打造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体系,从建章立制加强顶层设计、跟踪管理建立历练流程、择优比选拓宽选任方式、管育结合压实工作责任等方面加强年轻干部培优选拔,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干部支撑。

[关键词]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建邺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46-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唯其如此,方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这样的队伍不仅需要做好选拔、任用、培养、考核等多方面的工作,更要“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1]。

一、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三重逻辑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无论古代王朝,还是现代政党,能否培养出年轻后备人才、能否选拔出优秀年轻干部,是决定其兴衰存亡的“先手棋”。

(一) 理论逻辑:内涵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

青蓝相继是干部队伍发展在时间持续性上的具

体体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内涵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年轻干部有朝气、锐气,有干劲、韧劲,是“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2]516},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一支忠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3]。优秀年轻干部是党的宝贵人才,是推动党的事业接续发展的中流砥柱。“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4]291}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二) 历史逻辑:内涵于百年奋斗史的历史主动性

*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规律研究专项课题“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研究”(JY2022018)。

[收稿日期] 2022-10-24

[作者简介] 吴琳,中共南京市委建邺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210041;吴国燕,中共南京市委建邺区委党校科长,210041;谭少怀,中共南京市委建邺区委组织部四级主任科员,210041。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我们党顺应历史大势,主动作为,在实现伟大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政策和历史经验,体现的是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对前途和命运的历史主动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5]526}的重要论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基于改革开放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新要求和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实际,干部年轻化成为干部任用的重要原则,并与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合称干部的“四化”方针。党的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这一方针。此后,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专项文件,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对不同层级的年轻干部提出了明确的年龄和比例要求,并提出要按照做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推进年轻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到2019年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时表述为“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这些规章制度对于各地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干部年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后备军和可用之才。

(三) 实践逻辑:内涵于强国新征程的战略性谋划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性谋划。从战略目标看,民族复兴是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全新探索、全新实践,需要一代又一代优秀年轻干部朝着既定的目标进发;从战略过程看,民族复兴伟业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从战略执行看,民族复兴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奋勇争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复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征,需要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全面布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的战略性任务。自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六次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讲“开学第一课”,多次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

工程,是关乎党、国家、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的百年大计,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年轻干部培养使用现状——以南京市建邺区为例

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其能力素质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近年来,建邺区委从工作实际出发,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培养选拔了一批满怀理想、思维活跃、乐观热情、不甘落后、有较强改革创新力的年轻干部。

(一) 从干部队伍整体性维度出发,统筹年轻干部培养任用

在出台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有关文件的基础上,建邺区委制定《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年轻干部常态配备、持续发现、系统培养、适时使用、从严管理、聚力推动等20项机制,统筹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

一是立足事业发展需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首先,提出五年目标。根据干部队伍实际,建邺区将选拔年轻干部的目标定为100名左右,同时分类型建立200名左右的优秀年轻干部储备库。在2022年提拔的处级干部中,1980年后出生的人数为12名,占提拔总人数的24%,其中正处级5名,占提拔正职总数的29.4%。其次,明确培养方式。通过理想信念综治教育、实践能力培优、专业素养提升、复合型领导干部培养“四项工程”和“年轻科级干部提拔为副处干部,原则上优先安排到街道、园区工作”的要求,注重统筹选配,实现系统培养和适时使用。再次,强化过程管理。通过建立优秀年轻干部成长档案、谈心谈话制度和年轻干部动态更新制度,把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要点和领导班子建设整体规划,实现从严管理和聚力推进。最后,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科级年轻干部配备情况纳入区党建考核指标,坚持开展科级干部选任年轻干部专项预审,鼓励用人单位尽快培养使用条件符合、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2022年全区累计提拔85后正科职22名,其中90后正科职13名;提拔90后副科职23名。

二是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强化培养经济型的年轻干部。建邺区结合开发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根据

区管领导班子建设实际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金融产业发展,把高新区、经开区作为培养锻炼、输出优秀经济干部的重要阵地。首先,打破身份界限,竞争上岗。面向全区选聘了200余名优秀干部到高新区、经开区从事招商招才、企业服务等工作,提高干部经济工作业务能力。其次,将经济一线锻炼培养作为年轻干部提升才能的最好课堂。选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具有相关专业背景、业务能力突出、工作实绩好、培养潜力大的干部,到各街道担任分管经济工作副主任,指导、参与街道经济建设,提升干部经济发展实践能力。再次,注重岗位练兵。选派一批共15名年轻科级干部到发改、投促、财政、金融监管等经济相关部门进行跟岗学习,注重培养他们的相关专业理念、精神和能力,填补知识空白、扫除经验盲区、补齐短板弱项,让干部在经济一线学到真功夫、练就真本领。2022年以来,优选4名80后处级、90后科级金融专业年轻干部到金融监管局和金鱼嘴基金街区工作。最后,充分利用党校、高校、网络和到先进地区交流学习等培训渠道,深入推进干部经济专业能力培训,为各级党员干部补齐、上好“经济课”,培养和造就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经济型人才。

三是聚焦重难点工作,历练年轻干部。重点难点工作是锤炼干部的“磨刀石”、检验干部的“试金石”。建邺区结合重点工作,通过认真设计培养路径,把一线作为提升干部专业化能力的重要阵地。首先,在重点工作中锻炼干部。近年来,建邺区先后选派4批57名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干部到疫情防控、防汛抗洪、文明城市创建、经济金融等一线墩苗历练;选派2批9名优秀干部参加南京市“百校对接计划”,与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等6家大中型银行机构建立双向互派机制;选派3名干部赴新疆伊宁市进行对口帮扶,选派6名干部参加省委驻淮安区帮扶工作队,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选派2名干部赴鞍山市铁西区对口合作,在完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任务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其次,在选派任务中锻炼干部。积极推荐干部参与全市重点任务学习锻炼,3名1990年后出生的干部参加市委第二轮巡察和市委民生领域专项巡察,2名1985年后出生的处级干部、1名1990后出生的科级干部到高淳区砖墙镇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最后,在专题

培训中培养干部。通过科级干部进高校系列专题培训计划,将年轻干部纳入培训对象,持续强化教育培养,注重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 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中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时代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尽管规章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在实际工作中,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依然存在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认知不到位。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整个干部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不是降低用人标准,也不否定排斥“年老”干部、适龄干部,更不是为了年轻化的“拉郎配”,而是统一标准、统一方式,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出发,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新要求出发,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建设好干部队伍。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实际工作中的不落实,有的单位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左顾右盼”,有的单位简单照搬文件硬性配备,有的单位出于级别、待遇、资历的考虑搞平衡,有的领导认为年轻人不成熟、不如老同志稳重可靠,甚至有人担心“年轻化”就是“挤占”老同志的机会,这些认识使得干部队伍中出现排斥、抵触、被动应付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而且容易影响干部队伍的团结和合作。

二是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操作呈现片面性和标准简单化倾向。选拔任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一直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依然存在视野不宽、格局不大、来源单一、渠道狭窄的现象。有的将工作业绩等硬性、显性指标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参考,而忽视对干部的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群众基础等软性、隐形指标的考察;有的将年轻干部简单定义为年轻人、青年,将最高学历、毕业学校作为年轻干部优秀与否的条件;有的盯着系统利益、部门利益,“矮子里拔将军”,或将在综合性部门工作、参加重大活动作为评价年轻干部的重要指标。这使得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存在唯业绩、唯年龄、唯学历、唯出身、唯系统、唯重大活动等情况,没有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基本任务、班子结构、未来发展出发深刻认识年轻干部作为后备力量的重要性,没有着眼未来做好干部队伍建设。

三是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全过程管理不足。在干部培养方面,尽管年轻干部冠以“年轻”二字,但都在干部体系中、在基层工作岗位上锻炼多年,阅历丰富,容易在工作中形成经验主导的思维惯性和工作惯性,出现诸多不适应现象,如工作理念、管理方式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不善为”;工作能力、责任意识与岗位职责要求不相适应,“不会为”;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与转型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不能为”;工作干劲、争先意识与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不想为”等,导致很多年轻干部缺乏关键岗位的历练,能力和经验储备不够,难以担当重任。在干部选拔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后备干部多年被“遗漏”却不知原因没有下文,有的提拔后不能胜任却“能上不能下”,有的下基层锻炼后既不能“升”也不能“回”,以致认为被“贴上标签”“打入冷宫”,不会再有发展前景,失去工作动力选择“躺平”。正是这种脱节现象,使得年轻干部总量较少、比例较低,各级领导班子不同程度地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在干部任用方面,年轻干部在关键岗位上配备不多,关键岗位干部年龄普遍偏大,成长空间受限。年轻干部的成长渠道和上升空间较窄,晋升一般只有公开选拔和换届两条渠道,在平时的班子调整中,由于各个层级都积压了一大批年龄偏大的领导干部,年轻干部一般很难通过民主推荐上来,加上职数的限制,年轻干部晋升空间很小。因此,干部培养、选拔、任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实行全过程管理十分必要。

三、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的对策思考

(一) 建章立制,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顶层设计

首先,要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系统性。重点着眼于“全”,打造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发现、培养、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管理。立足于领导班子合理年龄结构和老中青梯次配备,正确处理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与用好其他年龄段干部关系,充分调动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其次,要遵循年轻干部成长规律。科学制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中长期规划、年轻干部管理办法,明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原则、目标、思路、措施。着眼中长期培

养选拔目标的实现,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制定和换届相衔接的阶段性目标,分步抓好落实,逐步配备到位。再次,要注重年轻干部的整体培养。确定培养名单时,应统筹考虑考录公务员、名校优生、选调生、军转干部等不同来源,根据年轻公务员学历专业、成长经历、特质专长定向培养,针对性、差异化设计年轻干部成长路径,确保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二) 跟踪管理,建立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历练流程

首先,要将重要部门和吃劲岗位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年轻公务员在“一把手”或分管领导身边、上级机关、社区一线、发达地区、园区国企等岗位,聚焦产业招商和项目建设、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基层治理、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重点任务,通过统筹比选、公开遴选、跨部门交流等形式,帮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积淀干事本领,推动年轻干部在实战中摔打磨炼、成长成熟,全方位锻炼优秀人才。其次,建立健全年轻干部常态化交流机制。通过“上挂”“交流”“下挂”等方式,每年开展基层换位体验活动,组织年轻干部到街道社区、基层站所、窗口单位实践锻炼。有计划地在本单位内部开展轮岗交流,对表现突出、潜力较大的,要制定相应的成长计划进行重点培养,符合条件的应及时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为干部梯次建设做好人才储备。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年轻干部,及时放到副职岗位进行培养历练,对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年轻干部,采取“先挂后任”的方式,进行重点培养锻炼,挂职期满后考核优秀的按照程序正式任职。再次,加强年轻干部跟踪管理。组织人事部门要重点关注年轻干部的日常表现,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引导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所在单位党组织要积极开展读书分享、素质拓展、心理健康咨询等活动,丰富业余生活,凝聚团队精神。常态化开展“向组织说说心里话”活动,所在单位领导、组织纪检部门负责人每年至少分别与本单位年轻公务员谈心谈话一次,及时对其取得的成绩给予表扬和鼓励,对年轻干部反映的工作生活困难,及时帮助解决,对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建立健全优秀年轻公务员信息库,制定“一人一档”成长档案,及时在公务员管理信息化平台上记录年轻公务员培

训情况、考核奖励、挂职锻炼等信息,做到全程纪实、动态更新、跟踪管理,定期分析队伍培养锻炼情况。

(三) 择优比选,拓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选任方式

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常态化,坚持和完善机关内设机构竞争上岗办法,为选拔机关优秀年轻干部提供“通道”,进一步探索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有效途径。首先,要创新选拔方式。如采用“公开选拔”“公开提名、多轮推荐、差额选拔”“多轮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等选拔方式,变原来的“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其次,要持续跟踪培养。建立年轻干部选配专项预审制,通过单位推荐、组织遴选、专项考察、统筹比选等方式,精准掌握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名单,建立优秀年轻干部库和紧缺专业年轻干部信息库,定期研判、动态调整、优进绌退,人选不公示、不公开,防止标签化。最后,要全面观察了解。通过召开年轻公务员代表座谈会、“青苗培优论坛”、年轻干部成长经验交流会、选调生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年轻公务员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从中发现综合素质过硬、能力水平优秀、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年轻干部。

(四) 管育结合,压实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工作责任

年轻干部职业生涯长,潜力大,更应强化学习培训。首先,要完善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课程体系。把年轻公务员纳入年轻干部培养链,实施年轻公务员“青苗培优计划”与年轻干部“墩苗赋能”计划的有机衔接,科学制订本地区年轻公务员培训计划,举办相应培训班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分领域、分类别、分专题为年轻干部提供系统实训,帮助提升理论水平、完善知识结构、掌握业务技能,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其次,要着力提升年轻公务员能力素质。定期举办政治能力建设主题培训班,分层分级举办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重点围绕科技创新、经济金融、社会治理、依法行政等主题开展业务培训;针对年轻干部特点,更多采取新的学习培训方式;缩短培训周期,切实抓好短期培训,实现所有年轻干部有机会参加培训,有精力全程参加培训。最后,要压实年轻干部培养选拔责任。明确党委(党组)在年轻干部培养使用上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党组织书记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第一责任人,着眼综合素质培养和专业能力提升,积极安排年轻干部参加本系统、本行业各类专题培训;安排专人从理想信念、技能技术、经验经历等方面开展传帮带,把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实效作为党建工作考核和书记述职的重要内容;配备区、街道、社区三级导师,选派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导师,定制帮带计划,因材施教、动态指导,形成组织牵头、部门单位联动、成长导师帮带、常态化关心关注的责任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2]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3] 习近平.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N]. 人民日报. 2018-07-05(01).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阿 甘)

(校 对:山 柏)

公开个人信息的定位及处理活动的规范化*

张建文 丁冰洁

[摘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提供了六项法定的非基于个人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第27条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为平衡信息主体的自决诉求与信息处理者的合法使用需要,宜将已公开个人信息作为法律有限保护的公众可获取信息,对其采取的是非明确拒绝或无重大影响即可自由使用的有限保护模式。对第27条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存在三个难以绕开的问题:合理范围如何界定、明确拒绝如何体现、重大影响包括哪些情况。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为第27条中的“明确拒绝”“重大影响”寻求判断依据和判断标准,信息主体可通过主动积极行为表示明确拒绝,也可以根据处理信息明显违背公开个人信息之目的和用途推定信息主体明确拒绝该信息处理活动。《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分别提供了司法解释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准。

[关键词]公开个人信息;公众可获取信息;明确拒绝;重大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51-08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有效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36条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三种豁免情形,即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以及合理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在《民法典》第1036条规定的基础上拓展和细化为7项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又针对《民法典》第1036条第2款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6项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进行了专门规定:在合理范围内,个人信息处理者可在非基于信息主体同意的前提下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除非个人信息主体明确拒绝;处理活动可能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需要依据《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之后再进行处理。第27条所确立的规则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同时,将“合理范围”“个人明确拒绝”和“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作为信息处理者进一步处理公开个人信息的限制性因素,以期统筹平衡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与信息处理者的合理使用。

与《民法典》第1036条第2款的内容相比,从文本表述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还是有些细微的改动,在可能对信息主体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中,由之前的禁止处理否则承担民事责任模式转为依法取得信息主体同意后可以进行处理。整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6项关于公开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应当与《民法典》第1036条第2项的规定保持含义上的一致,即在自然人明确拒绝时以及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时,该种处理不是合理处理^[2],除非得到信息主体的

* [基金项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项目“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智慧社区社会实验”(cstc2020jsex-dxwtBX0020)。

[收稿日期] 2022-05-30

[作者简介] 张建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401120;丁冰洁,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生,401120。

同意。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自决与信息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公开个人信息因其公开性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二者争抢的领域,要想深入透彻地分析它,并且实现第27条所预设的平衡信息自决和信息合理使用的社会效用和司法价值,首先要探讨公开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问题,再从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出发,使约束个人信息处理者自由处理公开个人信息的限制性因素“合理范围”“明确拒绝”和“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尽可能地明确化。

二、公开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位思考

公开个人信息具有公开性和可识别性的特征,承载着信息主体以信息自决为核心和信息处理者以合理使用为核心的双重利益。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和第27条的规定,处理个人公开信息是法定的信息处理情形,原则上无须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2]。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要履行告知义务,但由于公开个人信息已经处于公开状态,信息处理者是否还有告知的必要也存在异议。这意味着公开个人信息面临着随时被多个主体处理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公开个人信息。

(一) 域外立法中公开个人信息的识别

1. 美国法律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地位界定

2018年3月,剑桥分析公司和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的曝光,加剧了消费者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分享和交易过程的不透明的不满以及对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不足的担忧^[3],在此背景下加州率先通过了《2018加州消费者隐私权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of 2018,简称CCPA)。CCPA界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及个人信息的范围,其中明确指出个人信息不包括公开可得的信息。“公开可得”系指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记录中可以合法获取到的信息^[4]。从这一规定来看,这种来自联邦、州或地方政府记录中的个人信息类似于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中获取的个人信息。但是可合法获取的政府记录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将其进行聚合、数据挖掘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害。

此后,加州又于2020年11月3日通过了《2020

年加州隐私权法》(The 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ct,简称CPRA)提案,该提案修正并扩展了CCPA。其第14条定义规定,个人信息不包括公开可得的信息,或合法获取的、真实的、引起公众关注的信息。此处的“可公开获得”是指: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记录中合法获得的信息,或者某企业有合理理由认为是由消费者合法地向公众公布的,或从广泛传播的媒体获取的;或者如果消费者没有将信息限定于特定的受众,则包括消费者已经向其披露了信息的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可公开获得”并不意味着企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的关于消费者的生物识别信息。从该除外条款可以发现,CPRA在CCPA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可公开获得信息的范围和来源,包括信息主体自己公开披露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新闻报道公开的信息,这些信息都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亦无法依照CPRA获得相应的保护。与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相比,我国并没有将上述三类公开个人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保护对象之外,而是将其作为非基于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个人信息不仅属于私人利益,在信息时代更具备相当的社会利用价值,体现为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

2. 俄罗斯对公开个人信息的规制

俄罗斯的个人资料保护制度,主要是依据《个人资料法》和其他联邦法律予以确立的。《个人资料法》在俄罗斯具有个人资料保护之基准法的地位^[5]。俄罗斯《个人资料法》将个人资料分为四类:公众可获取的个人资料(公开个人资料)、普通个人资料、特种个人资料和生物个人资料^[6]。其中公众可获取的个人资料,指为了保障信息目的而建立的公众可获取的个人资料来源,包括指南、地址簿、传记、书目、电话簿、私人广告等。经个人资料主体的书面同意方可将其姓、名、父称、出生年份及出生地、住址、用户号码、职业信息和个人资料主体提供的其他个人资料纳入可公开获取的个人资料途径^①。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个人信息立法规范承认公开个人信息仍然属于个人信息,并未采取美国加州式的做法将公开个人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保护之外。

信息被列入公众可获取信息的主要后果就是法律承认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它,唯一的条件是必须遵守联邦法律对信息传播的限制^[7]。

就此而言,俄罗斯对公众可获取信息的规制态度为允许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使用,但需遵守法定的限制。此外,从对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来看,免除了信息处理者对公开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以及自第三方处取得公开个人信息时提供法定信息的义务^②,但同时也赋予了个人信息主体要求从公众可获取资料来源中删除的权利。与之相比,我国虽未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2条的除外适用条款中规定公开个人信息,但我国立法并未像俄罗斯立法那样明确免除对公开信息的保密义务及提供法定信息的义务。在一般的信息处理活动中,信息处理者要在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向个人告知信息处理者的基本信息及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等内容。虽然第18条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及不需要告知的绝对豁免和紧急情况下的相对豁免两种豁免告知义务的情形^③,但从文本来,较难认为处理公开个人信息可豁免告知义务。

(二) 对公开个人信息定位的思考

从我国既有的相关公开个人信息的规范来看,公开的个人信息具有合法性和公开性两大特征,公开性即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不特定的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而获悉^[1],这一点与美国《2020年加州隐私权法》的公开可获得信息以及俄罗斯《个人资料法》中的公众可获取资料具有相似性。就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定位而言,美国《2020年加州隐私权法》将公开可获得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之外,直接不予适用加州隐私权法的规则;俄罗斯立法虽未将公众可获取资料排除在个人信息之外,但明显降低了对信息处理者处理公众可获取资料的要求,免除其保密义务和提供法定信息的义务,同时为防止过度干预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删除权的方式尊重其控制个人信息的权利。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未将公开个人信息列为法律保护的除外情形,其仍然受到调整和保护,这一点与美国的做法有较大差异,而更接近于俄罗斯对公开信息的态度。从公开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看,美国的公开可获得信息主要来自政府部门,俄罗斯公众可获取资料来源于信息主体;就我国司法现状而言,我国的公开个人信息的来源途径较为多元,既可以从行政司法机关等公权力部门获取,也可以从信息主体自身获取,还可以从其他主体处获得已经

公开的个人信息的。

通常认为,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同时承载着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双重利益诉求^[8]:一方面,信息主体需要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以维护个人人格形象;另一方面,公开个人信息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因而受到信息处理者的重视。公开的个人信息较未公开的个人信息而言,具有更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因此对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有别于对未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将其作为无须征得信息主体同意亦可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理由。公开并不意味着信息主体就彻底且永久失去了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这也是个人信息与隐私有所不同的地方。信息主体并不会因公开而失去对个人信息控制的权利,其仍然有权拒绝他人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此外,由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维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即便是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也不得任意进行处理,如果处理该信息将侵害自然人的重大利益,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9]。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的重要价值所在,既表明信息处理者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可以自由处理,亦通过“合理范围”“明确拒绝”和“重大影响”对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进行限制。

三、公开个人信息的分类设计

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的文本结构与内容出发,其第1句规制的对象是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公开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公开,是个人信息主体真实、自由的意志表达,构成了公开合法的基础,可以说第27条第1句规制的对象本身就是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第27条第2句采用“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表述,这里的公开个人信息不仅是指本身已被现实公开,同时强调是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2]。因他人泄露或非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虽然客观上确实出于公开状态,但不属于法律上所谓的公开个人信息^[12]。因此,笔者主要围绕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非法公开的个人信息通常不能纳入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范畴。

(一) 按照公开主体:信息主体自行公开与他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中,人们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参与重复交叠的法律关系,产生和记录着各

种各样的个人信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质就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公开,形成自己的社会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参与社会交往的行为^[3]。如司法机关制作的裁判文书中可能会记录个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所地等基本个人信息,若未删除或做匿名化处理,一旦上传到裁判文书网上,将成为人人都可获取的信息。除此之外,信息主体个人也会在网上购物、填写求职申请、购买商业保险等社会活动中,自行公开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通讯地址等个人信息。

按照公开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分为信息主体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与他人公开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指自然人自愿、主动向社会不特定人公开的个人信息,如信息主体将包含自身联系方式、通讯地址、任职信息等内容的个人简历放置于公开的网站,或通过新闻媒体渠道主动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等^[2]。如在“王刃与奇虎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中,原告王刃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工作方便和节约资源,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作为企业办公电话,将其私人电话号码披露在企业黄页上,同时亦将该手机号码登记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备信息查阅^④。行为人此种披露和登记行为,是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所为的公开行为,对此种来源于公开渠道的信息的进一步处理,很难认定为构成隐私权侵权。他人公开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行政机关及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如政府机关因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而依法加以公开的个人信息;二是依据司法行为而公开的个人信息,即因为法院的司法行为而公开法律文书中涉及的应当公开的个人信息^[12];三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信息主体以外的其他自然人公开的个人信息,如新闻单位对事件的报道,以及在“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与伊日克斯庆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贝尔塔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转载并公开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人民法院公告网发布的文书进一步公开当事人个人信息,该案中的文书已于互联网进行公开,贝尔塔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后向其客户提供、公开相关法律文书,被认为属于对已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但是亦应尊重信息主体本人对于其已公开信息进行二次传播的意愿^⑤。

按照公开主体进行划分的分类标准,是对法律规范文本表述的真实写照。将公开个人信息分为自行公开以及他人公开的个人信息,主要是考虑到公开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继承《民法典》个人信息定义方式的同时,创新性地将“关联度”作为判断个人信息的标准。以公开个人信息的主体为例,公开主体与信息内容关联程度越高,越可以在明晰和接近信息主体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合理处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相反,公开信息的主体和个人信息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或者说关联性很弱,那就要求信息处理者必须尽到审查公开信息的来源主体、公开目的、公开方式和公开范围等义务。对于信息主体个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法律推定其是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这类信息时,可能就不需要承担太多义务和责任。国家机关及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公开的个人信息,因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一般认可此类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自媒体时代,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都可能成为公开信息的主体,但是此类主体大多并非信息主体本人,也并非权威信息来源主体,很大程度上可能无法确保公开信息的准确、完整和时效,信息处理者在处理此类主体公开的个人信息时,应当要尽到更为严格和高标准的审查义务,以此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从而免于承担责任。

(二) 按照公开内容: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

学理上,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与信息主体的识别性,分为直接个人信息和间接个人信息^[10];通过与人格尊严的关联程度,可以划分为人格紧密型个人信息和人格疏远型个人信息;根据社会属性强弱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体性强的个人信息和社会性强的个人信息^[11]。《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采取关联说来定义个人信息,即只要是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都可以纳入个人信息的范畴。与关联说相比,可识别性要求的标准更高,根据可识别性划分的直接和间接个人信息类型化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的认定较为困难和保护范围的缩小,可能并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与人格尊严的关联程度凸显了个人信息当中蕴含着体现个体人格独特性的敏感和私密信息,人格尊严的关联度与信息中

的个人敏感和私密信息成正相关性。社会属性的强弱体现了个人信息当中包含了社会大众非标表性、非个体性的一面。以上两种分类标准可以通过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分类进行有效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社会互动性较强，敏感个人信息则充分体现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民法典》关于私密信息的规定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规定，都透露出个人信息至少可以区分为两类：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和涉及敏感、私密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普遍采取的分类方式是将个人信息划分为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并对前者进行特殊保护^{[12]54}，只是敏感信息的具体类型有所不同。我国亦有学者主张要区分敏感隐私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13]。从相关立法来看，我们国家采取的也是这样的分类模式，《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了生物识别、医疗健康等七类敏感个人信息。对于敏感个人信息，只有在符合目的特定、必要充分、保护措施严格的前提下，才可进行处理。除此以外的其他个人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等则属于一般个人信息。如此分类主要是由于敏感个人信息被认为具有特殊风险，通常需要受到特殊保护^[14]。如果已经公开的是一般个人信息，那么信息处理者可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的规则，在个人未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但如果已经公开的是敏感个人信息，由于敏感个人信息本身具有高度人格属性，比一般个人信息承载了更高的人格尊严要素^[15]，可以认为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是可能会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需要信息处理者在具备目的特定、充分必要、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依据第29条的规则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书面同意以及履行第30条的加重告知义务之后，才能处理已经公开的敏感个人信息。

四、公开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化

信息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其自由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16]。保障个人信息的适当共享性，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对个人信息多维属性的确证，也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17]。为此，《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在基于信息主体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之

外，规定了其他非基于信息主体的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定情形，包括本文所探讨的公开个人信息。

（一）合理范围限定

公开个人信息不仅具有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具有公众可使用性和非排他性的面向，一人对信息的使用不影响他人的使用，信息也不会像其他物质产品一样随着使用而有所耗损，导致价值减少^{[18]132}，反而会因为信息处理者的加工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但这并不代表信息处理者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是无序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信息处理者出于逐利的需求，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来处理获取到的个人信息，以期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有效避免这种激进的处理活动，立法规定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进一步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所谓“合理的范围”应当至少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处理者的处理目的，目的合理要求信息处理目的必须符合社会一般人的事理认知，不得违反基本的伦理道德与公序良俗^[19]，如在刘馨予与乐视公司隐私权纠纷一案^⑥中，乐视公司以视频形式发布涉及刘馨予的个人私密身体健康及社会敏感事件的内容，违背了公序良俗，不属于处理公开个人信息的合理目的。二是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即如果有侵害性更小的处理方式时，就不能采取侵害性更大的处理方式^[20]，如信息处理者的处理活动不能引发高于原有程度的、用户无法预期的风险^[21]，否则就超出了合理范围之外。

（二）明确拒绝的判断

信息主体自行公开以及其他合法途径公开的个人信息具有公开合法的基础，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这类信息无需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但是对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并非具有绝对性，公开个人信息不代表信息主体彻底放弃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更不代表信息处理者可以随意处理公开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句中的但书条款意味着在个人明确表示拒绝信息处理者处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时，信息处理者原则上无权再进行处理。信息主体可能会因为时间的经过、公开目的、用途的改变以及公开信息内容的落后陈旧等，不再愿意信息处理者处理之前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

判断是否为明确拒绝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明

确的意思表示,即信息主体所表达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二是拒绝的意思表示,即信息主体所表达的内容是反对、禁止、拒绝处理已合法公开个人信息。在实践中,较易判断的明确拒绝多为信息主体的主动性积极行为,如在公开个人信息时附有禁止处理声明的,以及信息主体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发送删除个人信息通知^⑦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信息主体不可能随时都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在被处理,也就不会及时向信息处理者发送禁止处理的声明,单纯采取前述这种积极主动性行为来判断明确拒绝,可能会导致对信息主体保护不足,需要采取更为简便也更有利于保护信息主体的判断方式。

信息主体自行公开个人信息以及国家机关等依法公开个人信息都有其特定目的和用途,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至少要做到与该信息公开之目的和用途基本一致或相兼容,否则可以认定为信息主体是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例如新闻报道、裁判文书等公开的个人信息,具有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等目的,可以在符合其公开目的的基础上,合理处理该等已公开个人信息,比如进行汇总和转载,但不能用来进行信息出售和交易,也不能对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涂改或者歪曲,否则就明显违背公开个人信息之目的和用途。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明显违背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公开目的的、明显改变已公开个人信息的用途的^[22],可以推定信息主体是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也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要求,应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如在自动化决策推送中设置明确的拒绝按钮^[23]。

但是,此种明确拒绝处理个人公开信息的权利也并非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从实践来看,在信息主体明确拒绝其他主体转载依法公开的裁判文书的案件中,可能该诉求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信息主体拒绝处理的权利有时需要让位于司法公开。在当今新冠疫情的防疫大背景之下,公开个人的身份信息、行踪信息已经成为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在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面前,信息主体拒绝信息处理者处理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三) 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可能情形

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不能影响和侵害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当处理公开个人信息会对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时,不能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径直处理个人信息。为了缓解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冲突,规定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也允许取得个人同意后处理个人信息。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决定了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是合理范围内的自由使用还是需要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两种不同的模式,因此有必要探讨重大影响的情形为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规定》)第12条第2款确立了司法解释提供的重大影响判断标准。从该司法解释的表述来看,处理方式违法和侵害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属于并列关系,都可能会对信息主体产生重大影响^⑧。因此在判断是否会对信息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时,可以将信息处理者的处理方式纳入考察范围,若采用的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处理方式,例如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画像,采取算法应用,锁定特殊消费群体,实施价格歧视、价格混淆等销售策略^[24],则可以认定会对信息主体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的认定标准,欧盟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路是考虑信息对于信息主体来说是否具有涉及隐私生活的敏感性^[25],也就是说根据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内容不同,当信息处理者处理的是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敏感性个人信息时,也可以认定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需要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法律作为整体性、体系性存在,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需要在体系思维中展开^[26]。法律体系由完整的法律规定所组成,要消除“体系违反”,使法律完整顺畅且无逻辑矛盾,从而维护法律的统一性^[27]²⁰。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提供的重大影响判断标准。第55条是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进行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五种情形,一是处理的个人信息为敏感个人信息;二是进行自动化决策;三是委托他人处理或向第三方提供个人、公开个人信息;四是境外提供;五是其他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处理活动。从第五种情形进行判断,

其本身是属于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类型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克服法律规定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而设置的兜底性、开放性条款,在语句表述上采用的是“其他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这就意味着前述所明确列举的四种情形,应当属于重大影响范畴或者与重大影响在价值、性质、影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28]。以信息自动化决策为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经营者可通过对消费者消费习惯、个人兴趣爱好等信息进行整合处理,并进行智能分析,提供具有某种偏好性的产品或服务推荐,可能会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21]。

实践中如何确保信息主体“明确拒绝”权和“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情形下的获取个人同意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明确拒绝”的前提是知情,除了信息主体自己明确知道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更多的情况是需要信息主体履行告知义务才能实现信息主体的知情,但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处理公开个人信息是否要履行告知义务,仅能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8条规定的豁免告知情形做相反推论,暗含着处理公开个人信息也应当要履行告知义务。在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场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个主体有权判断可能会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立法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规定,期待以后的司法实务可以进行回应,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司法实践思路和经验。

五、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统筹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乃大势所趋,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对公开个人信息采取有限保护的倾向,充分体现和响应了该需求。公开个人信息具备合法公开性和可获取性,其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公众可获取信息的角色,个人信息处理者原则上可以自由使用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价值和效用。同时,借助“合理范围”“明确拒绝”和“重大影响”规范信息处理者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真正达至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用需要之间的平衡。

注释:

① 独联体成员国议会间大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于1999年10月16日第14-19号决议通过的独联

体成员国《个人资料示范法》第4条第4款。

- ② 自第三方取得个人资料时提供法定信息的义务包括:(1) 处理人或其代理人的名称或姓、名、父称和地址;(2) 个人资料处理的目的是法律依据;(3) 个人资料的预定使用人;(4) 本联邦法律规定个人资料主体的权利;(5) 个人资料的来源。
-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8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可以不向个人告知前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无法及时向个人告知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紧急情况消除后及时告知。
- ④ 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8460号民事判决书。
- ⑤ 参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终4745号民事判决书。
- ⑥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325号民事判决书。
- ⑦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0989号民事判决书。
- 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

参考文献:

- [1] 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J].中外法学,2020(4):1001-1017.
- [2] 程啸.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J].清华法学,2021(3):55-73.
- [3] 崔亚冰.《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的形成、定位与影响[J].网络法律评论,2017,21(1):235-259.
- [4] 吴沈括,孟洁,薛颖,等.《2018年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中的个人信息保护[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12):83-100.
- [5] 涂咏松.俄罗斯个人资料保护制度探析[J].求是学刊,2014(1):14-22.
- [6] 张建文.俄罗斯个人资料法研究[J].重庆大

-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32-153.
- [7] 张建文. 能动司法与网络平台公开数据法律制度的型塑——评“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云智联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3):32-44.
- [8] 刘双阳. 论个人信息自决权刑事司法保护的边界——以已公开个人信息为中心的分析[J]. 人权,2021(5):148-162.
- [9] 王利明,程啸. 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10] 陶盈. 我国网络信息化进程中新型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与法律规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55-160.
- [11] 项定宜,申建平. 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同意要件研究——以个人信息类型化为视角[J]. 北方法学,2017(5):30-39.
- [12] 何渊主编. 数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13] 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 中国法学,2015(3):38-59.
- [14] 汪全胜,方利平. 个人敏感信息的法律规制探析[J]. 现代情报,2010(5):24-27.
- [15] 田野,张晨辉. 论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2019(7):43-49.
- [16] 李延舜.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J]. 法学论坛,2015(3):43-53.
- [17] 刘艳红. 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的法理逻辑及限度——基于个人信息有序共享之视角[J]. 法学论坛,2020(2):5-16.
- [18]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 盛杨燕,周涛,译.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19] 朱荣荣. 个人信息保护“目的限制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为中心[J]. 财经法学,2022(1):18-31.
- [20] 程啸,王苑.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无需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形[J]. 人民司法,2021(22):79-85.
- [21] 范为.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J]. 环球法律评论,2016(5):92-115.
- [22] 周光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J]. 清华法学,2021(3):25-40.
- [23] 杨立新,赵鑫. 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的知情同意规则及保障——以个性化广告为视角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J]. 法律适用,2021(10):22-37.
- [24] 张新宝. 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J]. 中国法律评论,2021(5):18-27.
- [25] 杨立新,杜泽夏. 被遗忘权的权利归属与保护标准——任甲玉诉百度公司被遗忘权案裁判理由评述[J].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16):29-39.
- [26] 陈金钊. 体系语用的法思考[J]. 东方法学,2021(1):90-101.
- [27] 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 [28] 章剑生. 兜底条款适用的法解释技术——季频诉宜兴市宜城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案评析[J]. 法治研究,2021(6):138-146.

(责任编辑:言 蹊)

(校对:乐 天)

中国特色文化扶贫：先进理念、成熟经验与未来方略^{*}

冶 刚 徐秋枫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扶贫事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享发展、坚持扶志扶智、坚持“造血式”扶贫的中国特色文化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精神养料。绝对贫困消除后,我国已顺利开启乡村振兴战略,应总结以往文化扶贫在推动文化跨越发展、提高文明风气、提升观念素质、改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目标,从创新理念思路、凝聚振兴合力、延展产业链条及构建长效机制四个方面探索后脱贫时代文化扶贫的创新方略,以期为进一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精神基石。

[关键词]中国特色;文化扶贫;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小康;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120;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59-06

贫困的产生固然与自然条件的制约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人的思想固化。只有解决好精神贫困,才能从源头消除贫困产生的土壤。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158}。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对工人造成的精神贫困,告诉我们要消除精神贫困、实现精神解放,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人民对更高质量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将文化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既为解决贫困群众的精神贫穷和思想愚昧,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应继续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不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文化扶贫在政策、制度及机制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更好实现“乡风文明”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文化扶贫理念

(一) 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而贯穿文化扶贫始终的就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扶贫从根本上必须搞清“为了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2]28}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就是要把提高困难群众思想意识、提升其幸福指数和改变其落后生存状态作为文化扶贫的出发点,让全体人民共享先进文化成果,这是实现好和维护好人民文化利益的要求所在;第二,文化发展依靠人民。坚持依靠人民,提高人民的切身参与感,是中国特色文化扶贫行稳致远的经验。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扶贫的动力,只有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当成英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20BKJ012)。

[收稿日期] 2022-04-04

[作者简介] 冶刚,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710061;徐秋枫,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710119。

雄来尊敬,对人民常怀敬仰之情、常有敬重之念、常存敬畏之心,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才能激发他们强烈的主体意识,使人民真正成为推动文化扶贫的力量源泉;第三,文化发展尊重人民。列宁指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3]679}这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文化扶贫的主体和对象,文化发展必须坚持尊重人民的理念。中国特色文化扶贫之所以深刻彰显民族性与时代性,其根本在于我们尊重人民在文化扶贫中的无限创造性。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才充分激发了贫困群众自觉脱贫的内生动力,进而凝聚起振兴乡村的磅礴精神力量。

(二) 以实现共享发展为目的的崇高立场

共享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文化扶贫过程中,必须努力使贫困群众摆脱文化贫困、精神困顿与思想愚昧,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第一,共享发展实现精准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4]这一精准治贫思想是对“共享发展”的生动体现。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文化扶贫中,就是通过精确贯彻和实施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普惠性文化政策,激励广大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乡村文化发展大格局。第二,共享发展提升农民精神境界。共享发展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人人享有,各得所需。随着文化精准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农民已不再满足于看几本书、听几场戏的浅层次要求。农民教育水平、文化需求和欣赏层次不断提高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文化扶贫,增强农民群众对落后文化的抵制能力,激发其对先进文化的热切渴求,进而全面提升新时代农民精神内涵。第三,共享发展凝聚乡村共同体意识。文化扶贫不能仅停留在娱乐身心的层面,更需要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凝聚乡村文化共同体做出贡献。因此,我们一方面基于群众意愿要求,积极打造各类文化资源平台,建设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乡村大舞台等公共文

化工程;另一方面立足各地特色文化,大力开发乡村创意产业和文旅产业,使群众切身参与文化扶贫全过程,享受文化扶贫带来的红利。这些举措都大大凝聚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价值共识。

(三) 坚持扶智扶志的科学扶贫思路

兰德斯认为,我们必须“摆脱自己对非理性主义的盲从,摆脱消极无为的心理”^{[5]370}。这告诉我们,脱贫致富归根结底要振奋精神,塑造智慧。十八大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到思想贫瘠、精神愚昧及文化落后是贫困发生的重要诱因,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科学思路,出台了各项扶智扶志措施,全面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突出表现在:第一,精神面貌的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6]216}为此,基层党委和政府充分发挥其在思想动员和教育引导上的优势,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在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活条件及保护地域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举措使贫困群众从被动的“要我脱贫”转变为主动的“我要脱贫”,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第二,知识水平的提升。贫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衡量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指标。现实中,大多数贫困群众存在学历偏低、技术缺乏和知识匮乏等障碍,因此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通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生产技能,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身无长技的问题,提高了其综合素质,完成了由“输血式”到“造血式”扶贫方式的彻底变革。第三,脱贫信心的增强。提升贫困群众致富勇气和脱贫信心,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目的。为此我们积极发掘地域特色与文化资源,从培育可持续性富民产业入手,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的脱贫之路,有效破解了贫困群众“不能脱贫”的症结,激发了“我能脱贫”的信心,唯其如此,我们才从根本上摘掉了贫困的思想帽子。

(四) 确立“造血式”的文化扶贫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统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相互协调发展,提高贫困群众的内生发展能力,“造血式”的可持续文化扶贫模式就成为必然选择。第一,坚持可持续扶贫的基本方针。文化扶贫是全面的扶贫,服务于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7]。因此必须保持各项文化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各项文化扶贫机制的延续性以及文化扶贫队伍的稳定性。为此我们一方面以打造乡村文化发展高地为契机,积极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为目的,积极开展实用技术、营销技术等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发展能力,使贫困群众逐渐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型职业农民。第二,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扶贫产业。产业是脱贫的关键,更是基础,而地方特色文化产品承载着地域文化的基因,具有艺术价值、精神价值及经济价值等复合价值。因此我们积极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大量吸引投资项目、生产要素以及消费热点集聚乡村,充分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及服务,形成了可持续扶贫效应,奠定了稳定脱贫的广泛物质基础。第三,协同推进的可持续方式。文化扶贫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它不仅需要政府充分发挥文化职能,还需要更多文旅企业、社会公众的密切参与。从政府文化扶贫帮扶,到爱心企业项目支持和产业落地,再到社会组织下乡送文化、送科技等公益活动,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充分集聚政府、企业及社会等不同群体的帮扶优势,聚力全社会共同推进,才能持续性将文化扶贫政策落到实处,提升贫困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科学引领乡村文化扶贫的发展方向。

二、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的中国特色文化扶贫经验

(一) 公共文化扶贫实现贫困地区文化跨越发展

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全面小康的重要标志,而文化扶贫质量则是检验贫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试金石。为此我们积累了以下经验:第一,注重文化扶贫的国家战略规划。2015年12月《“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出台,明确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实施范围及具体措施。2017年2月《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与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相结合,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帮扶,将公共文化帮扶纳入行业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工作内容,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文化扶贫的顶层设计与规划。第二,提出文化扶贫的保护任务。2017年5月,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

方案》,从总体要求、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文化扶贫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了推动贫困地区艺术创作生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产业发展等七大任务。各省区文化管理部门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措施,有效推动地域文化扶贫有序开展。第三,分类实施各类文化扶贫项目。2016年8月出台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指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首批选取确定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等10个“非遗+扶贫”重点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通过弘扬传统工艺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业。公共文化扶贫的实施更加凸显了脱贫攻坚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下一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二) 聚力精神帮扶为新时代乡村提供文明新风

精神帮扶,就是通过文化扶贫,在广大群众中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倡导和践行文明新风。基于此:第一,国家层面积极实施农村基础文化工程。通过稳步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及农家书屋等一批重点工程,逐步改变了贫困地区“越穷越没文化,越没文化越穷”的落后面貌。2021年中央财政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资金230.3亿元,培育和选派1.9万文化工作者,深入脱贫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文化服务^[8],为全面推动贫困地区文化面貌改变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地方层面创新文化扶贫工作形式。为发挥文化扶贫的扶志效应,各地根据地域特点和自身条件,创造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扶贫形式:比如山西省开展“城乡半小时文化圈”工程,湖北省开展“一年一台大戏、一季一场小戏、一月一部电影、一村一个农家书屋”的文化低保工程,陕西省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文艺巡演”等活动,这些文化扶贫工程的有力实施,极大改善和丰富了贫困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第三,加强引导宣传,有效激发内生动力。针对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我们积极开展集政策、文化、教育、科技为一体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使贫困户及时知晓扶贫政策,引导其树

立谋发展的坚定信念。同时充分利用农民夜校、扶贫扶志学校、扶志点评红黑榜等有效形式,使贫困群众转变落后思想和陈旧观念,树立脱贫斗志和正确理念。文化扶贫中聚力实施精神帮扶,激发贫困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使新时代乡村不断焕发文明生机。

(三) 观念素质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文化扶贫实施以来,通过对农民开展市场营销、产品加工等一系列针对培训,农民观念、素质大幅度改变和提高,有效实现了与新时代发展的紧密契合。第一,文化扶贫提高农民市场意识和致富能力。为此,国家重点建设了大量市、县级骨干职业学校,将培育贫困户致富技能作为培训目标,经过培训后,不少农民成为致富能手。以陕西省为例,2021 全省农民工月均收入为 4532 元,比上年增长 10.9%^[9]。第二,文化扶贫促进技术型农民培养。充分掌握专业技能,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针对贫困劳动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特别要求其掌握与农业生产和现代农业相关的实用技术^[10]。例如陕西省旬阳县对缺技术的转移就业人员开展订单式培训,提高组织化输出程度;对无法离乡,但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群众开展种植养殖培训,提高了农民的技术能力。第三,文化扶贫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文化扶贫的实施促进农业新技术广泛应用,2020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突破 60.7%,使农民积极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积极调整现行种养结构,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步伐。

(四) 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改善乡村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涉及乡村婚丧嫁娶、分配交换和衣食住行等各领域,对乡村社会发展起着广泛深刻影响。十八大以来,在文化扶贫过程中,我们结合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精准施策,促进了农村移风易俗和文明提升。第一,文化扶贫凝聚农民集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冲击传统乡村,农民集体意识有所弱化,然而因长期群体生活所形成的风尚习惯,又深刻影响个人日常行为与思想。为此,我们在文化扶贫中特别注重提高贫困群众的集体意识,通过开展选树优秀典型、成立爱心超市、开展集体文体活动等大众文化活动,使贫困群众充分感受集体的温暖氛围,自觉形成了热爱集体的精神面貌,有利促

进了乡村风气的改观。第二,文化扶贫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保护。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地域辽阔,各地文化传统及历史差异显著,这孕育了瑰丽迥异的地域文化。新时代以来的文化扶贫,实则也是对地域文化的保护性传承。一方面我们因地制宜保护地方风俗和文化,另一方面在保持其特色的同时也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开发。例如陕西省镇巴县对镇巴苗寨和镇巴民歌进行现代演绎和产业转化,大力发展特色民俗,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为农民带来可观收益,成为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和民风变革的新渠道。第三,文化扶贫推动民间技艺传承创新。民间技艺承载着农民朴素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文化扶贫的持续实施,使民间技艺与现代工艺充分融合,不仅提高了其实用性与观赏性,也为传统乡村艺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在文化扶贫中不仅要科学继承民间技艺,保证传统工艺方法不失传,也要求适应乡村振兴的时代需要,做好民间技艺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化运作,切实为民间技艺传承发展贡献力量。

三、以促进文化振兴为远景的中国特色文化扶贫方略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庄严承诺。在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后,中国特色文化扶贫既要立足当前如何保持政策延续性,又要面向“后扶贫时代”科学解决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这对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一) 创新理念思路,合理优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体系

文化扶贫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实现更高要求与目标。为了继续发挥文化扶贫的“扶志”“扶能”“扶技”功能,我们必须把丰富贫困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11],以优化乡村文化振兴内容体系为重点内容。第一,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体系。我们应大力加强文化队伍建设,集合专业文化人才充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改变基层文化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同时,应立足新时代乡村发展,大力推进涉农文艺创作、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开拓乡村文化市场,推动文化扶贫向文化振兴的科学转型。第二,加

强对乡村文化振兴内容的宏观指导。乡村发展的系统性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文化振兴的基本任务,整体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职能,因此必须加强对其内容的宏观指导。为此,我们仍要以扶智扶志为根本目的,从指导乡村文化设施布局规划、引导乡村文艺创作生产、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角度对不同区域的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进行指导和规划,从而有效实现文化“化人”的内在要求。第三,突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方向。激发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焕发其积极精神风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点内容。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应依据脱贫群众的实际文化需要,积极利用各类文化传播方式提升其文化素养,并根据地域实际,发展民族和地域文化产业,营造浓厚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应重视脱贫群众的感悟体验,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他们奋斗美好生活、奋斗新时代的信心勇气,以构筑起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國力量。

(二) 凝聚振兴合力,构建协同促进的乡村文化振兴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12]这就要求我们从内部发生机制、外部支持机制及适宜发展环境三方面凝聚乡村文化扶振兴的合力。第一,理清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发生机制。文化扶贫的基本方式是以文化“化人”,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聚合、规范和认知等功能,进一步帮助脱贫群众实现对先进文化的认同及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憧憬;充分发挥扶贫主体的协同合作效能,使基层文化工作人员、农村学校教师及农村挂职人员都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参与力量;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挖掘其文化创造的无限潜力。第二,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外部支持体系。乡村文化振兴的外部支持体系应包含管理机制和相应评价机制。管理机制应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和脱贫群众共同参与的“大文化振兴”管理机制,可将原有县、乡、村三级文化管理组织拓展到村民组,使文化扶贫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评价机制则应重点考评文化“化人”效能,针对脱贫群众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况制订可操作性方案,建立乡村文化振兴联席互动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互动协调,共同推进与落实文化振兴

工作^[13]。第三,注重乡村文化振兴的良好环境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撑。例如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六营村,通过发展泥塑产业链,发展乡村旅游,增强了群众致富的信心,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应把文化振兴和环境营造有机结合,努力改造乡村落后文化环境,唯此才能使文化振兴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果,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面,进一步提高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 延展产业链条,使脱贫群众共享乡村文化发展的红利

文化产业是准公共品在文化市场和产业链条上的延伸,发展脱贫地区文化产业,使脱贫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红利,是保障文化振兴实施效果的重要目标。第一,大力延伸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链条。一方面要立足于脱贫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坚持全链条发展思路,在总量约束的前提下,以“存量”换“增量”,重点建设文化产业核心关键环节,让文化产业科学高效运转起来,有序推进脱贫地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根据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拓展其发展空间,全力打造优质文化产业品牌,淘汰落后文化项目,适时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第二,聚焦地域特色创新文化项目。一方面针对本地文化资源提炼特色,促使文化、产品与市场三者精准对接,实现要素聚集,提高本地文化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扶持打造一批特色文化品牌。这些品牌既要体现文化资源亮点,又要避免或片面强调原汁原味,缺乏提炼创新,它要求我们必须引导文化创作者、文化企业与脱贫户共同参与项目实施,在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切实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保证其合理收益。第三,拓展脱贫群众文化红利渠道。要把增进脱贫群众文化福利作为首要任务,健全文化振兴的政策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资金支持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信息保障体系等^[14],让脱贫群众不断提升文化获得感。一方面应继续扎实推进文化下乡、进村及入户工程,缩短他们与文化产品的接触半径,切实把文化红利转化为致富能力;另一方面把脱贫群众有效纳入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在产业发展中着力解决他们的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具体民生问题,理顺其分享文化红利的体制机制,畅通其政策接收渠道,不断放大乡村文

化振兴的社会效益,从而提高脱贫群众的参与感、幸福感,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长远目标。

(四) 构建长效机制,建立文化治理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绝对贫困已彻底消除,面对相对贫困的日益显现,如何通过构建文化扶贫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就显得至关重要。第一,必须切实提高文化扶贫的综合效能。要站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高度,让文化扶贫有效融入农民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结合脱贫地区特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等,在文化扶贫中增加民族性和地方性元素,走脱贫地区特色文化扶贫之路。另外要精准识别文化需求,在提高群众内生动力和就业技能等方面着力,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活动,科学缓解相对贫困。第二,健全各级政府文化扶贫和振兴的主体责任。文化扶贫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后脱贫时期,我们要认真总结以往文化扶贫的成功经验,将脱贫地区的文化振兴纳入地方立法规划,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同时应突破部门或行业局限,推进跨界融合和文化渗入,充分解决包括人才、管理等软性因素等在内的乡村短板^[15],实现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相对贫困治理的协同推进。第三,构建文化治理为主导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在后脱贫时期,物质贫困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要科学解决的是相对贫困条件下部分群体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丰富文化扶贫的科学内涵,加快构建以文化扶贫为主导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就显得异常重要。这包括国家保障、地方帮扶和社会互助等在内的文化帮扶责任体系,尤其是要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扶贫的支持政策,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各界爱心人士参与文化扶贫的优势,有序、有效和有力参与乡村文化扶贫和文化振兴事业,有效治理相对贫困,从而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文化扶贫的科学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继续发挥“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优势,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繁荣,最大限度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使之成为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丰富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J].党建,2015(12):5-7+13.
-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6]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7] 王虹.文化扶贫: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J].国家治理,2019(3):34-43.
- [8] 财政部调研小组.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N].中国财经报,2022-02-26(01).
- [9] 2021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10.7%[N].陕西日报,2022-02-09(01).
-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全文)[EB/OL].(2011-11-16)[2021-09-13].<http://www.scio.gov.cn/tt/Document/1048386/1048386.htm>.
- [11] 齐峰,由田.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江淮论坛,2020(1):146-150.
- [12] 燕继荣.凝聚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合力[N].光明日报,2019-10-17(11).
- [13] 王俊文.中部贫困地区农村“文化扶贫”的若干思考[J].学习月刊,2015(2):31-32.
- [14] 张学昌.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56-64.
- [15] 甘文华.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2(1):69-75.

(责任编辑:阿甘)

(校对:木子)

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生产率了吗？^{*}

金 通 朱保香 吴 旻

[摘要]如何利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的2013—2019年数据,以及农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创新性识别数据,实证检验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在供给侧,农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替代效应、智能生产效率升级与规模经济效应,以“低成本、高产量”实现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升级效应。在需求侧,农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精准供需匹配、定制化服务供给以及需求价值共创等途径,以“高产值、高价值”实现对劳动生产率的价值增长效应。特别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促进效应更强。研究结论为当前优化农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农业;数字化转型;劳动生产率;生产率悖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65-1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数字革命全面渗透了各个产业领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为32.5%,占数字经济比重约为81.7%^①。其中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政策强调,要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加快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动能,数字经济的“生产率之谜”“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等相关学术研究再次引起关注。宏观层面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存在数量增长效应、高效率增长效应、高质量创新增长效应^[1],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可能有所不同。微观层面研究则认为,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数字技术产生的替代效应、渗透效应、互补效应、协同效应^[2],赋能企业创造商业价值,提升企业生产率。中观层面研究发现,不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供应链的影响》白皮书指出,数字化变革将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然而,农业不同于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技术能否真正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其内在机理与作用渠道如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鉴于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指标^[3],本文选择从劳动生产率视角研究农业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20BJL118)。

[收稿日期] 2022-08-15

[作者简介] 金通,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310018;朱保香,浙江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310018;吴旻,浙江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310018。

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劳均农业增加值仅为美国的6.36%、英国的10.84%、韩国的28.34%、日本的23.51%^②,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而且,我国农业面临的劳动力老龄化、土地碎片化、经营小型化、种源“卡脖子”等现实压力日趋严重,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文献综述

劳动生产率特指单位时期内劳动创造的产出与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其中,产出通常有产量与产值两种衡量指标,而供给效率与需求价值分别影响产量与产值。本文旨在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因此着重从农业数字化转型与供给效率、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需求价值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

(一) 农业数字化转型与供给效率

多数研究从企业与产业等两个层面证实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供给效率。在企业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在创新研发、智能生产、数字运营等方面提升企业效率。Agrawal等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高识别效率,加快找出最有价值的组合,促进研发效率的提升^[4]149-174。而且,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战略管理、需求预测、产品设计、库存与定价管理、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关键决策,数字赋能企业提升运营效率^[5]。在产业层面,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提升产业效率。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对业务进行升级,以此提升生产效率与产业效率,推动产业跨境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6]。在制造业,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资源错配以及促进研发创新等提升制造业生产率^[7]。

在农业领域,现有发达国家经验与我国典型案例表明数字化转型可能会提升供给效率。美国数字农业技术已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形成紧密衔接,应用范畴覆盖从作物生长的微观监测到宏观农业经济分析,服务农民提升生产效率^[8]。汪旭辉等基于网易味央的案例研究提出,数字技术可实现对每头生猪的猪种培育、身体状况、三餐营养、猪舍环境、成长心情、音乐歌单、起居排泄等全生长周期管理,智能化养猪模式大力提升育种、养殖、防疫、加工、销售等农业全过程的生产效率^[9]。

(二) 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需求价值

本文相关的数字化转型与需求价值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价值。消费者作为数字经济的价值需求方,能够主动参与生产活动,影响价值供给的方式,同时数字技术便利生产企业更好地把握消费者需求价值^[10]。基于“涉入理论”(Involvement Theory),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进行精准推荐。其二是数字化转型帮助产需双方实现价值共创。胡海波、卢海涛基于仁和集团的案例研究显示,数字化通过结构与资源赋能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实现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提供商和分销商、医药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11]。

相关研究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价值提升。对于农户而言,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特色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直播、网上农博等数字活动,可满足以前被忽略或难以满足的“长尾需求”,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供需匹配^[12]。对于区域农产品品牌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提升品牌价值。如“丽水山耕”品牌的农产品线上展示平台,借助数字平台打通产、展、销、供、用等全产业链,实现农产品的品牌溢价30%以上。对于农业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创新提升企业的价值共创能力。先正达集团基于MAP平台整合上游的基础研发和下游的商业化主体,共同打造价值共创的产业生态。

总体上,基于企业和产业层面的研究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基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还发现,农业结构、人地比率、土地流转、劳动力流转、农业科技、城市化、户籍制度、转移支付收入等因素均可能会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13]。因此,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究竟如何,是否有利于提升土地-劳动比率、土地生产率和产值转化率^[14],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值得进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对于农业企业的微观层面研究较少涉及。而且,农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多数采用理论与案例研究,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深入研究相对

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则大多侧重于农业供给侧的效率研究,相对忽视农业需求侧的价值研究。本文旨在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深入研究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同时提供我国农业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三、微观机制与理论模型

(一) 微观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影响逐渐增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互沟通愈加重要,农产品的供需匹配更加精准。参照已有文献,本文提出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具有的双重效应,即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效应与需求侧的价值提升效应,既实现高速度增长又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效应

数字技术不仅具有典型的替代性、渗透性、创造性、协同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而且在具备更低的复制成本、交易成本、验证成本、追踪成本、运输成本的数据要素驱动下,能够促进生产数量的增长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如图 1):

其一是数据资本节约农业劳动力,提升土地-劳动比率。随着农业物联网、智慧农机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的推广应用,数字农业将逐渐替代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机器换人”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例如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牧场内精准匹配每份草料,在生产车间内数字管控每滴牛奶,在配送过程精准核算每次要货,整个 1000 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只有 4 名工作人员^③。

其二是智能生产升级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土地产出率。数字化决策、数控化工业设备、智能化生产工艺以及网络化生产流程,提升了生产的智能化与精准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生产能力,带来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改进^[15]。

其三是数字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资本劳动比。数字经济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性与低边际成本,基于大数据生产的数字产品或服务,起初投入较高的一次性固定成本,但是生产后的变动成本接近于零,甚至是零边际成本。而且,随着企业数据管理能力的提升,资产回报率将持续提升,资本积累的增加将更有效地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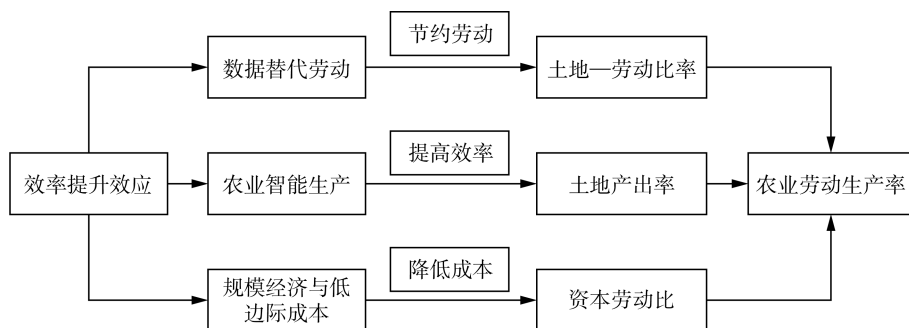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提升效应

2. 需求侧的价值提升效应

在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借助 ABCD 等数字技术深度参与生产过程,在供求关系中,消费者的价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如何提高消费者的使用价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价值需求,理应成为数字厂商关注的重点^[10]。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于数字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更加个性化、差异化与社会化,甚至希望获得私人定制化服务。对于厂商而言,短渠道深度连接消费者,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柔性供给多元化数字产品和服务,将帮助企业实现对消费者的差异化定价与最大化的用户价值。一般来说,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侧的价值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如图 2):

其一是精准匹配供需双方,提升产值转化率。数字经济“小前台+大平台”的典型模式,打破时间、地域、距离、季节等壁垒,汇聚分散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的农产品供求信息,以大数据、算法、物联网等数字技

术,帮助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高效地搜寻与匹配到对方,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实现农产品产销一体,提高农产品的产值转化率。

其二是定制化服务消费者,提升品牌溢价率。随着农业生产者获取关键要素能力的提升,农业生产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消费者的价值需求,一方面凭借可视化、动态化、全程可溯源的农业全生命周期管理,降低农产品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好地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整合农业数字资源,及时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使用价值与时空价值,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完美体验式服务,凭借“优质优价”获取更高的品牌溢价率,提升企业的消费者黏性与无形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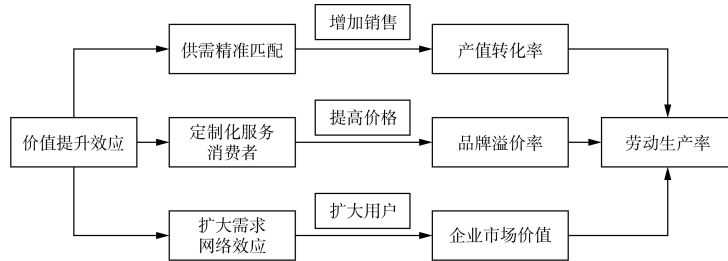


图 2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价值提升效应

其三是扩大需求网络效应,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数字经济需求侧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当更多人消费某一商品时,一个消费者额外消费一个商品会获得更高的价值。随着更多的农业数据与用户数据的积累,农业企业不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递增的服务价值,还可以基于广泛的产销共同体与产业融合创新,共同创造更多的新价值、新业态与新模式,以更强的市场反响能力持续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二) 理论模型

劳动生产率是产出与劳动投入的比值,产出既可以用实物意义的产量来表示,也可以用价值意义的产值(或收入)来衡量。

1. 实物意义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如果以 Q 、 L 和 A 分别表示农业总产量、农业劳动力和土地数量,则实物意义的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土地-劳动比率 (A/L) 和土地生产率 (Q/A),即:

$$\frac{Q}{L} = \frac{A}{L} \times \frac{Q}{A} \tag{1}$$

上式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主要由土地、劳动力与产量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假如劳动力人数不变,则扩大土地规模以及提高农业总产量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

如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1)式转化为:

$$\ln \frac{Q}{L} = \ln \frac{A}{L} + \ln \frac{Q}{A} \tag{2}$$

农业数字化转型在效率提升效应的作用下,以更少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了更多的农业产量,即 L 变小的同时 Q 变大。现在假设土地 A 不变化, L 变化为 $(L - \Delta L)$, Q 变化为 $(Q + \Delta Q)$, ΔL 和 ΔQ 均为正数,则(2)式变化为:

$$\ln \frac{Q'}{L'} = \ln \frac{A}{L - \Delta L} + \ln \frac{Q + \Delta Q}{A} \tag{3}$$

将(3) - (2)可得:

$$\ln \frac{Q'}{L'} - \ln \frac{Q}{L} = \ln \frac{A}{L - \Delta L} + \ln \frac{Q + \Delta Q}{A} - \left(\ln \frac{A}{L} + \ln \frac{Q}{A} \right)$$

$$\begin{aligned}
 &= \left(\ln \frac{A}{L - \Delta L} - \ln \frac{A}{L} \right) + \left(\ln \frac{Q + \Delta Q}{A} - \ln \frac{Q}{A} \right) \\
 &= \ln \frac{L}{L - \Delta L} + \ln \frac{Q + \Delta Q}{Q} > 0
 \end{aligned} \tag{4}$$

即 $\ln \frac{Q'}{L'} > \ln \frac{Q}{L}$, 说明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效应, 通过节约劳动力以及提高产量, 提升了土地 - 劳动比率以及土地产出率, 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 价值意义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中, 经营者更加关注以农产品为“桥梁”的价值收益, 价值意义的劳动生产率更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如果以 A 、 L 、 Q 、 Y 分别表示土地、劳动力、产量以及产值, 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可分解为土地 - 劳动比率 (A/L)、土地生产率 (Q/A) 以及农产品的产值转化率 (Y/Q) 的三者组合, 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表述为:

$$\frac{Y}{L} = \frac{A}{L} \times \frac{Q}{A} \times \frac{Y}{Q} \tag{5}$$

如果以 P 表示价格, 产值 Y 则可表示为:

$$Y = P \times Q \tag{6}$$

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变化为:

$$\frac{Y}{L} = \frac{P \times Q}{L} \tag{7}$$

若对(7)式两边取自然对数, 可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数表达式为:

$$\ln \frac{Y}{L} = \ln(P \times Q) - \ln L = \ln P + \ln Q - \ln L \tag{8}$$

假定 $y = Y/L$, 农业数字化转型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y_1 , 转型之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y_2 , 则相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ln y_1 = \ln P_1 + \ln Q_1 - \ln L_1 \tag{9}$$

$$\ln y_2 = \ln P_2 + \ln Q_2 - \ln L_2 \tag{10}$$

考虑到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效应和价值提升效应, 给农业企业带来的节约劳动力、增加产量以及提高价格(需求侧的品牌溢价)的综合作用, 农业数字化转型前后的劳动力 L 、产量 Q 和价格 P 的变化可分别表示为:

$$L_2 = L_1 - \Delta L \tag{11}$$

$$Q_2 = Q_1 + \Delta Q \tag{12}$$

$$P_2 = P_1 + \Delta P \tag{13}$$

其中, 假定劳动力的变化量 ΔL 、产量的变化量 ΔQ 以及价格的变化量 ΔP 均为大于零的正数。则农业数字化转型前后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即(10) - (9) 可转换成:

$$\begin{aligned}
 \ln y_2 - \ln y_1 &= (\ln P_2 + \ln Q_2 - \ln L_2) - (\ln P_1 + \ln Q_1 - \ln L_1) \\
 &= (\ln P_2 - \ln P_1) + (\ln Q_2 - \ln Q_1) + (\ln L_1 - \ln L_2) \\
 &= \ln \frac{P_2}{P_1} + \ln \frac{Q_2}{Q_1} + \ln \frac{L_1}{L_2}
 \end{aligned} \tag{14}$$

现将(11)(12)和(13)相应代入(14)中:

$$\ln y_2 - \ln y_1 = \ln \frac{P_1 + \Delta P}{P_1} + \ln \frac{Q_1 + \Delta Q}{Q_1} + \ln \frac{L_1}{L_1 - \Delta L} \quad (15)$$

因 $\ln \frac{P_1 + \Delta P}{P_1} > 0, \ln \frac{Q_1 + \Delta Q}{Q_1}$, 以及 $\ln \frac{L_1}{L_1 - \Delta L} > 0$, 即(15)式中右边的三项均大于零, 由此可以得出左边也大于零, 即:

$$\ln y_2 - \ln y_1 = \ln \frac{y_2}{y_1} > 0 \quad (16)$$

在此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 y_1 和 y_2 均为正数, 则(16)式等价于:

$$y_2 > y_1 \quad (17)$$

这就说明农业数字化转型后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转型之前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参照(5)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析, 在假定土地规模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效应有助于提高土地-劳动比率和土地产出率, 价值提升效应有助于提高产值转化率, 农业数字化转型将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现实情况中,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快, 为最大化地发挥数字农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规模经济效应, 农业企业倾向于获取更多的土地面积, 进一步迭代提升生产效率与企业价值,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可能会更加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3—2019 年沪深 A 股农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涉及的劳动生产率和控制变量等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个别变量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为提高实证回归质量, 剔除了企业营业收入、固定资产、企业价值、员工人数等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 剔除了 ST、*ST、PT 及终止上市的农业企业, 仅保留至少连续五年不存在缺失的样本。

(二)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依据农业上市公司数据可得性, 本文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在基础回归部分采用营业收入/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劳动生产率(LP)。在稳健性测试部分, 则采用人均增加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劳动生产率, 其中增加值由职工薪酬、应缴税费、折旧与营业利润这四部分加总计算所得。

2.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数字化转型(DLTN): 本文借鉴陈剑^[5]、刘飞^[17]等的做法, 依据农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采用的“ABCD”技术以及应用场景的分类, 将农业数字化转型分解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经营管理两类一级指标, 其中数字基础设施由数字硬件、数字软件以及数字基地这三个二级指标共同构成, 数字经营管理则由数字生产、数字管理、数字营销与数字物流四个二级指标组成。考虑到数据化转型相关特征信息采集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 选择从农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型”的词频统计角度来刻画转型程度。在实际操作中, 本文借助 Python 爬虫功能归集整理沪深两市相关农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 通过 Java PDF box 库提取所有文本内容, 匹配同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词词频测度, 并在此基础上将相应词频统计与农业上市公司进行匹配和分类汇总, 形成农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初始指标。在以对数化方式纠正这类数据的“右偏性”特征之后,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数值。农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详细情况见表 1。

表1 农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硬件	对年度报告中“传感器、无人机、机器人、智能机械(农机)、遥感、PC(电脑)、摄像头”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软件	对年度报告中“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基地	对年度报告中“数字农场、数字牧场、数字工厂、数字田园、数字基地、现代农业基地”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经营管理	数字生产	对年度报告中“自动化、设施化、定制化、精准化、信息化、模型、算法、程序、监测”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管理	对年度报告中“在线采购、数字金融、管理软件、风险预测、线上培训、数据决策、数字服务”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营销	对年度报告中“在线调查、在线广告、线上销售、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网络销售、可追溯”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数字物流	对年度报告中“智能物流、智慧物流、供应链、智慧仓管、智能配送、冷链物流、保鲜物流”等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

在进一步深入分析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时,本文依据上文的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一次性固定投入,故采用人均资本(AKL)指标来验证农业数字化转型在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效应。考虑到需求侧的价值提升效应可能产生品牌溢价的效果,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且数据资产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形资产,所以本文采用无形资产(INT)来验证农业数字化转型带给劳动生产率需求侧的实际作用机制。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包括资产回报率(ROA,税后净利润/总资产)、企业年龄(Age,企业成立年龄的自然对数)、企业家学历(Education,依据不同学历层次分别赋值)、政府补助(Subsidy,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以及国有持股比例(Statehold)。变量的详细数据结构参见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3。

表2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的定义
劳动生产率	LP1	劳动生产率:用营业收入/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LP2	劳动生产率:用销售额/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农业数字化转型	DLTN	农业数字化转型:主成分分析计算得到
	EDLTN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当年有数字化转型赋值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	AKL	人均资本:用人均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INT	无形资产:用无形资产的对数值表示
控制变量	ROA	资产回报率:用税后净利润/总资产计算
	Age	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龄的自然对数表示
	Education	企业家学历:依据专科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分别赋值
	Subsidy	政府补助:用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表示
	Statehold	国有持股比例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i>LP1</i>	325	9.709	17.296	13.445	0.816
<i>LP2</i>	325	8.007	23.888	19.251	1.657
<i>DLTN</i>	325	0.000	17.002	3.915	3.490
<i>Sale</i>	325	14.333	25.020	20.768	1.472
<i>AKL</i>	325	5.548	14.264	10.819	1.405
<i>INT</i>	325	8.668	23.847	19.929	1.811
<i>Value</i>	325	0.000	25.981	18.387	8.630
<i>ROA</i>	325	-1.859	65.441	0.228	3.632
<i>Age</i>	325	0.019	3.467	2.860	0.358
<i>Education</i>	325	1.000	7.000	3.423	1.180
<i>Subsidy</i>	325	0.000	19.162	14.628	5.057
<i>Statehold</i>	325	0.000	0.754	0.162	0.219

4. 模型设定

为研究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设定如下模型分别加以检验:

$$LP = \beta_0 + \beta_1 DLTN + \sum \phi Control^k + \sum \gamma Individual + \sum \mu Year + \varepsilon \quad (18)$$

$$Mediator = \theta_0 + \theta_1 DLTN + \sum \phi Control^k + \sum \gamma Individual + \sum \mu Year + \tau \quad (19)$$

$$LP = \phi_0 + \phi_1 DLTN + \phi_2 Mediator + \sum \phi Control^k + \sum \gamma Individual + \sum \mu Year + \delta \quad (20)$$

其中,劳动生产率(LP)为被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LTN)是核心解释变量,也表示农业数字化转型直接给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数量增长效应;中介变量(Mediator)包括人均资本量 and 无形资产两个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效应和价值提升效应。Individual 和 Year 表示企业的个体和年度固定效应,分别控制个体层面的非时变因素和年份层面的冲击影响; ε 、 τ 和 δ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第(18)式检验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总体影响,用第(19)式和第(20)式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4 报告的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劳动生产率”的基准分析结果。列(1)仅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结果显示,农业数字化转型指标(DLTN)的系数为 0.0284,且通过 10%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列(2)则进一步纳入控制变量集,相应的农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的回归系数有所增加(系数为 0.0377),且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纳入控制变量后,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效应进一步凸显,农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二者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资本对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的替代,显著增加农业总产量。与此同时,农业数字化转型加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以数字技术为桥梁提高农产品的供需匹配度与品牌溢价率,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持续提升。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资产回报率(ROA)对劳动生产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资产回报率越高,劳动生产率也越高。而国有持股比例(Statehold)则与劳动生产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国有持股比例高的农业企

业,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社会责任等因素会降低其对劳动生产率的优先考虑。

(二) 作用机制检验

1.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济影响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为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而采取的重要尝试,通过工具、业务、管理、商业模式等数字化转型举措,期望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如若农业数字化转型无益于企业绩效的提升,那么企业一次性投入巨大的数字化转型成本,就无法通过后期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网络效应等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与信心将会有所动摇。

表 4 基准回归: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变量	(1)	(2)
	<i>LP1</i>	<i>LP1</i>
<i>DLTN</i>	0.0284 * (1.82)	0.0377 * * (1.92)
<i>Age</i>		0.265 (0.19)
<i>Education</i>		0.014 (-0.29)
<i>Subsidy</i>		-0.121 (-1.27)
<i>ROA</i>		0.452 * * * (0.88)
<i>Statehold</i>		-2.846 * (-2.53)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103	0.417
Adjusted <i>R</i> ²	0.068	0.332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基于此,本文选择企业的销售额、人均资本、无形资产以及企业市值四个经济指标进行检验,从有形的收益以及无形的价值两个层面共同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济影响。其中,销售额指标采用销售额的对数值,人均资本则使用人均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通过这两项指标尝试验证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否真正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收益。无形资产指标则采用无形资产的对数值,企业价值以经典的托宾 *Q* 为代理变量,这两项指标主要估算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商誉及未来的价值影响。

表 5 的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农业企业的销售额(*Sale*),数字化销售促进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值转化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数据资本的替代效应,不仅节约农业劳动力,还降低人均资本(资本劳动比,*AKL*)。由此说明,农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可能存在“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回报。而且,农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提升无形资产(*INT*)以及企业市值(*Value*),有效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同价值创造。农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潜在“名利双收”效应,将进一步激励农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表 5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济影响

变量	(1)	(2)	(3)	(4)
	<i>Sale</i>	<i>AKL</i>	<i>INT</i>	<i>Value</i>
<i>DLTN</i>	0.0569*** (3.49)	-0.0229* (-1.74)	0.0305*** (2.96)	0.0381*** (3.25)
<i>Age</i>	1.989* (1.80)	1.429 (0.84)	1.362 (0.97)	2.100* (1.92)
<i>Education</i>	0.0233 (0.64)	-0.0607 (-1.14)	-0.0203 (-0.51)	0.0211 (0.86)
<i>Subsidy</i>	0.0235 (0.80)	0.0447 (0.78)	0.105*** (3.72)	0.0956*** (3.39)
<i>ROA</i>	0.632* (1.89)	-0.744*** (-3.74)	-0.267** (-2.04)	-0.0791 (-0.33)
<i>Statehold</i>	0.705 (0.96)	-1.959* (-1.88)	-0.0166 (-0.02)	1.543 (1.16)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i>N</i>	325	325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399	0.223	0.387	0.510
Adjusted <i>R</i> ²	0.369	0.188	0.354	0.484

2. 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效应

在表 6 中,数字化转型对人均资本(AKL)的回归系数为 -0.0229 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参见列(1),意味着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均资本有明显抑制作用,以更低的劳动力与资本成本实现了更高的销售收入。而且,列(2)报告了人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中介效应结果,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0.0362)和人均资本的系数(0.358)均为正值,且分别在 5% 和 1%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农业数字化转型在人均资本的中介作用下发生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提升效应。

本文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在供给侧的要素替代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诱发企业改变生产要素和成本结构,数据赋能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提高产量与节约劳动的双重效果,从劳动生产率(Y/L)的分母与分子两端体现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效应。

表 6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效率提升效应

变量	(1)	(2)
	<i>AKL</i>	<i>LP1</i>
<i>DLTN</i>	-0.0229* (-1.74)	0.0362*** (2.36)
<i>AKL</i>		0.358*** (4.46)
<i>Age</i>	1.429 (0.84)	1.600* (1.85)

(续表)

变量	(1)	(2)
	<i>AKL</i>	<i>LP1</i>
<i>Education</i>	-0.0607 (-1.14)	0.0161 (0.69)
<i>Subsidy</i>	0.0447 (0.78)	-0.0511 (-1.39)
<i>ROA</i>	-0.744*** (-3.74)	0.645*** (2.85)
<i>Statehold</i>	-1.959* (-1.88)	-1.005* (-2.00)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223	0.391
Adjusted <i>R</i> ²	0.188	0.361

3. 需求侧的价值提升效应

由表7的回归结果可知,农业数字化转型与无形资产的系数为0.036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数据资本的深化,将对企业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INT*)形成显著的提升效果,参见列(1)。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将有利于农业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列(2)报告了无形资产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中介效应,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虽然略微下降,但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此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转型在无形资产的中介作用下,仍然产生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正面促进作用,由此有效验证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增长效应。

表7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生产率的价值提升效应

变量	(1)	(2)
	<i>INT</i>	<i>LP1</i>
<i>DLTN</i>	0.0367*** (2.96)	0.0347** (2.11)
<i>INT</i>		-0.207* (-1.87)
<i>Age</i>	1.009 (0.74)	1.903* (1.85)
<i>Education</i>	-0.00427 (-0.11)	-0.00487 (-0.16)
<i>Subsidy</i>	0.0925** (2.66)	-0.0246 (-0.69)
<i>ROA</i>	-0.0655 (-0.56)	0.357 (1.66)
<i>Statehold</i>	0.505 (0.55)	-1.553*** (-3.23)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续表)

变量	(1)	(2)
	<i>INT</i>	<i>LP1</i>
<i>N</i>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315	0.275
Adjusted <i>R</i> ²	0.284	0.240

(三) 稳健性检验

Erik Brynjolfsson^{[18]23-57}等指出,人工智能生产率悖论的一种解释是 ICT 资产作为一种通用性技术,其生产率效应可能存在时滞。为进一步提升核心结论的说服力,本部分对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作为替代变量,延长时间窗口。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系数为 0.0284,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时滞。而且,虽然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下降,但回归结果并未改变本文的主要实证结论。

表 8 稳健性检验: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检验

变量	(1)	(2)
	<i>LP1</i>	<i>LP1</i>
<i>DLTN</i>	0.0377** (1.92)	
<i>L. DLTN</i>		0.0284* (1.76)
<i>Age</i>	0.265 (0.19)	1.307 (0.92)
<i>Education</i>	0.014 (-0.29)	-0.0177 (-0.52)
<i>Subsidy</i>	-0.121 (-1.27)	-0.0437 (-0.87)
<i>ROA</i>	0.452*** (0.88)	0.473*** (2.14)
<i>Statehold</i>	-2.846* (-2.53)	-1.583*** (-2.97)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417	0.240
Adjusted <i>R</i> ²	0.332	0.207

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员工人数的计算方式来衡量劳动生产率。本部分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选择用销售额/员工人数来替换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表 9 的数据显示,在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计算口径后,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的系数(0.110)依然显著,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 9 稳健性检验:劳动生产率更换计算口径

变量	(1)	(2)
	<i>LP1</i>	<i>LP2</i>
<i>DLTN</i>	0.0377** (1.92)	0.110* (1.69)
<i>Age</i>	0.265 (0.19)	4.290 (0.75)
<i>Education</i>	0.014 (-0.29)	0.0535 (0.3)
<i>Subsidy</i>	-0.121 (-1.27)	-0.0206 (-0.11)
<i>ROA</i>	0.452*** (0.88)	0.559 (-1.15)
<i>Statehold</i>	-2.846* (-2.53)	6.733** (-2.15)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325	325
Partial <i>R</i> ²	0.417	0.056
Adjusted <i>R</i> ²	0.332	0.013

(四) 异质性分析

企业的属性特征差异使得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决策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反应策略。有鉴于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对农业企业的财政支持较为重视。表 10 的数据显示,农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显著(系数为 0.0377),而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企业凭借其在农业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本身更易获得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的支持,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相对较高,在传统路径依赖下,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内生需求并不强烈,尤其是在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较高且收益不确定的情形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决策相对比较谨慎。

表 10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i>LP1</i>	<i>LP1</i>
<i>DLTN</i>	0.0366 (-1.55)	0.0377* (-1.92)
<i>Age</i>	1.935 (-1.39)	0.265 (-0.19)
<i>Education</i>	-0.0103 (-0.37)	0.0141 (-0.29)
<i>Subsidy</i>	-0.0594 (-1.13)	-0.121 (-1.27)
<i>ROA</i>	0.304 (-1.54)	-0.452 (-0.88)
<i>Statehold</i>	-1.085 (-1.61)	-2.846** (-2.53)

(续表)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LP1	LP1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i>N</i>	185	140
Partial R^2	0.249	0.417
Adjusted R^2	0.197	0.33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将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农业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向,分别研究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在供给侧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效率提升效应,由于数据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全面渗透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帮助农业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产量,通过节约劳动力与提高农业产量的双重效果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二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在需求侧存在劳动生产率的价值提升效应,数字平台帮助企业实现精准供需匹配、定制化服务以及需求网络效应,实现企业的用户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增长,以需求拉动有形产值与无形价值的双提升强化劳动生产率效应。

三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销售额、资本劳动比、无形资产以及企业市值等经济指标存在显著影响。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非国有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相对更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农业数字化转型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农业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时,要充分利用各种农业数据资源,以数据资本有效整合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本,以数字平台驱动企业科学决策,以数字产品优化农产品生产效率,从生产、业务、管理与模式等全流程实现全面转型,构建生产、加工、流通与销售等全过程的数字化链条,引导农业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与运营规模化,最终实现现代农业的高效率增长。

第二,农业企业在需求侧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使用价值,要坚持以消费者的需求价值为导向,以更加精准匹配的差异化供给、敏捷贴心的定制化服务、互利互惠的动态化价值,实现更高的销售盈余与品牌溢价。农业企业要主动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产销共同体,积极打造网络协同的数字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价值共创商业生态系统,全产业链协同推动农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第三,政府在鼓励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时,要引导企业合理平衡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与收益,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各类行业数字平台,带动中小企业共享数字效益。为缓解农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要注重加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以更加精准的政府补助驱动农业企业实现更为显著的数字化转型效应,以市场化方式激励企业自主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

注释:

-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
- ② 数据来源:wdi.worldbank.org/table/3.3.
- ③ 数据来源:<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641319>.

参考文献:

- [1] 唐要家.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增长的机理与政府政策重点[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0): 61-67.
- [2] 蔡跃洲, 陈楠. 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5): 3-22.
- [3] 孔祥智. 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估算[J]. 改革, 2019(5): 38-47.
- [4] Agrawal, Ajay, John McHale, Alexander Oettl. "Finding needles in haystack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combinant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 [5] 陈剑, 黄朔, 刘运辉. 赋能到使能——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运营管理[J]. 管理世界, 2019(2): 117-128.
- [6] 肖旭, 戚聿东.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 改革, 2019(8): 61-70.
- [7]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 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5-23.
- [8] 傅昌奎, 李寒凝. 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发展的国际经验[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8-05(10).
- [9] 汪旭辉, 赵博, 王新. 数字农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网易味央猪的案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8): 115-129.
- [10] 戚聿东, 肖旭.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 管理世界, 2020, 36(06): 135-152+250.
- [11] 胡海波, 卢海涛. 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演化中价值共创研究——数字化赋能视角[J]. 经济管理, 2018, 40(8): 55-71.
- [12] 殷浩栋, 霍鹏, 汪三贵.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 改革, 2020(12): 48-56.
- [13] 周京奎, 王贵东, 黄征学. 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 ——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9, 54(1): 100-115.
- [14] 高帆, 尹晨.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演变[J]. 求是学刊, 2020, 47(4): 70-79.
- [15] 金碚.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 5-18.
- [16] 李唐, 李青, 陈楚霞. 数据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新发现[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6): 174-192.
- [17] 刘飞.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三重影响机制[J]. 财经科学, 2020(10): 93-107.
- [18] Brynjolfsson, Erik, Daniel Rock, and Chad Syver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 clash of expectations and statistics."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责任编辑: 田青)

(校对: 木子)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选择：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张淑萍

[摘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过程深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嬗变的影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视角回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发现单一产权结构下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土地产权结构多元化提高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效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夯实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合作根基。目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不少挑战,整体发展质量不高。实质性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应聚焦构筑其经济效率基础,从制度上明晰其法律市场地位、划清组织职能边界,健全以法人治理为基础的微观运行机制与以“赋权强能”为核心的长效发展机制,真正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驱力。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济效率;路径选择;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80-07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经济是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集体成员的自愿联合和合作实现共享发展的经济形式。当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济正在不断创新发展,其实力不断增强。到2020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村、组和乡镇三级组织的资产总额达到7.7万亿元,负债3.1万亿元,净资产超过4.6万亿元;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有54万个,集体经营性收入没有达到10万元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24万个,占比44.4%,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17.9万个,占比33.1%^[1]。从实践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自身经济实力和动能不强,还不能充分发挥潜在功能。从理论层面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农村集体产权发展^[2]、农民共同富裕^[1]、乡村治理^[3]等视角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进行阐释,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功能的认识。不过,此类文献大多侧重于对现象描述与经验

概括,其研究思路多未纳入主流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Ronald. H. Coase)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和产权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关于生产要素配置的契约关系,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4]³⁷。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沿着科斯的分析逻辑,诺思(Douglass C. North)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5]⁴,而这种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和激励个人生产性努力的有效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诺思认为,制度是“一整套规则,是遵循法律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由不均衡到均衡的转变过程及其作用结果,而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诱因和动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对所有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

* [收稿日期] 2022-05-31

[作者简介] 张淑萍,经济学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

率和生产率的直接刺激^{[6]98}。这就阐释了新制度经济的核心观点:产权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率及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沿着这个逻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考察了产权的特性、功能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阿尔钦认为,产权具有可分割、可分离和可让渡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合作性的联合生产成为可能,而且合作性联合生产的实现取决于“团队生产率”。在团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队所生产的不可分解的没有“投入归属”的价值^{[7]123}。德姆塞茨认为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的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每一种成本和收益的潜在激励。当产权的使用可以完全由个人做出时,收益和成本会向单一所有者集中,就产生了更有效的个人行动的激励。当产权的使用及其成本和收益集中于一群人时,产权的效率就取决于其合作行动的官僚化成本和市场激励的大小。如果合作行动的成本大于市场激励,则团队合作就是一种无效的产权安排形式^{[8]71}。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观点: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应该建立在能够充分发挥产权的三个特性(排他性、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并确保相应功能实现的基础之上。上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我国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效率及其改进方向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本文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效率做出客观评价,剖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境,进而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效率

从产权结构看,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单一产权结构阶段、1978年以后的产权结构二元分化阶段和2012年以后的产权结构多元分化阶段。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演进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期和家庭承包的合作经营时期,后两个时期对应的是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一)单一产权结构下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彻

底地将农民土地私有权集中到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集体所有权、经营权归为人民公社的产权重构,确立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为土地产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由此形成集体产权主体模糊和农民权利主体身份缺位。其中“队为基础”确立了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明确了生产队的权利主体和分配主体身份,但是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实际上把持生产决策权并干预生产队的收益分配权,集体合作效率难以实现;农民权利主体身份的缺失使农民失去了自主行使收益权的能力,工分制的分配制度无法将个人的劳动投入与其收益直接挂钩,存在比较严重的无效激励,造成个体劳动效率低下;人民公社的产生是国家权力向农村渗透的结果,并非农民自愿合作、转让其土地产权而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作为权利主体,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行使对集体生产经营管理权利,不能真正体现社员意志,生产队和农民之间单向的监督约束关系导致集体经济管理中出现“浮夸风”和“瞎指挥”情形,造成集体经济的治理效率不高。整体上,人民公社时期,单一产权结构下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

(二)土地产权结构多元化重构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效率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改进效率提供了强大的产权激励。农村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集体保留所有权、农户以承包合同形式获得了土地承包权,在农民和集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由所有权、承包权构成的产权共同体。从产权制度上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具有两个经营层次:“统”的层次,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和调节,包括管理集体资产、服务农民、开发集体资源和发展集体经济等;“分”的层次,通过契约形式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身份,农户成为拥有独立生产决策权的经营单位,农民家庭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与获得收益直接挂钩,释放出巨大的家庭经营效率。到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产权效率被释放殆尽:在“统”层次上,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不清晰,特别是部分地区未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被“分光吃净”,加之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未得到法

律确认和保护,限制了农户作为承包权主体合作的可能,在集体层面缺少制度化或组织化合作行为,集体经济的合作效率和治理效率难以体现,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日渐式微。在“分”层次上,分得过度导致农户经营陷入土地细碎化、生产方式较为落后和市场盈利能力不足等困境,限制了家庭经营的效率持续提高。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的颁布,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2004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为主要内容,通过土地确权颁证和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巩固了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合作意识和自发行动,为家庭经营效率和集体合作效率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强大的产权激励。概括来看,这个时期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逐步分离,丰富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权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家庭经营效率和农村集体合作效率,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和集体资产归属不清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率并不高。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合作根基

2016年底,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清产核资、确立集体成员身份、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为主要内容,这就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夯实了产权合作的根基。一是以公平为基础重塑财产权利配置效率。兼顾公平和效率也是集体经济有效性的体现^[2]。“归属清晰”是指将集体资产分类分级划归到村组、村、乡镇一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主体并未明晰到个人,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只是给予集体成员对集体增值收益分配权而非将集体资产分割给个人,隐含着公平导向的财产权利分配。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承包权出租、经营权入股的方式,使社员获得相对固定的租金收益和灵活的分红收入,既保障了农民作为土地承包权主体的收益,又对经营权主体的经营行为产生最大化激

励,从而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率。农村股份经济合作制把大量闲置的集体资产股改量化后以个人股份或份额方式重新组合配置,利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以公平为导向(成员身份确认和成员权利转让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促进资源要素流动,有利于盘活集体资源。二是确立农民财产权利主体地位,激发合作动力。此轮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激活了以土地股份合作、农村经济股份合作制为实现形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行政权力介入组织农民进行合作不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借助市场力量、体现农民自愿性合作,自愿性合作源自建立在界定清晰的产权主体和行为边界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净收益增加是吸引农户自愿合作的经济基础,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股份经济合作制下,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份额入股、以产权为纽带,实现资源要素融合和规模化经营,实行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获得收益远超过农户家庭分散经营收益。“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的制度性约束,“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用脚投票机制,有利于增进合作效率和降低监督成本。三是民主管理提高治理效率。《民法总则》《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从法律上承认其市场主体地位。新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行“三权四会”制度,即集体成员拥有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合作社实行法人治理,对重大生产经营决策、重要人事任免、收益分红等重要事项召开社员大会,社员根据股权折算决策票数,一股一票,实行民主管理。理事会是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负责股份合作社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监事会对理事会行使监督权。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相比,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替代了领导干部的权威管理,监事会的民主监督替代了“三级所有”的行政约束,部分农村实行“政社分离”,弱化了乡村行政组织对股份合作社的行政干预,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效率。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过程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嬗变过程。完整的集体土地产

权由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一组权利束组成,集体土地产权的发展,表现为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丰富程度、各项权能分离程度和可交易程度,三者共同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率差别。人民公社时期,产权结构单一,农民失去了产权主体地位,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效率大打折扣。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相继分离,不断硬化了农民承包权,激发了农民从事土地生产经营的效率,但集体资产总量不清、归属不明、管理和收益分配不透明等,使得传统农村集体经济逐渐式微。以土地“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归属清晰、权能分化、使用权流转和经营权股份合作为核心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塑了集体经济的产权合作根基,提高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率,增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整体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不少挑战,既包括对集体经济的认识有待深化,特别是自身市场地位和职责范围还不够清晰,又包括内在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外在的长效发展机制等制约因素,使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统”层功能不彰

从根本上看,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动力和手段,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是根本目的。部分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借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跟风挂牌”情形,“等靠要”思想严重,对扶持政策依赖性强,集体经济“空壳村”所占比重依然较高。到2019年,仍有超过50%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是没有收益或收益低于5万元的“空壳村”,其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经营性资产规模偏小和集体经济实力较弱,其“空壳村”的占比达到72.6%、62%,仍高于全国57.7%平均水平。深究之下,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反映出集体经济的效率可持续较弱和“统”层功能不足的难题,直接影响农民参与集体经营的比较收益和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发挥,造成集体经济发展动能不强。

从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效率来看,尽管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强了集体经济的“统”层功能,但依然面临着“分易合难”的老问题,集体经济服务农民和开发集体资源

的能力有待增强。从服务农民的“统”层功能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相比,集体经济在开展农业产业化服务、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衔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以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例,在土地细碎化和整合成本较高情形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着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的外部竞争挤压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成本控制压力。从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效率来看,虽然部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四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内部组织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还存在决策权过于集中、经营权行政化运行、民主管理监督权缺位等现象。由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担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及村委成员在理事会或监事会任职,往往把村委会内部行政管理方式复制到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治理中,形成决策权行政化倾向,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甚至演变成“村干部经济”。因此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首要任务是跳出“改革-挂牌”的形式逻辑,实质性推动集体经济发展^[9],应当聚焦于提升其经济效率,通过增强“统”层功能,逐渐消除“空壳村”问题。

(二) 微观运行机制不够健全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亟待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包括清晰的产权结构、资产管理机制和组织功能边界等。在产权结构上,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明晰但较为封闭,集体成员“共同共有、人人享有份额”,但集体成员权转让局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非集体成员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获得集体产权,无法真正地反映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也不利拓展集体成员的财产升值空间。在集体资产管理上,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市场和载体平台发育不成熟,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资产交易公开制度、监管制度和党内纪律干部监督制度落实不严,集体资产交易中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行使不充分等,导致集体资产交易不透明、集体资产隐性流失和村级“小微腐败”等现象。

在组织功能边界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在集体资产管理和承担村庄公共事务上存在交叉,农村“政企不分”倾向明显,降低了集体经济组

组织的运行效率。一方面,法律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能有重叠。《民法通则》和《民法典》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都可以作为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全国人大相关补充性规定“只有在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可由村委会经营、管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但是在实践中,部分地区的村委会还在管理集体资产和开发集体资源,直接原因是没有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或者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深层原因是经营、管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将带给村委会直接的经济收益并增强村干部管理村庄的政治权威,这就使得村委会不愿主动将村集体资产划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管理支出负担过重,由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由地方财政负责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务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投入不足以维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务运转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然地就充当了村庄公共支出的投入者角色,过度分担了本应由村委会承担的村庄公共管理职责。

(三) 法律市场地位不突出

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保护、经营范围和享受农业扶持政策上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不具备真正市场主体地位。一是缺乏严格的法律保护。尽管《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但规范其发展的顶层法律制度严重缺失,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还在加紧制定中,有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管理、集体资产管理等规定还是地方性立法,缺乏上位法,难以满足其依法建设的现实需要。为解决其市场地位和身份登记的困惑,实践中主要采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放证明书、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或者企业法人等变通性做法,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解决办法。二是经营范围和领域受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封闭性的特征,村庄的区位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发展空间,经营型、服务型发展模式一旦与其他农业主体形成竞争关系,将受到后者排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承受较大的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集体成员分红的压力,不能进入经济风险过高或过低的领域,在法律和实践上都不宜实行破产重组。三是农业政策扶持不

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疑可以享受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同的金融、税收等优惠政策,但是政策兑现难度大。例如,获得正规金融信贷的堵点是缺少合规的项目合同和必要的经营性资产等做抵押,还要承担营业税和集体成员股份分红的个人所得税双重税负,各级财政扶持对象主要是各级划定的经济薄弱村,而大量的中低收入水平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未普遍获得财政资金及政策支持,对村集体帮扶面有待扩大。因此,只有打通农业支持政策落地的堵点,划定产业经营范围和负面清单,巩固市场主体地位,让广大农民看得到实在利益,才能激发农民从事集体经济的动能。

(四) 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

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反映在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基础不扎实和人才硬约束。“缺权”“缺能”是集体经济组织活力不足的根源。“缺权”是指农村集体所有权权能与农民个体对集体资产权能的不充分,“缺权”表现为集体所有权权益和农民财产权益保护不到位。对集体所有权缺少制度性保护,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挤压集体所有权,放活经营权带来高强度利益,使村集体整合土地资源集中连片开发的阻力较大,股改中不设置集体股,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又不够积极。一些成员权益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兑现,如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因不能买卖而难以抵押融资,一些城郊地区的离地农民承包地退出和宅基地腾退的补偿标准偏低,导致离地农民“带地入城”难以割舍与土地联系。“缺能”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经营、资本运营和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缺能”表现为人才硬约束,缺少一批以村干部为“领头雁”、以经营管理人员和职业农民为重要构成的人才队伍。对村干部集体经营管理的激励约束不够,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干部的收入、晋级、表彰等挂钩不明显,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责任感偏弱,部分村干部的驾驭市场能力和奉献意识不强。村集体成员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创新精神和竞争合作能力偏弱,留守农民的老龄化、女性化趋势较为明显,职业农民比例不高,造成集体经济组织中“人的能动性”未被激活。

四、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选择

面对复杂的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和相关者利益平衡问题,实质性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应聚焦

构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效率基础,从制度上明晰其法律市场地位、健全微观运行机制、划清组织职能边界和构建长效发展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活内驱力,才能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统”层功能、带领农民共同富裕和建设现代乡村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 从制度上明确法律市场地位,增强“统”层功能

从法律制度和农业政策层面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主体地位。首先,加强对特别法人地位的法律保护。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产权管理法》,依法规范其财产权利、产权交易和经营行为,划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法律界限。其次,依法丰富集体所有权权能。既要避免经营决策中将集体所有权权能虚置或将土地所有权绝对化倾向,又要避免村干部权力过大出现将“集体经济演变成为干部经济”现象。推动集体存量资产更新升级,加强财政和金融政策引导,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合作或委托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支持有条件的村集体利用留存的土地补偿款、拆迁补偿款购买物业或受让土地等经营性资产,探索建立政府拨款、减免税费等形成资产的移交办法,拓宽集体资产增值空间。最后,增强农业扶持政策力度。强化涉农部门的政策协调,依据不同的组织形式,由市场监管部门赋予合作社法人或企业法人地位,税务部门给予其经营性收入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金融部门降低以承包地经营权、农业设施和农民房屋等抵押融资门槛,扩大地方财政对集体经济扶持的覆盖面,细化农业管理部门对农村产业项目孵化和科技管理部门对新技术应用等指导,打通农业扶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二) 完善以法人治理为基础的微观运行机制,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效率

围绕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合作效率和组织治理效率,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重点从完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资产管理机制等入手,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为产权明晰、运转规范、治理有效的市场主体。第一,做实特别法人地位,赋予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尽快将村委会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移交给村集体经济

组织,使其享有集体资源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四荒地”、果园等承包的收益权,并将收益权纳入集体资产管理。第二,健全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参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健全彼此支撑和制衡的“四会”制度,落实集体成员权利义务,将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细化到集体成员股权变动、重要人事任免、收益分配方案等重大决策经营事项中。在法人治理之外,落实村民自治中的“四议两公开”制度,疏通集体成员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真正让农民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主体。第三,构建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建立集体资产的股份登记、交易管理、收益分配、财务监督和审计制度等,强化其对集体资产的信息披露和监督责任,由乡镇经济管理部门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运作和产业化经营的监督和风险预警机制,防范集体资产流失。

(三) 厘清与村两委的权责利关系,划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边界

明晰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的权责利关系,关键是划清其与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和资产管理、产权交易、组织治理中的行为边界,加强与村两委的分工协作。第一,促进与村委会分工协作,由村委会负责村庄行政管理事务,剥离村委会对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责,非经营性资产管理继续留在村委会中服务集体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村庄经济事务,专注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集体经济发展。推行“村企分开”,改变过去“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做法,实行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组织功能、选民资格、账务资产和人员待遇“四分开”^[10],探索建立其职责清单、监管清单制度,完善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的办法等,明确集体经营性收入用于公益性支出的比例和范围,减轻其公共服务支出负担。第二,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建设,引导村干部和党员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和乡村建设上,多途径提升村书记的组织协调、带头致富和村庄治理的能力,增强农村党支部对村民凝聚力。第三,强化对村干部制度化激励约束,探索建立有效的薪酬体系和监督制度,将村两委负责人的收入、奖励、晋升与集体经济发展成效相挂钩,探索给予理事长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奖励绩效,激励相关人员发展集体经济,加

强对农村干部的权力监督,将乡镇业务指导监督、监事会监督和纪委巡视检查相结合,遏制农村小微权力滥用。

(四)完善制度环境,构建以“赋权强能”为核心的长效发展机制

着力解决“缺权”“缺能”问题,夯实集体产权制度根基和强化人才支撑,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第一,丰富集体成员产权权能。关键是要让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能够流转交易,探索将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以混合产权形式实现农民财产权利“资产化”,积极开展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继承、抵押、担保贷款等试点,在自愿基础上,推动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能够跨村或乡镇边界的市场化流转,促进成员财产权利价值升值与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第二,完善集体成员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集体资产股权动态更新机制,农村集体新增人口主要通过户内分享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成员身份和集体资产份额,农村流出人口的股权流动限制在集体组织内部,对村社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村民”,探索赋予成员身份和贡献股股权,吸引更多“新村民”扎根农村。第三,加强对农村人才“引育留用”,继续派驻农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和吸引返乡创业人员,培养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通过组织选拔、民主选举或自荐,打通乡村能人竞选村干部的渠道,补充农村干部的新鲜血液;允许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就业创业地或原籍落户,聘用非本集体成员充实经营管理团队;健全政府主导的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体系,多渠道提升农村各类人才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提高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

动能。

参考文献:

- [1] 陈锡文.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5): 4-9.
- [2] 陈亚军. 产权发展与集体经济的效率差异[J]. 江汉论坛, 2015(2): 21-26.
- [3] 张晖.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11): 51-55.
- [4] [美] R. 科斯. 企业的性质[M]. 盛洪, 陈郁, 译. 企业、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5] [美] 道格拉斯. C. 诺思, 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厉以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 [6] [美] 道格拉斯. C.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厉以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7] [美] 阿曼. A. 阿尔钦. 产权: 一个经典注释[M]// 罗纳德. H. 科斯等. 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 刘守英,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 [8] [美] 哈罗德. 德姆塞茨. 关于产权的理论[M]// 罗纳德. H. 科斯等. 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 刘守英,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 [9] 高鸣, 魏佳塑, 宋洪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J]. 改革, 2021(9): 121-133.
- [10] 高强, 曾恒源, 张云华. 农村“政企分开”改革: 挑战、重点与建议[J]. 中州学刊, 2021(6): 32-38.

(责任编辑: 向梅)

(校对: 江南)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城市社区应急 路径创新探究^{*}

杨 浩 张瑞敏 李欣宜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应急成为社会治理的新维度,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通过完善自身的领导能力推动社区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由应急管理向应急治理转变。基于现实复杂多变环境下,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应急治理的创新路径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以党建维度的相对拓展和社区应急维度的绝对拓展两个层面来分析城市社区党建创新与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融合困境,通过立体化的应急路径,创新菱形应急模型强化党建引领下社区应急体系,通过提供新思路、新举措,推进社区应急治理常态化。

[关键词]社区应急;应急路径;应急治理;大党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6-0087-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区治理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1]。这些论述为社区治理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社区应急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控对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的考验。各级党委、政府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依靠医院、社区两个阵地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形势下,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区应急的领导方式由传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领导机制转变为党委直接领导下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新机制。基层社区党组织的应急治

理能力建设成为新时代下社区应急的一个新的维度。如何在社区中提高党组织的应急领导能力?如何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应急管理的创新路径?本文基于对党的应急维度拓展和应急治理的创新拓展困境的分析,总结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双向融合”的理论逻辑,进而对社区危机处理、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一、城市社区党建引领下应急治理的思维导向

中国化的社区遵循着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把社区纳入国家管理中,在固定的区域形成共有的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实现空间与价值上的双重建构。在社区宏观层面中体现国家的行政管理,具有从属性;同时,在微观层面中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中国的历朝历代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无论郡县制还是行省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范围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的生产生活、社会事

*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19BKS196)。

[收稿日期] 2022-05-23

[作者简介] 杨浩,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人员,430074;张瑞敏,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430074;李欣宜,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人员,430074。

务等大都以保甲形式由民众自治^[2],由民间具有威望的人士担任里正、父老等职务,实现自我管理。但是这种宗族自治的构成形式,治理能力有限并且缺乏组织化的应急主体,在遇到灾难时难以实现资源的统筹和有效的组织,基层自治与应急防控无法达到深度的融合,造成社会制度失灵。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城市基层组织模式得以确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单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职能逐步向社区转移并对社区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区应急管理随着社区建设制度的改革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社区发展由“自治-行政”二元属性转变为党领导下的“一核多元”属性,通过城市党委的领导,有效联动各基层党组织,使政府力量下沉,广泛吸纳城市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并且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自治实现应急自我管理。社区在党的领导下达到自治与行政的有效融合。这次疫情防控鲜明体现了在新时代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应急管理的主体,社区成为源头治理的关键。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社区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好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发展形势做出专业化的处置,第一时间控制灾害蔓延。由此,解决了应急事件中社区权责分立的问题,既做到资源下沉,也做到事权下沉,促进应急主体与社群的融合治理,形成中国城市社区独有的应急思维。

二、城市社区党建创新与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融合困境分析

(一) 党建引领下应急维度相对拓展的理论困境

党建引领下应急维度的相对拓展,指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尊重社区的自主性发展,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把党组织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当中,加强党在社区应急领导方面的拓展。具体以党的应急领导能力建设和打造“一核多元”的社区应急共同体为拓展形式,形成“党组织领导、多元参与、居民共治”的应急格局。基于现实条件下,实践过程却面临如个体化倾向、行政化社区以及党组织涣散等困境。

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平台。但是高度集中的单位制产生的行政化效应在转变为社区制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资本、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与社会快速的经济发

展产生矛盾,使得社区主体产生裂变,出现社会原子化、社区去组织化、社区客体异化三个方面的问题。单位制解体使得原有的高度组织化的生活场域逐渐瓦解,代之以原子化的个体和社区居民难以被有效地动员的去组织化^[3]。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原子化的个体受城市阶级、资本分化产生个体主义倾向,出现了以个体参与社区应急能动性降低为特征的社区客体异化,导致社区应急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法有效地联动。居民自治权被政府行政命令所吸纳,社区成为行政化的平台。近年来,随着政党对社区的嵌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成为社区应急的领导主体,社区党组织通过创新党建形式统筹社区资源,以自身特有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来动员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应急的有效路径。但是围绕着“政治动员”和社会管控,社区高度聚焦党政关系的协调性和群众性文化活动任务的完成,没能将强化政党自身能力建设与加强社会多元化治理有机联系起来^[4]。城市社区网格化、组织协调性不强,网格过多无法形成有效联动,党建平台如党群会议、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大厅、居民委员会成为虚设。部分党组织涣散,粗放化治理,党建出现形式化、应付化,内容简单。党员应急能力差,知识储备落后。

(二) 社区应急治理绝对拓展的现实困境

社区应急治理维度的绝对拓展,指的是随着社区应急因子的不断增加,社区应急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社区在应急教育、应急资本、应急设施、应急人力资源等方面缺乏整体系统的联动。社区单一的应急管理方式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突发事件,出现社区应急管理固化与应急能力要求提升的矛盾。社区需要打破应急管理固有思维,转变为以应急治理为依据多方共建的应急共同体,并且在应急组织、社会资本、应急文化、应急制度等方面进行绝对拓展。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应急治理的绝对拓展却陷入了以下三种困境。

1. 社会自主性“复苏”带来社会应急资源失衡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拓展的社会空间、不断流动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自组织化程度的提升等因素共同推动社会治理从“他在控制”转向“自在发展”,引发基层社会自主性从“隐匿”走向“复苏”^[5]。然而,我国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受科层制的影响以行政管理为主,由街道办主管社区应急建设,通过行政化

命令来指导社区的应急工作。应急资源却由社区自主进行筹备,由于资金的限制,社区无法加强应急基础设施的更新和物资的购置,导致社区应急能力存在隐患。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社会资本更多掌握在居民和社会组织手中。行政主导的应急和自主化的应急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有效平衡,产生政府财政压力大、社会资本出现浪费、社区负担重等问题。例如,西北地区某市的社区,应急帐篷、应急药箱、雨伞、棉被等物资储备较少且物资存放时间长,部分应急药品存放时间过久,应急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更新,存在无人检查、无人管理的现象,应急模式缺乏系统性和组织性。但是,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应急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却经常组织应急物资的集中采购,例如居民委员会以楼栋为单位集中采购医疗药箱,在疫情期间集中采购口罩、医用酒精等物资。在小区广场设置了疏散地点,建设了共享应急平台,利用标语警示牌进行宣传。应急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居民地震、消防、防洪、防疫等应急培训宣传,并且动员居民参与应急志愿活动,掌握科学的应急知识。在应急责任分散、应急方法不明确、行政化的命令占主导地位的应急模式下,社区无法有效组织统筹社会组织 and 社区居民,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同时,我国对社会组织准入采取双重管理,这就使得许多社会组织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支持而难以获得政治背书^[6],而“法律法规的模糊性规定造成现有体制下政府缺乏引入社会组织参与风险治理的动力”^[7],社会组织无法全力参与到政府及社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体系下,导致社区在“自治-行政”的二元冲突中形成社会应急资源的失衡。

2. 社会原子化导致社区应急动态组织性下降

社会原子化主要是指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些基本的社会联结被破坏的现象^[8]。一直以来,我国社区应急体现出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社区居民根据相似的文化属性、思想认知和价值认知连接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群众组织力。近年来,受社会异质性和阶层流动性的影响,社区居民开始强调个人私密性、空间的封闭性,并表现出盲目的排外。社区组织性下降,社区居民在价值认知、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社区应急治理的参与性下降,居民防灾应急知识储备不足,

应急能力低下。社区应急队伍大多由社区工作人员、政府行政人员组成,一些救援队伍由社会组织临时组建,缺乏专业的应急技能和救援器材,无法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救援,而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救援往往丧失救援的最佳时机。在部分社区,存在应急教育无法组织、社区居民应急意识差等现象。社区的宣传教育只停留在传单和口号层面,片面注重应急形式以应对行政检查而缺少实际层面的应用。由此,社区必须配备专业化的应急团队,如医疗救治、消防救援、防震救灾队伍,利用专业团队培训居民,组织居民建设社区应急共同体,以动态化的组织实现基层治理的联防联控。居民之间价值层面的差异使得居民理解能力和接受方式存在差异。社区可以以共同的文化为连接点,通过讲座、戏剧、歌舞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并且借助社会文化活动或利用家庭来连接居民,打破社会原子化带来的个体主义色彩,实现社区的动态组织平衡。

3. 社区应急制度的“悬浮化”导致应急运转失灵

社区应急制度属于“行政+法治”双向治理,政府掌握社区应急的决策权、人事权,法律则为应急提供治理依据和根本保障。然而,应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往往使社会出现“脆弱性”现象。首先在应急过程中,政府会关注应急维度的治理,忽视民生维度的治理。社区在后勤保障、民生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生活供给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社区把灾前防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纳入应急制度体系中,却受政府行政命令的约束,这导致在基层应急治理和信息传递中出现“真空”,使社区应急制度处于“悬浮化”的状态。其次,在应急治理重心下沉的情况下,社区压力大,社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无法在国家的既定规则中运行。同时,社区在受多元价值体系的冲击后,不同治理客体对治理主体提出不同的要求,呈现出立体化的治理需求和对“大应急”的治理格局的期待。传统的社区治理思路和价值观念处于“悬浮”状态,造成社区价值“碎片化”。

三、党建引领下社区应急治理创新路径构建

(一) 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双向融合”

现代政党的基础存在于社会中,政党只有扎根社会,才能枝繁叶茂;只有抱紧社会,才会稳固不倒,而党的社区工作正是党扎根社会的重要实现形式。

党组织通过对社区的领导,实现对社区政治、经济、文化、人力资源的统筹,增强社区的向心力和组织力。当前在党建与社区融合治理方面,国内学者对社区党建提出了三种形式:一是嵌入式党建。孔娜娜、张大维认为,嵌入式党建是党员嵌入或加入到群众管理或服务组织,并与群众形成了平等、网状式管理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方式,体现了从科层式架构到扁平式组织,从威权式统治到参与式领导,从垂直式管理到嵌入式服务的党建变迁过程^[9];二是区域化党建。唐文玉认为,区域化党建是服务于新型社会有机团结的、开放的、多样化的基层党建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外部新型环境的复杂互动过程中进行结构性适应的产物^[10];三是融入式党建。这一类型是基层党务工作者在社区党建与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强调推动党建融入发展、服务融入民生、组织融入区域、党员融入群众,突出服务导向,建强服务队伍,完善服务体系,从而有力地提升服务的实效。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应急转型这一问题,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社会环境变迁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工作的适应性的视角来展开。对城市化中档的基层组织转型的研究,郭良平(Lance L. P. Gore)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城市的转型,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党建所依靠的结构化的权力支持,又面临着由社区的流动性、匿名性、老龄化、碎片化等诸多特征带来的巨大挑战^[11]。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与罗伯特·本尼维克(Robert Benewick)认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进行渗透主要采取强调党的中心作用与强调社区自主性这两种模式^[12]。

本文认为,党建与社区应急融合路径可以从结构性融合、机制性融合、文化性融合和服务性融合四个方面展开。

结构性融合主要是指利用网络化的治理框架,把党政、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纳入到社会应急网络中来,形成网状结构,以党为权力运行的主体,以社区居民为权利参与的主体,把权力结构性转变为社区权利。两大网络主体之间利用自身特色进行互动与交流,通过拓宽网络二级连接点增强网络的密集度来高效利用社会资源,如政党可以利用党员下沉和政府资源下沉拓展党员网络,社区居民可以利用居民委员会建立楼栋网络,并用楼栋网络党支部来进

行连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

机制性融合指的是党与社区的“双向嵌入”,党把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嵌入到社区之中,将党的公权力延伸至社区应急和社会治理,形成对社区的吸纳与控制,推动政党与社会成为“增权”的治理格局。社区则把应急机制嵌入进党组织的领导之中,借助党的领导完善社区自治的体制机制,并把社区人力资源、社区资本、社区社会组织嵌入应急党建之中,形成对党建的合作与参与。

文化性融合旨在克服社会原子化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悬浮”现象,在党建与社区深度融合的进程中达到思想引领的作用。由于多元文化的流行,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在社区层面呈现虚浮状态,趋于形式化、表面化、口号化,无法在价值层面凝聚社区居民形成价值合力,反映出发挥价值主体的政党和社区在宣传中缺乏有效的互动融合机制,缺少社区认同从而影响应急的价值动员和行动统一。促使文化融合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绝对引领作用,使文化下沉到社区之中,通过多样的活动在实践中加强社区人际合作,发挥主流思想的价值引领作用,形成一元核心、多元共存的社区价值融合模式。同时,提高社区在应急方面的认同感和行动力,使社区成为资源整合的推动力。

服务型融合是通过组织场域的分工合作,利用政党与社区的相互作用,把握场域合作,整合社会空间和拓展组织功能的作用,把公共利益与自我利益结合起来,塑造服务化的社区。党建领导机制的创新可提高社区应急能力,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协调需要党建来实现利益整合和功能规范。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居民可以向党组织寻求灾情救治、民生保障、后勤保障等多项事务的救援,融合后的社区党组织再把功能分解,帮助社区进行救治,以此调动多元主体的应急积极性,提高组织化的应急效率。

(二) 构建党建引领下立体化的社区应急框架

1. 采用“大党建+大应急”双向联动的应急模式

近年来,社会组织场域化和公民社会私域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些矛盾,社会资本、价值选择、场域结构作为社区应急治理的重要因素无法有效地整合,存在应急缺位的现象。党组织在社区应急层面

存在多部门党组织各自管理、无法有效联动、多头领导的现象。同时,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呈现价值分化、资本分化、身份分化,加大了应急治理的难度。鉴于此,应通过构建立体化的党建应急框架,采取“大党建+大应急”双向联动的模式,针对社会的阶层现状进行立体化治理,整合社会资本、社会价值、社会场域并将它们统一于社会应急的共同体之中。

“大党建+大应急”通过组织层面的调整、组织功能的拓展从而增强党组织间互动范围。第一,拓展组织联动范围。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可以把各社区党支部、社会组织党支部、小区楼栋党支部联合起来建立社区应急联合党委,并把政府应急管理局党组织纳入到联合党委的领导之中形成应急大党委的组织架构,通过实行主官负责制——由市领导任联合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由区级各部门领导下沉联系各社区,加强负责机制和强化应急督察的领导责任制。大党委统筹各社区的应急物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情况,配备专业化的应急队伍,把各社区、组织纳入信息平台之中,实现党建社区联动。第二,创新组织联动形式。加强应急化“党建”网格建设,在传统的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应急网格之中,形成多点化的应急中心。党建网格统筹横向的多元社会主体和纵向的垂直化的社区党支部。从党员队伍中选派优秀应急人才领导社区应急网格,在应急网格的专业化队伍里面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在每个党建网格之中选派专业化的党员组建应急团队,定期对所在网格辖区展开应急培训,利用党组织优势吸收社区志愿者组建应急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应急巡逻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演练,推动社会应急专业化下沉至民众之中,培育良好的社会应急文化,推进社区应急常态化和社会化。第三,改善应急供给模式,当前社会有两种供给模式,一种是传统行政化的供给模式,一种是新型社会化的供给模式。行政化的供给受财政资金的限制,无法保障对应急物资的及时更新和设施建设。社会化的供给受行政化的限制,无法与社区有机融合。只有通过党建这一枢纽,才能使二者进行融合,组合新的应急供给力量。“大党建”不仅是社区层面的党建,更是吸收社会因子的社会化党建。其通过吸纳行政、企业、社团、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利用

党组织力来增强应急供给的深度与广度,为行政化与社会化建立联系。同时,打造应急社会化的供给模式,以社会企业党建为纽带,社会与社区共建应急力量。由企业出资、社区出力,利用党建网络建立联系,打造社区应急基金会进行社区应急物资供给和资金供给,使得传统的政府财政为主的单一供给模式转变为社会化的融资模式。

2. 建立四重维度下菱形应急模型

中国已经迈向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利益诉求-政治参与-民主发展”。如何在基层社区建立多元化的应急治理模型,推动基层应急系统内的高效平衡。本文在探索党的组织系统与社会应急系统之间的结构性架构后,创新菱形应急模型,在社区内部系统中有效激活社区内生要素与外来资源,提升二者的动态融合效能,提高社区应急的柔性及弹性,增强其系统内部的抗压力和可塑性,使其在危机中始终保持主体的核心稳定状态(见图1)。在同一平面内,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四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且平分每一组对角。菱形应急模型基于对应急主体和应急资源的统筹,由菱形的四个点组成的应急的四个维度和对角线中心点的核心维度构成,即设施维度、组织维度、信息维度、系统维度及位于核心维度的党建维度。四重维度主体在党建的领导下构成“点-线-面”的协作关系,各维度主体既相互联系又呈递进状态。四维的组合形成了菱形应急模型所特有社区柔性,即对于突发事件对社区所造成的压力进行静态吸纳并且转换为灾后重建的动态可塑性和恢复性以及社区对灾情的适应能力与灾后功能性重塑的轨迹过程。当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时,短暂的社会功能失灵会带来社会的无序,但四维因子联系紧密、对核心维度反应迅速,则可以承受事件的冲击并且转化为社区有利因子。在建设应急模型的过程中,要按照社会的危机反应顺序进行。

首先是以供给为主导、需求为指引的多元化一维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应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社区设置卫生应急机构和社区应急物资保障平台,以社区应急为中心、社区网格为范围、居民的健康为导向,以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为应急服务的重点,合

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以最快速的处理公共卫生危机为目的,达到疾病隔离、防控、救治的效果。同时规划公共应急中心,在户外公园、小区广场、社区中心等设置公共应急集中救援场所,在遇到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可以进行功能性救治。在社区内设置基层应急中心,对社区应急进行规划预案和临时指挥,并且有限度地容纳、安置一部分受灾群众。应提升社区基础设施的抗压力,提高社区公共安全防治的能力。

嵌入式的二维组织形态,二维应急则更多关注社区的人力组织层面,以社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为基准。党政机关代表的正式力量的下沉和社区工作者的协作相结合的应急模式,是行政力量的外部性下沉。科研机关、应急知识人员进行补充式下沉,来填补应急过程中的知识性难题。同时,来自社区居民的非正式组织成为中坚力量的内部性下沉。非正式组织产生于社区居民,居民的草根性以及社区的属地性使其天然地成为了社区居民冲突的协调者、居民关系的黏合剂,在丰富居民生活、促进社区融合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组织以内嵌式结构进入社区治理当中,配合政府部门进行物资的配送,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对社区应急教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应急救援发挥作用。应急力量需要非正式组织作为主力进行自我救治,构架起应急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建立信息化的三维互动平台,是主要针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居民心理危机干预和居民信息了解互动的平台。信息化的应急平台的功能主要在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危机干预等方面。社区信息平台根据指挥平台的应急响应启动危机预案向居民传达政策信息、服务保障信息以及应急防治的知识,居民可以向平台报送健康情况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便社区安排救治。社区应急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共享,并且与政府进行有机对接,形成“政府-社区-居民”的三位一体对接的三角结构。信息平台根据突发事件的情况进行舆论引导,及时公开现场情况并及时辟谣,由此在一线控制住舆情。

建立系统化的四维社区指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社区应急治理,通过构建社区应急管理系

统,建立社区居民应急信息数据库,加强信息的共享速度,促进平台多元参与、多元融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社区的管理空间分成若干网格,网格以“1+1+x”模式打造 1 个网格社区、1 个党支部、x 个社会元素,连接城市管理系统,形成多种技术结合的应急治理平台。在疫情防控时可以最快地利用大数据进行信息收集和拉网排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信息情报分析形成应急决策,并且预测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主动防控主动出击,排除危机爆发的潜在威胁,起到社区应急网格在系统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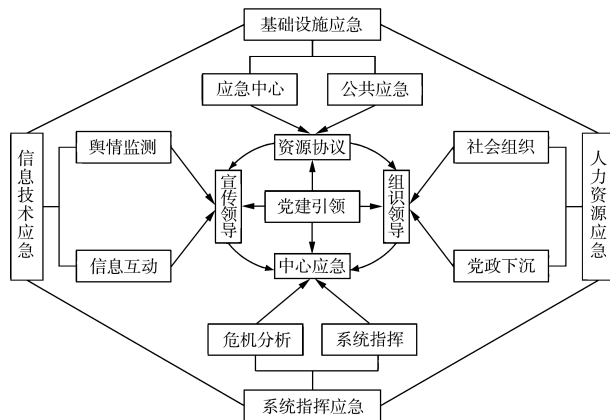


图 1 菱形应急模型

(三) 创新运用“全周期管理”的应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把全周期管理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周期管理”的思维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新理念,也为应急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根据“全周期管理”的思维优化基层应急的路径,探索社会治理的运行机理。“全周期管理”是一个管理学概念,指根据产品的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等生命周期予以跟踪干预,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全周期管理”注重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运行机制、过程结果等层面进行周期性整合和全过程分析,以确保整个管理体系的危机预案、应急处理、后勤保障、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均能运转高效、系统有序、协同配合。

如今,“全周期理论”被引入到社区治理中,即

通过要素规划、多元主体协同以及闭环式管控加强社区应急能力。第一,在社区要素的规划管控中,要注意要素的集中性和信息的准确性,把社区应急要素纳入到党的管理之下,如社区组织的管理、社区应急资源的调配、社区人力资源的统筹。同时,及时研判信息,完善社区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确定总量、采储集合等全要素管理模式。依托大数据分析社区应急的漏洞与管理问题,完善诉求回应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完善决策、实施、监督的周期;在社区处理突发事件中完善部署、贯彻、验收的周期。第二,多元主体协同,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同时吸纳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参与应急决策以及应急建设,增强各类主体社会服务的功能,解决社区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加强政党、政府、居民的周期关联性,形成多部门、多主体联合应急、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激发社会的自发免疫系统,及时处理分散性信息,应对分散性危机。对于突发事件能够集中处理分析,并且根据各主体优势进行快速调整,协调社会信息的差异化,推动应急有序化。第三,加强闭环式管控,要注重“全周期管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利用网格来加强网络,用网络来完善网格。把周期管理下沉到基层应急之中,利用智慧平台对接基层人民的生活需求。健全突发事件管理的配套机制,强化全周期的防控意识,完善危机治理的总结吸收制度,实现风险管理闭环,对风险提高预见性,周期性地进行检查和预测,主动化解危机,推动城市社区各领域、各部分、各环节融合成有机转化的应急治理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该深刻认识基层应急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的正确路径。通过党的自我完善创新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应急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推进社区应急治理常态化,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共民政局党组.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J]. 中国民政, 2020(20): 4-7.

- [2] 高和荣. 从两极到综合:社区应急治理的新维度[J]. 东南学术, 2020(4): 88-95.
- [3] 王立峰, 潘博. 社会整合: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J]. 求实, 2020(2): 26-36.
- [4] 伍玉振.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78-83.
- [5] 金太军, 鹿斌. 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J]. 江苏社会科学, 2017(1): 82-88.
- [6] 颜德如. 构建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制[J]. 行政论坛, 2020(3): 89-96.
- [7] 董幼鸿.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以上海联合减灾与应急管理促进中心为例[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50-57.
- [8] 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 社会科学, 2009(7): 71-75+189.
- [9] 孔娜娜, 张大维. 嵌入式党建: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与路径选择[J]. 理论与改革, 2008(2): 51-53.
- [10] 唐文玉. 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4): 47-54.
- [11] Lance 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Market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12] Leslie S. and John F. Restructuring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City, 2008(2): 183-195.

(责任编辑:悠然)

(校对:木子)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总目录

(括号内前者为刊期,后者为页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四个维度 肖兆权(1,001)
- 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实践路径 周贤山(2,001)
- 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意蕴与经验启示 吴光祥(3,001)
-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百年进程及其经验 张世飞 江烜(3,0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研究图景 易开发 梁杰皓(2,006)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 罗馨(3,012)
- 习近平新时代军队党的思想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 吴爱军(4,00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意义的四重论说 许恒兵(5,001)
- 新时代思想建党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知识图谱分析视角
..... 张金金(5,007)
-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生成逻辑、内蕴与基本遵循 毛磊 张今誉(6,009)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 科学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三重意蕴 王兵(6,001)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探析 向青山(6,005)

马克思主义研究

-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兼谈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丁瑞媛(1,004)
-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叙事逻辑——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王梦可 刘林元(1,010)
- 马克思恩格斯“党建”知识的形成、传播和运用 周良书 李冰(2,013)
-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李永康(2,019)
- 《共产党宣言》世界交往思想探赜 刘昭良 刘宝杰(2,029)
-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传承与发展研究图谱分析 李超民(3,018)
- 从机器分工到精神政治:资本与技术合谋的形态嬗变 孙阳(3,027)
- 类哲学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出场与谢幕 李嘉辉(5,016)
-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 刘福军(6,019)

哲学研究

-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路径及其中国实践——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 张乾元 胡熙涵(4,010)
- “好人”与“好公民”的内在张力与和解之路——从苏格拉底到现代社会 刘或灏 陆闯(4,018)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 新时代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若干思考 刘先春 王帅(1,020)
-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方晓春(1,027)
- 论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百年探索 仲德涛(2,036)
- 中共一大纲领研究综述与若干思考 刘潭(2,042)
- “抹黑”与“自塑”:土地革命时期《申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演进与启示 王建红 杜江婷(2,049)
-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问题研究述评 祝猛昌 王婕(4,024)
- 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演进历程及经验启示 王玮(4,032)
-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诠释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共产党宣言》文本解读 李燕 张鹏程(5,025)
-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丁宇露 孙欣 梅丽(5,031)
- 民族复兴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何良(6,026)
- 雨花英烈革命精神的历史成因、鲜明特征 赵杨娟 莫佳思(6,033)

党史党建研究

-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现实境遇、目标定向及策略选择 李景平 殷艺娜(4,040)
- 《粮政通报》: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区的粮食工作指南 石永程 叶灿(4,047)
-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意义 吕健 赵国龙(5,036)
-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看毛泽东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超越与重塑 王芳(5,045)
- 组织调适: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郭文杰 黄博一(6,039)
- 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机制研究 吴琳 吴国燕 谭少怀(6,046)

政治学与法学研究

- 节日动员的话语解读——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五一”社论的考察 焦平亚(1,036)
-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黄姗姗(1,043)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及其形成的内在机理 王伟君 牟成文(2,056)
-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语境下法治协作路径构建:现状、问题与对策 章许睿(2,064)
-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若干问题论析 王增杰 侯远长(3,036)
- 近年来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李博然 袁芄(3,043)
- 从制宪权寻找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共同纲领抑或五四宪法 牟春花(4,054)
-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与纠偏 冉启云(4,061)
- 中美关系视域下“抗美援朝精神”的价值 杨佳江 倪国良(4,070)
-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逻辑——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视角 焦克龙(4,074)
- “包容型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行为研究——基于“县长直播带货”的个案考察 肖传龙 张郑武文(5,052)
- 公开个人信息的定位及处理活动的规范化 张建文 丁冰洁(6,051)
- 中国特色文化扶贫:先进理念、成熟经验与未来方略 冶刚 徐秋枫(6,059)

经济学研究

- 政府环境规制倾向抑制外商直接投资了吗?——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
张谦雅 李亦辰 董柯(1,051)
-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的本质探析 …… 聂嘉琪(1,060)
-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方向与实践路径 …… 戴翔 曾令涵(3,051)
- 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严斌剑 靳振忠(3,059)
- RCEP 关税削减对中日货物贸易的影响评估 …… 陈阵 车天琪(3,071)
- 政府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研究 …… 李晓春 张谦雅(4,081)
- 科技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基于七大中心城市的比较研究 ……
郭李为 陈秋语(5,058)
-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的政府作用研究——以广东省德庆县为例 …… 李燕(5,066)
- 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生产率了吗? …… 金通 朱保香 吴旻(6,065)
-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 张淑萍(6,080)

公共管理研究

- 政府部门内部制约与协调机制的构建研究——以 H 省三个省级政府部门为例 …… 过天瑶 胡春晖(2,071)
- 农村自治组织再生产与区域社会再整合——云南省兰州坝地区村际纠纷化解的经验与启示 ……
周兴妍(2,079)
- 公共服务项目制购买的功能、困境与出路 …… 徐勇(3,082)
- 俄罗斯学者视角下的中国脱贫攻坚战略研究 …… 蒙慧 娄跃辉(3,089)
-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政府数据治理研究 …… 付玲(5,074)
-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适应性转变与策略调整 …… 杨蕾 石杨(5,082)
-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城市社区应急路径创新探究 …… 杨浩 张瑞敏 李欣宜(6,087)

文化与社会学研究

- 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甘文华(1,069)
- 城乡融合发展: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到中国乡村振兴实践 …… 王瑞(1,076)

城市现代化研究

- “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下南京江北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路径 …… 叶南客 吴海瑾 曾盛红(1,085)
- 南京都市圈产业合作园高质量发展研究:模式、经验与建议 …… 王先柱 黄河(1,090)
- 城市群空间网络对污染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对比 ……
岳书敬 孙晓玲(2,085)
- 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绿色发展探讨 …… 庞爱萍(5,089)

书评

-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价值逻辑的创新探索——评《从生态批判到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价值逻辑研究》 …… 王庆五(2,094)